

# 倾斜的象牙塔

周肖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斜的象牙塔/周肖兴.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  
ISBN 7-301-00499-0

I. 倾... II. 周... III.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6100 号

书 名: 倾斜的象牙塔

著作责任者: 周肖兴

责任编辑: 王 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0499-0/G · 001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mailto:zyl@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1.5 印张 175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1—350 册

定 价: 48.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前 言

我一直想查证是哪个天才发明了“象牙塔”这个名字,也一直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象牙塔的存在。有人告诉我:“象牙塔是亚丁国魔法的总产地,是进行魔法实验及学习各种魔法的地方。”也有人告诉我:“象牙塔并不是灵骨塔,它含有贬义,泛指逃避世间的地方。”其实,它究竟是什么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人们现在的习惯用语恐怕是以上两种解释的综合,它是“可以逃避世间的地方”,也是“实验(研究)和学习”的场所。可能这种解释还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对它的理解。所以,人们都习惯于将大学和相关的研究所称为“象牙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他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中也这样说过:“一九六六年,我离开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去做教授……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是一座标准的象牙塔,是一座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塔。为什么我在那里做了有成就的十七年后要离开它呢?道理很简单,世界不只是有象牙之塔。象牙塔里可以做出很出色的工作,但不是世界惟一可以有作为的地方。去帮助建立一所新的大学,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回想起来,我当时决定离开象牙塔,去做一件与社会比较有关的事,是非常正确、非常明智的。”而作为生活、工作在“象牙塔”里的普通学者来说,去思考它、研究它,为它的繁荣做贡献,自然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些对它有益的事情,即使只是停留在书本或讲义上的文字,哪怕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片言只语。但作者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下生活中的“象牙塔”,现实中的“象牙塔”,而不是用高深的“玄学”和精湛的理论去对它剖析一番,更不是指望用作者的陋见去彻底改造它。书里的一些观点也仅仅是一种感受,一种思考,一种良好的愿望和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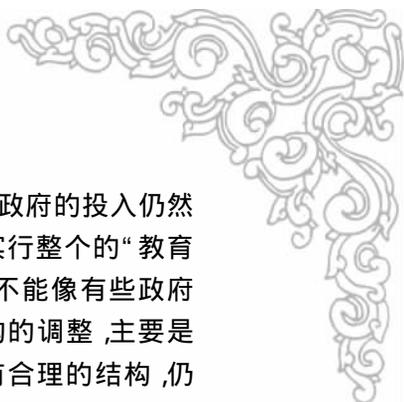
其实,世界上或许根本就没有能逃避世间的象牙塔的存在,因为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们,总是要走出象牙塔的,也会有更多的人走进象牙塔,这种交流、这样的人气,肯定会对象牙塔产生冲击和影响。所以,每一次社会的变革都会使它产生十分重要的嬗变。

这种影响要么会给它更强劲的生命力,要么会让它倾斜甚至倒塌。十年“文革”,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彻底倒塌,剩下的只是虚壳,成为武斗和造反的阵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建了它,抹平了过去的创伤。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里,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这是值得欣慰的。

面对滚滚涌来的知识经济大潮,面对日益激烈的人才的竞争,面对国门外咄咄逼人的文化入侵,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否再次崛起,需要我们去深思、去总结、去反省。任何对过去的反思总是可以让人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任何片言只语的建议总是有利于我们接受新的信息,开阔我们的思路,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完善我们的管理体系。教育事业从来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需要政府的支持。朱镕基总理在谈到义务教育的时候说: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义务。作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摇篮的高等教育自然也应如此。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取决于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兴旺和民族生存的千秋大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漠视高等教育的失落。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的教育,纵然也会对一些喜人的成绩感到欣慰:素质教育理念开始得到重视和贯彻,大学的结构调整和合并取得阶段性成果,高等教育得到了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关注,迈出了“大众化”的坚实步伐,学术成果的增长等等。但仔细想来,我们也有着太多的忧虑: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改革迟迟得不到有力的推动,教育的投入得不到实质性的增长,“教育已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教育的乱收费问题已经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学术腐败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健康成长,素质教育的理念得不到强有力的落实,大学精神的失落,校园文化出现了颓废的迹象……面对如此林林总总的现象,我们不得不说:象牙塔倾斜了。

也许正因为“塔”之“倾斜”,才有独特的魅力,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就举世瞩目,堪称世界一绝。中国的“以古典而闻名”的小城苏州也有虎丘“斜塔”与之媲美,落日余晖中映衬出来的美丽的轮廓,实在是美不胜收,就连拯救它的专家们也舍不得将它弄得太直,以免破坏了这种美感。而象牙塔的倾斜是一定要矫正的。普通的人都知道塔之倾斜,在于基础,所以,拯救斜塔的专家都着力对基础灌浆,至少能阻止它倾斜得更多。高等教育的基础有三,一是资金



投入,正如拯救的专家们以“灌浆”来稳定其基础,政府的投入仍然达不到一定的稳固度的话,不足以扶正。即使是实行整个的“教育产业化”,也不足以解决本身的发展资金要求,更不能像有些政府官员提出的“还要上交财政”。二是高校自身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结构性的改革和内在的管理体制,基础再牢,没有合理的结构,仍然会扭曲,特别是高等教育自身的管理结构要能经得起社会的冲击,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大学的精神是支撑整个系统的骨架和灵魂,不能一成不变,否则只能被淘汰。三是基础教育的衔接,基础教育的改革如果不能有效地和高等教育衔接,再好的大学也只能事倍功半。我们传统的教育理念,从小到大,只让孩子“听话”,从小学到高中,只让学生学会回答问题,即使上了大学仍然舍不得让“宝贝”离开自己搀扶着的手。英国近年来吸收了许多中国的留学生,我在约克(York)大学进修的时候,正好是新学年刚刚开学,在英国读研究生许多专业只要一年,所以,一开学导师就要求学生开始选论文题目。我的一个教授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的留学生都跑来,要求导师给他们出题,我对他说,习惯了。因为他们习惯了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而从来没有想过回答自己的问题,即使是学业论文。再加上我们从来的考试都是答卷,而且越来越标准化,学生只要学会在试卷上打钩,中学会考打钩,考大学打钩,考托福、雅思还是打钩,理由是省事省时省力,而且标准公平,甚至批卷可以依靠全自动的机器。这样的“模子”里出来的学生,离开了打钩,还能做什么呢?

随着独生子女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关注教育的发展和改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对教育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形态,关乎每一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最重要的教育追求,更是每一个家庭所梦想实现的教育理想,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更关乎国家事业的兴旺、民族的强盛。从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到大学的入学考试、招生录取、专业的调整和学生的毕业就业,无不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加上我们媒体的关注,更是让教育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关注是个好事,在象牙塔出现倾斜的时候,人们关注高等教育一点也不奇怪。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本身确实也存在着许许多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许许多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教育研究人士罗列了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在有关杂志上、报

纸上,甚至在网站上进行广泛的讨论,希望能得到最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应该说这是可喜的现象。对高等教育的广泛关注,各方畅所欲言,应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抱着解决问题的精神来讨论问题,而不是让学术研究、学术讨论走入另外一个歧途。重要的是我们都有着同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象牙塔不再倾斜。

笔者有意涉足这样的讨论,基本的出发点是想说出自己从事高等教育多年的感受和思考。笔者无意在著作中去迎合某种观点,去抨击何种意见,去指责哪一条措施,去评论别人的做法和得失。对于任何问题的理论探讨,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只有把理论问题的探讨引上正确的轨道,我们才能试着解决实际问题。



## 目 录

第一章 大学的概念和功能 .....	(1)
大学辨析 .....	(1)
高等教育的现状 .....	(7)
大学的评价 .....	(12)
第二章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政府的职能 .....	(22)
政府的职能 .....	(25)
建立学术自由机制 .....	(33)
第三章 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特征 .....	(39)
高等学校的改革 .....	(39)
学生的特征 .....	(48)
高考和招生制度 .....	(51)
第四章 高校的教学改革 .....	(59)
课堂教学改革 .....	(59)
教学的容量 .....	(67)
教材的使用 .....	(77)
第五章 高校的考试和教学评价 .....	(84)
考试的社会意义 .....	(85)
考试的理念 .....	(87)
第六章 素质教育 .....	(93)
素质教育的背景 .....	(93)
素质教育的内容 .....	(96)
素质教育的机制 .....	(117)
第七章 毕业与就业 .....	(127)
大学生的毕业评价 .....	(127)
人才市场 .....	(131)
就业指导 .....	(136)
第八章 高等教育投资和收费制度 .....	(144)
留学热的背后 .....	(145)
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现状 .....	(149)

高校的投资和收费改革 .....	(155)
关于教育产业化 .....	(159)
民办高等教育 .....	(164)
主要参考文献 .....	(172)
后记 .....	(174)



## 第一章

# 大学的概念和功能

大学的概念似乎非常明白,在中国就连还没有上学的幼儿也知道长大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是我们启蒙教育的“成果”。而至于大学的真正含义,以及它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普通的民众谁也不会太在意。就是一些工作在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可能也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将在各自的大学之间展开。大学的真正意义及其对文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世界各国都将大学的发展战略作为强国的根本措施,而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里出现了制造“伤熊事件”的学生,走上犯罪道路的“马加爵式”的人物,剽窃别人学术成果或者道德堕落的知名教授,以及像“北航招生事件”等在招生、就业、收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让人错愕的现象。人们或许会问:今天的大学到底怎么啦?象牙塔为何没有了过去的宁静?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今天的大学?又如何来重新认识和改造她,使她能成为真正的学术殿堂?

### 大学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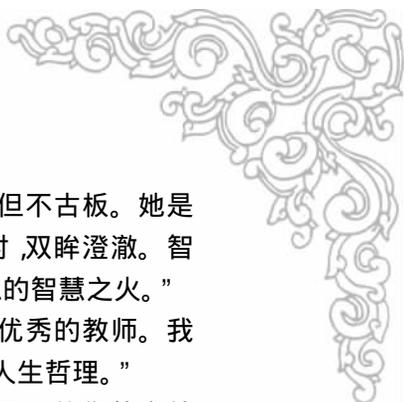
我们知道大学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也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不同国家的大学有着共同的人类历史文化渊源,又深深地扎根于各自所处的民族传统的土壤之中。从苏格拉底时代,他与其弟子研讨各类学问的机制就是大学的最初形态。到12、13世纪,便建立起了自治的“大学”,尽管教会充当着当时的学术权威,宗教也是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也只有少数的王公贵族能享受这种教育的特权,但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在中世纪,所谓大学“UNIVERSITAS”的最初含义是法

人 尽管当时许多人加入这种自治的法人团体 ,仅仅是为了享有法律特权和受教育的特权 ,但至少它已经是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象征。日益壮大的大学 ,自然也就吸引了当时的学者转变为教师。由于人们建立大学的本意就是为了培养人才 ,所以十分强调大学的知识传授功能而忽视知识的生产 ,因此 ,中世纪的科学家一直被称为教师或经院哲学家。建于 12 世纪后半叶的巴黎大学最早也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起来的 ,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并称为世界最古老的大学 ,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其后欧洲各主要大学的发展模式均受这两所大学的影响 ,建校的立意 ,就是教贫穷孩子学习神学 ,同时开设文法、逻辑、修辞、数学、几何、音乐和天文等七门神学以外的课程。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 ,英国的牛津大学以传播新学问、新思想著名 ,和它以后的剑桥大学一样 ,注重道德和社会内涵的博雅教育 ,塑造了英国人的“绅士”气质 ,所以有人说 ,“如果没有剑桥、牛津 ,英国几乎什么也不是”。而德国 ,是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 ,柏林大学则成为“现代大学之母”。洪堡倡导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办学理念 ,使柏林大学很快成为近代大学的典范。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的崛起 ,将世界带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又很快使大学成为社会知识网络的中心。未来的大学将是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的园地 ,也是社会先进知识的象征 ,更是财富创造者和社会管理者的摇篮。大学的“政治行动主义”热情 ,同样也会使大学成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中心 ,大学通过文化的影响和科学知识的传播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

近代德国著名教育家、柏林大学校长洪堡把大学界定为以纯知识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sup>[1]</sup>而纯学术的研究活动正是大学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内在依据。据此 ,大学应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和对纯粹学术的强烈追求 ,而不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需要。而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则说 :“我认为现代大学的最重要的职能 ,是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深入研究各种现象 :物质世界的现象、社会世界的现象、美学世界的现象 ,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发现相关事物的关系。”<sup>[2]</sup>

看来著名学者之间的解释也有一定的区别 ,而大学生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呢 ?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观点 :

“大学不是工厂 ,不是流水线 ,它的每一位学生看每一位老师 ,每一位老师看每一位学生 ,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是一份‘杰作’。”



“我理想中的大学像一座千年庭园。她古朴,但不古板。她是庭园,却敞开门扉。进来的时候,双眼迷茫,走出时,双眸澄澈。智慧之火点燃了她的心,她的使命是传扬这生生不息的智慧之火。”

“我希望大学像知识的海洋,有丰富的书籍和优秀的教师。我希望教师能走下讲台,走近学生,带给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

“大师面对年轻的学子,不沾世俗的交流开始了。他们从高处审视这个世界,把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用睿智的语言教诲我们。”<sup>[3]</sup>

显然,著名学者和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和学生对大学的感受更是很大的区别,即使是研究大学教育的专家们,对大学认识也不完全一致。而我们的先哲有着自己的解释,《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们要求大学具有重要的社会使命。蔡元培说“大学者,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之“进入象牙塔”,一个重要“通行证”就是“高深学问”。由此看来,古今中外尽管对大学的解释各有不同,但都充分肯定了它所具有的以“高深学问”和以进步的价值观、道德观培养学生的根本要求,大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义,也是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

而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对大学也有自己的解释<sup>[4]</sup>: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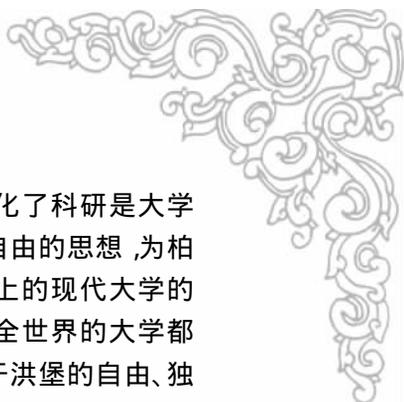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弟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

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梅贻琦先生的解释,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大家对大学的十分传统的说法,当然,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无疑会觉得有点落后。因为,中国对学识的见解,往往只停留在对历史、文化等人文学科领域的认识水平上,科学工程技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占据它应有的地位。但是,对大学的认识,特别是对大学培养人的重要性的阐述是精彩的。所以,梅贻琦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多次强调“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国内外颇为著名的学府,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大学精神,更是流芳后世。

梅贻琦先生提到的中国的大学“实自西洋移植而来”,而西洋的说法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众多大学研究者和国内外学术界大多认为:现代大学制度之诞生的标志,是洪堡(W. von Humboldt)在1810年受命组建柏林大学。尽管在柏林大学之前,欧洲已经有了不少大学,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最为著名,最早的可一直追溯到12、13世纪。从形式上看,柏林大学像其他大学一样仍然包括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四个学院,但洪堡和柏林大学的其



他精神之父们所阐发的大学的理念,特别是他强化了科研是大学的关键成分的思想,以及大学的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的思想,为柏林大学灌注了独特的生命力,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的始祖。这不仅影响了德国的大学,更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大学都有深刻的影响。现代美国大学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洪堡的自由、独立的学术研究理念。洪堡等人的大学理念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统一:大学活动的非政治性质与大学建制的国立地位的统一,科学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和科学对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启蒙意义的统一,教学和研究的统一。这对于培育独特的大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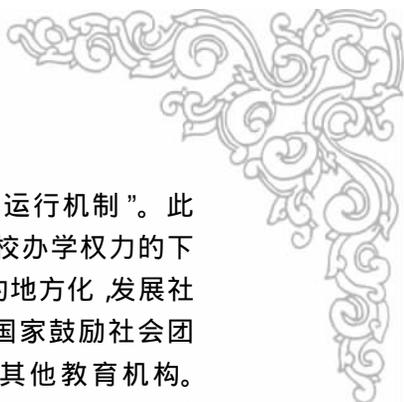
德国希望柏林大学的创建能尽快弥补被法国攻击而失去的几所重要的大学,并且,希望能通过柏林大学的创建,为战败的德国的重新崛起作贡献,努力用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损失。所以从一开始,柏林大学的办学宗旨就是服务于国家利益。但在洪堡等人看来,为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他们设法向统治者表明,恰恰是这种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才更符合普鲁士作为一个文化国家的根本利益。<sup>[5]</sup>

而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英国大学,尽管在西方的大学发展历史中也占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它突出的英才教育传统和平等教育理念,对许多英美国家,尤其是对英联邦国家的大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人重视宗教,最早的大学受制于教会,英国人也很注重风度——绅士作风,所以,英国大学的人文理念是十分强烈的,同时,强盛时期的英国对大学的统治十分严厉,因此,同时它也受到政治的影响,缺乏独立和自由的大学风格。它在大学发展历史中,尤其是在突出大学的科研和学术地位概念上,远没有柏林大学的影响深远。

这里所说的“学术”,德语的说法是 Wissenschaft。这个词大致对应于英语的 science,但又与之有重要区别。英语的 science 通常指自然科学,或者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数理科学。但德语的 Wissenschaft 则包括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且也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洪堡还致力于大学学术文化的建设,这种学术文化包括学术思想、学术权力、学术观念,他奠定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成为大学办学的基本思想、基本价值和准

则,也是大学精神的本质所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则是这一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作为这种意义上的“科学”赖以存身的社会建制,大学(University或Universitaet)必须真正是“大”学:不仅是学校规模大,而是学科范围广(universal)。只有以这样的价值观为核心的大学,才能培养出洪堡所追求的“全面人格”(vollstaendige Menschen),才能使大学真正成为全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典范和中心。也正是有了洪堡的大学理念,吸引了当时德国的许多著名的学者成为大学的教授,而诞生了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一批伟大哲学家,并且都以他们在哲学领域非凡的科研学术成果,对德国现代大学的创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黑格尔还亲自担任过柏林大学的校长)。这一切使德国不仅成为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成为哲学的故乡。由此看来,至少在历史上,学者和家人们对于大学的理念是有共识的,即至少定位在两个方面,就是培养优秀的人才和从事科学研究。

目前中国又需要怎样的高等教育?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有点愚蠢。有学者一定会说,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八章六十九条已经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部法律几经修改,已经比较成熟地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有了十分明确的法律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推进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从1985年5月27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近年来中央和教育部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件,都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各项内容作了具体规定,某些内容甚至还排出了时间表,加以落实。如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我国原有高教体制的弊端之一,就是“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管理起来”。《决定》在我国第一次突破了高等教育体制仅仅局限在狭小的领导管理权限划分的旧有条框,明确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发表,为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道路。这就是“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通过立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与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学校要善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应负的责任,建立起主动适应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此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如高校办学权力的下放,高校间的联合、兼并,原部委院校办学自主权的地方化,发展社会力量办学等。在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中,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1999年,我国政府启动了普通高校扩大招生规模政策。2001年,我国各类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1300万人,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3.3%。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千呼万唤始出来”,制度突破给高等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但是,法律只是原则性的,而且关于《教育法》的司法解释也是很少的,至少是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执行规则的制定上面没有明确的说法。因此,由于立法的困惑,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观念和政策上的分歧。恰恰是这些分歧,使得我们在高等教育的管理上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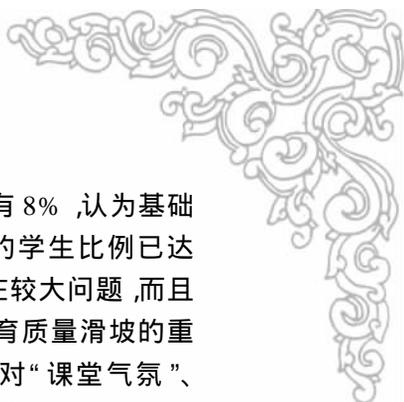
## 高等教育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始终强调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一直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而努力,也就是说始终把培养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制定了许多方针政策,为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和政策基础。1985年5月27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都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尽管1989年以后,高等教育的改革步子有所放慢,但国家和政府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没有停止,尤其是政府对办学体制的调整,实施“211”等一些旨在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振兴工程,以及将一部分高等院校下放、兼并等措施,使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我们也看到了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是供需矛盾尖锐。近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也使原本发展不平衡的大学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一些大学也感到了生存危机。而另一方面,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不断的高速增长

而日益强烈,使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异常突出。我国政府又于几年前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方向,紧接着出台了高等院校超常规扩大招生的措施,短时间内在校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高等教育的招生和在校生规模继续快速增加。200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900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382.17万人,比上年增加61.67万人,增长19.24%;在校生1108.56万人,比上年增加205.2万人,增长22.72%。而1999年的《公报》指出,高等本专科教育共招生275.45万人,比上年增加66.95万人,增长24.31%。其中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32万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413.42万人。在校学生的快速增长,使得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

其次,出现了教育质量“滑坡”现象。“扩招”政策使得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迅猛增长,据统计其直接带来的后果是“硬件不足、经费短缺”,从而导致了許多院校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教学质量下降的情况。北大、清华、人大等几所名校首先看到了“扩招”带来的问题,宣布2003年不再“扩招”,接着武汉大学不但不扩招,在2003年本科生反而比去年少招1000人。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01年3月29日中国新闻社就有《专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严重滑坡》这样一则报道,报道说:“受教师队伍中出现‘断层’、行政干预过多、高校创新受限等因素制约,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出现严重滑坡。2001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落至第29位,科学技术由第13位滑落至第28位,国际竞争力由第24降至第31位。”2001年3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说,清华大学刘西拉<sup>[6]</sup>教授在一所著名高校的两个工科系进行细致调查后认为,上述报告显示的问题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有关。从学生对整个教学环节的满意程度来看,认为“很满意”和“满意”的学生只有5%,认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学生达53%;感到学习负担“比较重”和“很重”的学生共占66%;认为在大学苦读几年后,“能学到一点点”和“根本学不到”有用东西的学生占79%。刘西拉分析,这个结果表明当前高等教育让学生负担沉重却又学不到什么东西。而对于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其他问题,调查



显示在课程设置方面,认为专业课设置合理的只有8%,认为基础课设置不合理的有18%,认为“选修课不合理”的学生比例已达72%。刘西拉认为,这表明当前高校课程设置存在较大问题,而且本科教育中的选修课普遍不受重视,也是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的重要原因。在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方面,学生们对“课堂气氛”、“教学系统性和启发性”、“教学方法和手段”方面的评价虽然整体上予以肯定,但有的方面不合格率大于15%,尤其是在“整体教学效果”和引起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方面评价普遍不高。刘西拉说,这反映出师资队伍教学经验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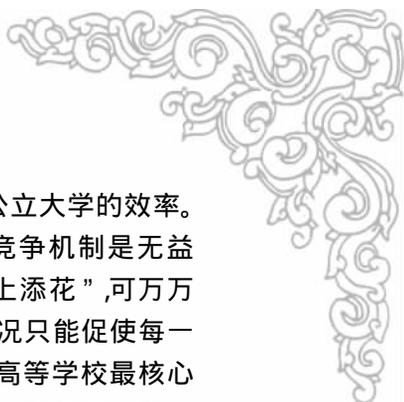
据刘西拉教授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学校普遍存在“浮躁心态”,热衷“轰动效应”。为了短期内迅速提高各种评比指标而重金奖励作者,不顾其他;为了提高学术知名度和争取课题,拉一些社会名流或官员到高校当领导、做教授,制造舆论,不计效果;为增加科研收入,不论技术含量,只要来钱就行。因此,很多教师不在教学上投入。第二,行政干预过多,限制高校创新。每个学校应各具特色,不同的受教育对象应有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材,因此应鼓励高校创新,可以迅速引进国外优秀教材,也可以鼓励教授各自编写有特色的教材,而当前由于行政干预,许多高校和高校教师无法实现这些教育改革。第三,教师队伍中出现“断层”。“文革”前毕业的教师大都到了退休年龄,而年轻教师普遍缺乏实践经验。

而“扩招”以后带来的一些相关问题应该是更为严重,不然,一些著名的高校何以要在“扩招”的问题上踩急刹车呢?尽管官方媒体一再强调,三年“大扩招”没有影响大学的教育质量。争论的主要焦点是我们要用怎样的衡量标准,遗憾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出台和执行过各方认可的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体系。但从现在的大学生对高等学校的满意度来说,这种下降趋势是明显的。而研究生“扩招”也出现了同样问题。2004年2月9日,搜狐网站发表一条消息称:“2004年全国的研究生招生人数将达到33万,比2003年增长22%。连年大幅度的研究生‘扩招’,已导致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江苏省教育厅的数据表明,2003~2004年度全省全日制在校研究生4.87万人,另有在职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人员1.2万人,全省高校共有导师7846人,师生比达到1:7.74,事实上,一些热门专业的热门导师一人带二三十个研究生根本不足为奇。不久前,

上海市某名牌高校的九位博士生因不满导师让他们长时间地为自己的公司做项目,疏于对学生本身学业的指导,遂向学校要求‘炒’掉导师。原本敢怒不敢言的学生终于发出了怒吼,研究生和导师的矛盾终于被激化。”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我们不能再对“扩招”带来这样的问题置若罔闻,仔细分析这里的一些具体问题可以发现,它涉及了相当复杂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些重要内容。

还有就是高等教育管理观念的错位。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高等院校的社会地位,长期计划经济的体制不可能让高等院校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实体。政府控制学校的招生指标、毕业文凭、学位授予、财政拨款、干部任免、人事制度等等。政府对学校的过多的行政干预直接导致了高等院校目前的困难状况。对于大学的定位,政府部门一直没有在观念上很好解决,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直接管理使得现在的大学校长们穷于应付,为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而到处奔波,根本没有办法和精力来专心于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准。

我们应该看到,对高等教育采用等级管理的观念是十分有害的。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我国现有普通高校1552所(《2003年教育事业统计公报》),分成部属学校(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地方大学和一些少数行业管理的学校,各自管理的属性有许多差异;另一方面,先是将高等学校分成一般高校和重点高校,后来,政府又决定重点支持建设一百所大学——“211工程”,这个竞争过程许多大学领导是深有体会的。2003年年底又正式公布了一个重中之重建设的34所高校的“985工程”目标,这种分等的管理理念可能和国家急于突破我国在国际高等教育界的落后地位有关,也许是为了能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尽快占有一席之地,政府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中对高等教育管理的不利影响也很大。管理学中有一个“水桶理论”,就是说衡量一个管理体系的真正水平,是要看“水桶”上最低的那个缺口的位置,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话,不知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这也使我联想到我们国家过去曾经建设了许多国营大中型企业,甚至是超大型企业,结果呢,在市场经济中成为了改革的难点。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始终依赖政府支持,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原动力。美国是个发达国家,它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支撑更多的公立大学的运行,为什么还要发展私立大学?很大



的原因就是要形成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来提高公立大学的效率。而我们现在的这种管理方法对形成一种公平的竞争机制是无益的。如果说政府的意图是要给基础好的学校“锦上添花”,可万万不可忘记“雪中送炭”,这种严重“两极分化”的状况只能促使每一个高等学校想方设法“争宠”,争学校的地位成为高等学校最核心的工作,谁都清楚有了一定的地位,也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最优惠的政策和更多的财政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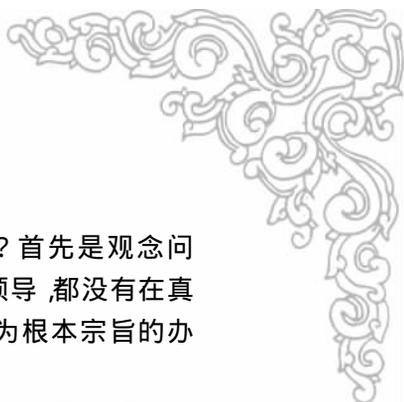
最近作者注意到,许多专家和学者在网站和其他媒体上热烈讨论怎样把我们的一些高等学校建设成世界一流的高校,说不定会出现政府重点支持进入国际一流大学的更加“重点”的学校名单,其实,海外的媒体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报道,当然也是猜测,不足为据。我觉得这种主观愿望是好的,值得赞扬,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去实现这样的理想。但我认为这不是十分现实的,我们不能摆脱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来讨论单纯的教育问题。我想请问:何谓世界一流大学?它是一种怎样的评价体系?谁能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世界一流大学有几家?世界排名前一百所大学是不是一流大学?还是前五十所?其中亚洲又有几所?从什么角度来衡量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北大、清华在世界排名第几?我们是不是想建设几所“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我觉得这种讨论意义不大,从硬件的角度来看,就凭我国的经济实力,我们可以造几个甚至几十个“世界一流大学”。教师呢?我们有多少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学生呢?就凭我们现在还在争论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的基础教育体系和教学方式,能培养出多少可以适应世界一流高校教育的学生?何况还有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教育制度的束缚。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国情,更多地研究一些世界上可以称为一流的高校,去认真地体会一番世界一流高校的概念,再思考一下我们的高校离它们有多远。我们不要把精力花费在无谓的争论上,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高等教育问题。中国的国情告诉我们,在教育领域与世界的接轨,绝对要比有着“从黑发到白发人的”的艰难的谈判过程的进入WTO难得多,对这一点,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士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 大学的评价

对大学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考核,这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建国以来,一直没有一个以法定文件公布的对高等学校的全面的评价体系和标准,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高等学校的评估,使得高等教育的评价一直是模糊的。但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一些教育权威机构出台的诸如对中国高等学校实力评价、排行榜等等,都成了对高等学校的事实上的评价标准。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许多文件,涉及教育评价的部分,始终把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科研成果等硬性指标放在第一位,而对于学生的培养质量问题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对人才的质量评价确实很难量化,但不能不说在我们一些领导的主观观念上,没有重视人才的质量问题,导致了许多高校领导的“兴奋点”不放在抓教育质量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微词,学生对学校教育管理的抱怨,家长对教学质量的失望,以及一些关注我国高等教育的人士的批评,都给我国的高等教育蒙上了阴影。应该说教育主管部门也看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对教育质量下降提出的社会批评。近几年推出的全国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质量评比是一个重大举措,然而,实际运行状况似乎很不理想,我们不能指望它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转变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和评价体系,就不可能彻底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状况。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正式成立,专门从事对全国高等教育的评估,基本上要求对全国的高等学校每五年进行一轮评估,相信这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也许有人不同意对高等教育存在问题的基本估计,理由很简单,因为高等院校发展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支持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无论是学校规模、师资队伍建设,还是教育设施投入、科研成果等等都有长足的进步。当然,作者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些令人啧啧称赞的成果。作者以为,恰恰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注重于学校的外部扩张,而忽略了内在教学质量的提高,可以说是目前高等教育发展



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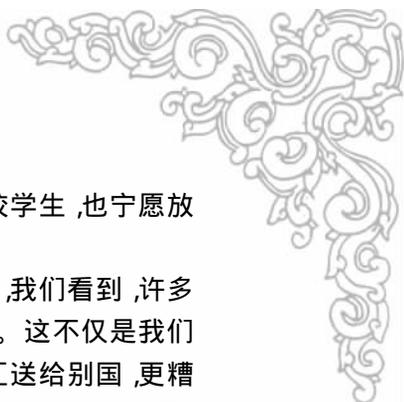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出现呢?首先是观念问题。不管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还是高等学校的领导,都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将办学思想彻底扭转,确立以培养人才为根本宗旨的办学思想。

一是长期以来对高校的定位问题出现偏差,也就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高等学校的定位和职能问题。简而言之,由于高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许多学者突出强调了高校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地位,而忽略了其对人才培养的职能之所在。事实上,学校不同于科研机构,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它凭着人才优势,承担了国家的许多重要科技项目。但我以为不能因为它的科技功能的重要性而抛弃了它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和职能,更不能把科技成果作为衡量学校的首要标准,或者当作进行排名的依据。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更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以培养人为核心的高校质量评价体系。有些学者建议,把高校分成研究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型或者教学型大学,我以为,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而言,这并非良策。要理顺我国大学管理的分类机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现在,需要的是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调整,尽快建立起能让高等学校公平竞争的良性机制。眼下一些学校过分宣传这样的观点,无非是想模糊教学和研究的矛盾,给一些著名高校存在的教学质量问题穿上一件合理的外衣,不客气地说只是一种逃避教学质量问题的借口而已。在国际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区分,美国将高等学校分成三类,一类是处于大学体系顶端的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等等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二类是进行本科人文和科学教育的学院,很多是四年制学院;三类是社区学院,可能与我国的职业技术学院相类似。但他们的国情不同,可以说许多发达国家的的大学生平均入学比例很高,相关数据显示,英国的高等教育平均入学率2002年达到38%,1995年,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芬兰、新西兰、挪威和韩国等7个国家的毛入学率超过了50%,我国经过三年超常规的“扩招”后,2002年毛入学率只达到14%。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丰富,许多大学存在着生源紧缺的问题,他们完全有理由让一些大学重点发展研究功能,成为研究型大学。但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紧缺,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而且还处在较低层次的

运行,青年学生上大学难的问题也亟待解决。在人们的观念里,一流的高校当然意味着一流的教学、一流的名师以及一流的教学设施。科研成果的辉煌当然是一个学校的辉煌,但如果我们不能把这种辉煌的成果转换成学生的营养的话,受教育者丝毫不能受益。

其次,目前的管理机制导致了高校主观上重视科研,而客观上牺牲了学生利益。学校作为一个教学实体,应该制定一系列的教学鼓励政策,真正扭转目前的状况,一心一意把教学质量搞上去。作为一个教学实体,是否把培养人才作为己任,是一个学校在培养人的问题上成败的关键。目前的高等院校,把工作的兴奋点锁定在如何扩大学校的规模以求得国家的教育投资,如何争取到更多的硕士、博士点和学科建设上,以取得更大的成绩,提高学校的地位。由此而出台的奖励政策、师资队伍建设的政策、职称政策无不向科研倾斜。这一切都是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和投资机制所决定的。无怪乎一些偏激的社会人士指责高校,“你们大学里三分之二的教授不在好好教书”。如果深究,有些学校恐怕还不止三分之二,一些高校甚至出台政策设置科研专职岗位,让那些有潜力的优秀教师脱离教学第一线,去从事科研工作。试想,这难道不是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吗?

再次,随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的投资体制已经向多样化转变,从教育需求一方来说,要求提高高等院校教育质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以科研成果为主要评价标准的高校评价体系,已经不能体现受教育者的根本利益。由于教育的国家垄断一直没有被打破,国家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管理观念、人才培养模式、人事管理方式等等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以往实施的许多改革措施,根本没有触及高等学校改革的实质性问题,使得教育改革已经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能适应现代国际教育竞争的需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独生子女家庭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追求的是一流的教育资源,而且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并不在意学校的科研地位。许多理性的家长在为子女选择学校时,更加关注学校的教育质量,更加关注学校是否以培养人才为己任。遗憾的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滞后,已经开始丧失了国内的高等教育市场。在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家庭由于对国内的高等教育丧失信



心,而把子女送到国外求学。甚至许多优秀的在校学生,也宁愿放弃国内的教育机会而出国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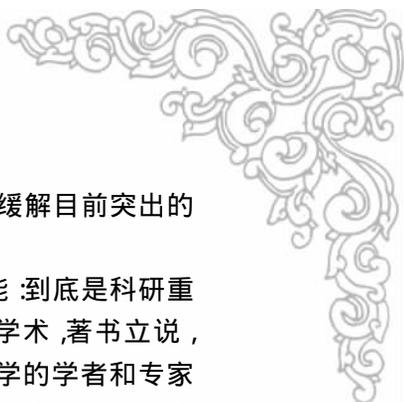
留学并非是件坏事,应该说还值得鼓励,但是,我们看到,许多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是出于对国内教育质量的不满。这不仅是我们把拥有的教育市场拱手让给了别人,把大量的外汇送给别国,更糟的是,由于对国外教育市场缺乏了解,家长对国外教育盲目崇拜,导致许多学生非但没有机会接受国外的良好教育,反而陷入了留学的误区,造成人才的损失。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国外的一些劣质学校和国内的一些中介机构相互勾结,进行留学欺诈,已经致使许多学生受骗上当。像这样的一些突出事例已经见诸报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反思。如果仍然将我们这种观念和体制继续下去的话,试问 21 世纪,靠谁来培养国家自己优秀的建设人才?当然,在现阶段,中国的公立学校是不可能倒闭的,因为有政府的支撑,高校也不会招不到学生,因为有如此庞大的人口。问题是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仍然是停留在低水平,那么我们如何来应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挑战?

其实,高校是以科研为中心,还是以教学为中心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中世纪,有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如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有以教授为中心的大学,如巴黎大学。当时,科研不是大学的职责。而老牌的英式教育也是突出人文传统和平等思想的教育。19 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德国教育家洪堡为首的教育改革家们,发起了这场高等教育改革运动,赋予了大学科研功能,建立起新型的大学模式。改革后的德国大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强调科研作为大学职责的一部分,实行教学与科研的统一。(2) 改革大学的结构,建立讲座和研究所,为新兴学科和科学领域提供教学和科研的基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洪堡并没有就此忽略了大学的教学和培养人才的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吸收了英国大学人文教育的传统和德国大学科学研究的特征,同时,注重大学之间的相互竞争,开始构筑自己的大学体系。高等教育发生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高等教育从为少数人独占向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国际上大学改革潮流的影响,也使高等学校在学制等方面实行结构类型的多样化。美国的大学慢慢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学,一种是

研究性大学,主要是一些具有雄厚学术力量和研究基地的大学,偏重于培养顶尖科技人才的大学,它们有着国家强有力的财政支持,也能得到私人基金会的巨额资助,基本垄断了世界最尖端的科学研究;第二是以进行本科人文和科学教育为主的一般性学院,以培养社会分工对人才培养的要求;第三种是“社区大学”或“社区学院”,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实用性人才,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直接为社会服务。但是,不管怎样的区分,世界各国都把传授知识、科学研究和培养专门人才作为高等学校的首要职能。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不断明显,美国大学用区别管理的理念,使科研、教学、服务的功能有效地在不同层次大学得到和谐的结合,使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形成一个协调的体系,使得一些大学能摆脱沉重负担,努力发展自己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这种管理模式正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而成为学习的典范。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研和教学原本就曾分离。到了19世纪末出现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尽管这一类大学的创办有着其历史偶然性(普法战争)。后来,人们也力图在学校内部把教学和科研两项职能协调起来,又由于过去一直是精英教育时代,高等教育数量和规模都相对较小,人们对于这一错误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忽略不计。而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时代,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要想把“教学与科研”在大学的办学理念上达到完全的一致,难度也越来越大,相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各种弊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国高等教育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将这种矛盾进行合理的调整,重要的是应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模式来加以解决,力图使大学的科研和教育职能在高等教育体系内得到平衡、协调。而一般来说,目前世界上较多的发达国家,或者称之为富裕国家的大学“大众化”进程比较快,他们采取美国的大学管理办法来协调科研和教学的关系,而相当多的不发达国家,由于经济的落后,大学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时代,这样的矛盾在大学内部的协调依然存在着许多困难。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向大众化方向发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十分突出,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教育差异十分巨大,在向“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迈进的过程中,大学管理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十分尖锐,要彻底解决两者的矛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强调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以缓解目前突出的矛盾。

其实,现代大学也许确实很难把握好它的职能:到底是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大学的学者们埋头于自己的学术,著书立说,陷入了“不出版,则死亡”的痛苦境地。很少有大学的学者和专家深入思考自己的存在是为了什么,而占大学生主流的本科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热情却被冷落,得不到导师的指点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事实上,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在本科阶段是没有专门导师的,大学也就彻底地被“异化”了。但遗憾的是,大学也不能成为科研机构,因为它招收了如此多的学生,无论如何教学是学校的第一职能。这种矛盾使在校学生不能得到很好的教育服务。为了研究大学中教学职能与研究职能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米凯拉克等在一所普通大学进行了5年的调查。他们发现,教师研究成果与教学效果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很低。他们指出:“究竟学术研究和发表作品能否促进教学,目前尚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作用的话,也不会很大。”<sup>[7]</sup>迷失了发展方向的大学相信这个实证研究的结论:教学与科研可以分离。在许多国家的教育机构,教师的教学业绩决定他的薪水。而在我们的一些所谓的研究型大学里,这样的教师可能只是“教书匠”而已,他的地位也远远低于不善于教学而善于科研的教师,这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使然,客观上也损害了教师们的教学积极性,也导致这些教师为了评职称而忙于出科研成果。这无疑会对学生的成材产生不利的影响。

其实,大学的教学职能同样应当得到校方充分的重视。从大学产生的基本意义上来说,教学是大学的本质,洪堡倡导大学强化科研职能,开展自由的学术,也并非是要抑制教学功能。只是在以后的大学发展中,强调科学研究的倾向,直接创造了丰富的科研成果,推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大学也因此而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学术地位。美国“硅谷”的成功经验就是典型的例子。于是,在美国就有了研究性大学、教学性大学和服务于社会的社区大学的分类。其他各国的大学也试图模仿这样的大学发展模式,一方面是出于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快提升大学的研究能力。这很容易使得一些大学片面强调科研而忽视基本的本科教学。其实,即使是像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典范——哈佛大学,也始终强调本科生教育的中心地位。

而英国政府也一直将国内所有的大学置于“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的严格监管之下,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对大学进行外部评估,对某一专业的教育质量予以鉴定。而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就各个高等院校如何向自己以及外部资助者保证课堂和证书质量进行外部审查,审查结果也以书面的形式发表。这两家机构于1997年秋季合并,成立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以保证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借鉴的宝贵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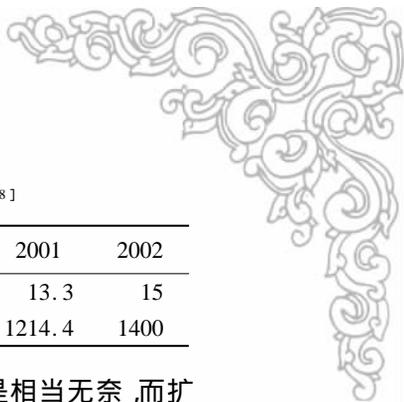
在我国,针对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更应该重视目前高等教育面临的困难状况,重视高校的教学工作,扎实地提高教育质量。经过几年的“扩招”,我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研究解决。

首先,大规模的“扩招”政策,导致了許多大学学生数量膨胀,也使得高等学校的师生比例严重失衡。

国内教育需求不断扩大,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寄予厚望,迫切希望政府能采取有利的措施,支持高等学校加快体制改革,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顺应时代要求,大力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可是,大规模扩大高校的招生数量对高校自身发展,特别是对学校的教育质量,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晌。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急剧增长,2003年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382.17万人,比上一年增加61.67万人,增长19.24%,在校生1108.56万人,比上一年增加205.2万人,增长22.72%,是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总规模340.87万的三倍多,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

另一方面,这也使得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再刷新:1998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1999年为10.5%,2000年为11.3%。2001年,我国政府在《公共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将原定2010年实现高等教育规模和入学率的目标进一步提前到2005年实现,2001年,全国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为13.3%,到2003年,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19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7%,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实现比“十五”计划提前了3年。

下列表格是近几年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统计:

近年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在校生规模<sup>[8]</sup>

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9.8	10.5	11.3	13.3	15
在校生人数(万)	643.0	742.2	939.9	1214.4	1400

大规模地扩大招生是政府行为,学校对此也是相当无奈,而扩招带来的问题却必须要由学校来解决。政府虽然也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但都相当有限,特别是对高校的师资队伍充实、质量的提高、教师待遇的改善,都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学校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不能满足培养人才的需要。人民网2004年2月20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难以保证培养质量 一人带47名学生 研究生导师亟待“减负”》,报道引用了北师大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王建民最近做出的一个调查报告,称“一位从事法学理论专业的教授指导的研究生人数最多达到了47名”!据王建民介绍,由他组织的对北京20余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研究生培养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热门专业导师每人带20名以上的在校研究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而带研究生最多的一位教授所带学生人数达到47人。王建民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高校为了追求研究生的数量而盲目“扩招”,但师资力量短时间内又难以跟上造成的。研究生尚且如此,我们就可以想像本科生的情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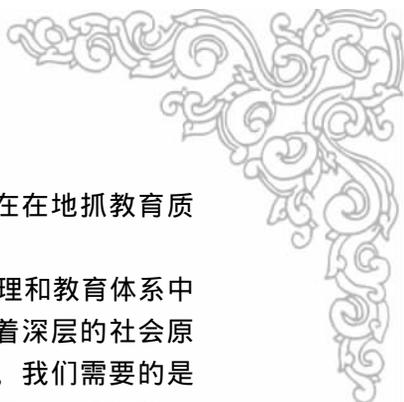
其次,近年来,多种原因导致了高校师资的大量流失,也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教育质量。

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知识成为了资本,也成为了社会分配的基本要素,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过去教育的落后,导致了社会各类人才的奇缺,尤其是在经济建设领域和社会管理领域最为突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尤其强烈;另一方面,高校的管理改革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教师待遇得不到很好的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的经济杠杆作用自然会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了高校许多教师,尤其是骨干教师,流失十分严重。国家鼓励人才合理流动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这个政策确实为社会人才的合理使用提供了良好的人才配置政策环境,但客观上,对高等学校的教师的流失来说,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政府加大了对紧缺专业的人才培养力度,但教育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决定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使得社会很难在短时期

内缓解人才供需的矛盾。而且,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又十分突出,也造成了供需状况的不平衡。对于高等学校来说,优秀骨干教师的培养无疑时间更长,要求更高。因此,我以为政府没有很好地解决教师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待遇问题,是导致高等学校师资流失的根本原因。我并不是反对高校教师的合理流动,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必然,政府的管理和经济建设,都急需高质量的人才,高等学校的教师能在社会建设和发展领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也是一种社会的必然选择。事实上,选拔一些优秀的高校教师充实到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一直是我们的干部政策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依靠发展高等教育以解决人才供需矛盾,而将现有的高校教师选拔或引导到社会,因此而导致高等学校优秀教师的青黄不接,无疑是“杀鸡取卵”之举。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一方面“扩招”以后,学校在校学生的数量急剧增长;另一方面,学校教师的流失又十分严重,并且没有能够得到缓解的迹象。这对高校学生培养质量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近几年来出现的教学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实现收费政策以来,一方面大学的收费不断提高,而且又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教育质量又不断地滑坡,这就导致了社会公众和舆论对高等教育的普遍不满。

第三,在办学理念上的急功近利思想,导致学校在管理政策上出现了严重失衡现象。

高校有着与社会相同的许多弊端。在管理上,集中反映出的就是领导层的急功近利思想。每一任领导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一届领导的政绩如何体现,始终是领导者重视并为之努力的。把学校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相比较,谁都明白,孰易孰难。规模的扩张,设施的改善,学术成果的增长,学位点的增加都是可圈可点,有案可稽,有据可寻的“显形”政绩。而教学质量、人才素质等软件是“隐形”的,加上多年来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从来就没有认真地研究和制定过对高校的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体系,即高校人才质量和教学评价体系,也一直没有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个检查和监督的职能。说白了这也并不奇怪,社会肌体中存在的那种浮躁心态、官僚作风同样也会侵蚀到教育系统。所以,清醒的教育研究者应该看到这种浮躁的心态,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系内存在的许多顽症的根源。主管部门不愿意认真地来抓教



育质量,学校不情愿也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来实实在在地抓教育质量,这样的心态不可能不影响到教师和学生。

所以,我以为,指出目前我们的高等院校的管理和教育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许多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但这些问题存在是不可回避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有一个环境和氛围,让高校的管理者真正静下心来抓好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莘莘学子有一个真正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机会。笔者从来没有指责现行的教育体制,也没有想抹杀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绩,只是以为发现问题、指出问题是我们研究高等教育现状的学者的义务。从观念领域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们需要对现代大学重新定位,本着对学生负责的精神,更是对未来人才培养的负责精神,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我觉得这样的时代,需要更多真正能把学生的培养作为其根本宗旨的学校,需要更多的教育家把学生的成才作为其一生奋斗和工作的目标。

#### 注 释

[1] 转引自杨桂青:《象牙塔内外的尴尬: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理念》,见《中国教育报》2003年11月15日第四版。

[2] 参见《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作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成功实践者。

[3] 参见杨桂青:《象牙塔内外的尴尬: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理念》,见《中国教育报》2003年11月15日第四版。

[4] 梅贻琦,著名教育家。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引文载《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5] 参见孙承武编著:《聚焦世界十大名校》丛书,第二部第八章。

[6] 刘西拉: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7] 转引自刘凡丰:《再论大学的基本职能》。

[8] 本节引用的相关统计数据均来自于教育部1998~2003年《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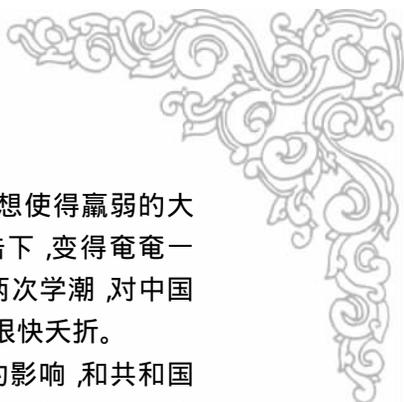
## 第二章

#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政府的职能

政府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它在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和其在经济建设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一样,政府的职能也应当更加适合社会变革时期的特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需要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地发挥其领导职能。在教育领域同样需要政府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从科教兴国的大局出发,发挥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和管理职能。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探索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作用,也是教育管理学的课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2年下半年,我国政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之后,对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当时任高教部部长的马叙伦先生曾撰文总结:“这次院系调整时依据前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类专门人才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普遍设置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sup>[1]</sup>此次院系调整的涉及面之宽,程度之彻底,都可称得上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之最,对我国近四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影响颇为重大,对繁荣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大学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带来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勃勃生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很快又彻底扼杀了高等教育的繁荣,高等教育遭遇了灭顶之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开始了新的复苏,随着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社会事业的蒸蒸日上,迎来了高等教育第二次繁荣的大好时机,但由于高等教育的先天



不足,又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接续,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羸弱的大学在一拥而入的西方学术思潮和商业文化的冲击下,变得奄奄一息。校园里激进的“政治行动主义”热情,演绎了两次学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高等教育的第二次繁荣很快夭折。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受到国家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和共和国一起走过了崎岖曲折的道路。尤其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磨难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始终走在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上。随着国民经济的强势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政府对教育的重视超出了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提出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大幅增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国的教育无论是教育基础设施、教育经费、教师待遇、受教育人数,还是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国际竞争力都比过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国家强有力的支持,高等教育不仅逐渐开始追赶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也诞生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科技的支持,尤其是培养出来的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为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期待着高等教育再一次繁荣的出现。

同时,我们也看到,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国家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进一步要求,国际科技水平的日益加快,都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我国高等教育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必须直面国际科技发展、人才竞争的挑战,国家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发展要求的挑战,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困难的挑战。可以说,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教育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场新的教育“革命”。在这场教育革命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政府具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国家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所以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和教育的繁荣,都取决于政府的决策。幸运的是我们几代领导人,始终将教育列为国家、社会发展的首要事业,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把教育事业的发展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随着国际科技发展的不断加快,知识经济的浪潮滚滚涌来,高

科技不仅占领了科学发展的领先地位,同时也占领了国际社会、文化、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谁先掌握了高科技,谁先拥有了高科技,谁就拥有了人类经济、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但谁都不能忽略,谁也都不能忘记教育在科技发展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以及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高科技需要高质量的人才,高质量的人才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来培养。这个逻辑好像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优质的教育作为科技的支撑,作为科技的基础,很难想像我们能拥有科技学术的领先地位。

有一种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有些学者认为,我们把大量的财力投入到高等教育,希望推进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赶上世界一流水平,这不仅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而且是十分艰难的,不如用这些财力大量地鼓励留学,吸引留学人员归国,有效地利用国外发达的教育资源为国家培养人才,甚至可以参与国际人才争夺大战,不惜重金大量“收购人才”。简而言之,不如用发达国家的教育来培养自己的人才,或者,创办国家“猎头公司”专门引进国家所需的人才,就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专门用高薪来掠夺、网罗、控制世界一流人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事实上,这种方法也确实达到了一些效果。但凭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去竞争,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如果国内不能具备良好的生活、科研、工作基础和条件,再好的人才也会留不住,遑论吸引外籍人才。鼓励学生到一些发达国家留学是为了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和管理方法,学习发达的科技知识。国家也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希望出国留学人员能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绝对不会将自己的最先进技术奉送给任何落后国家,绝对不会将自己最先进的领域向别国开放。美国限制对我国的高科技输出,欧盟禁止对华先进武器的出口,日本一直只愿意将即将淘汰的设备卖给我们,说明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历史的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如果不想受到别国在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上的钳制的话,只有靠自己培养人才来占领国际先进知识领域和高科技领域。所以政府应当把发展自己的高等教育作为发展科技、培养人才的基础。



## 政府的职能

政府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职能,直接决定着高等教育发展前景。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表明,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十分重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直接推动更是关键。高等学校首先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因此许多著名学府常常被誉为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企业家的摇篮。近年,美国的哈佛大学明确提出要培养国家的领袖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正在从培养具有科学背景的工程师转向培养具有全球经济背景的工程师,使之成为企业经理和跨国公司的总经理。其次高等学校也是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诞生地,它不仅是先进思想的拥有者,更是先进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英国现代大学思想的先驱纽曼将高校定义为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 and 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由大学的教授和著名专家组成的智库,已经成为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经典模式。比如有着“超一流思想库”美誉的著名智库——罗马俱乐部就是典型的代表,它由一大批大学的教授和著名的学者组成,致力于人类全球问题研究。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是国际战略研究机构,是美国实力雄厚、门类齐全的思想库,拥有专业研究人员500多人,但它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聘请的作为顾问的著名专家有700多名。他们都在世界科学研究的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成为这些国家和政府执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高校的知识分子对科学、对真理的追求,首先需要的是政府的开放,包括学术领域的最大化、信息技术的无限性、学术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他们追求一种“大学的精神”——一种以“科学、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学术精神,和以此为中心建立的学术文化,这种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因此,有许多学者和专家呼吁建设我国的学术文化,继承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和梁启超先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大学传统,重新塑造一种中华民族崇高的大学精神。这一切都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

第一,实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特别是科学思想和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放,培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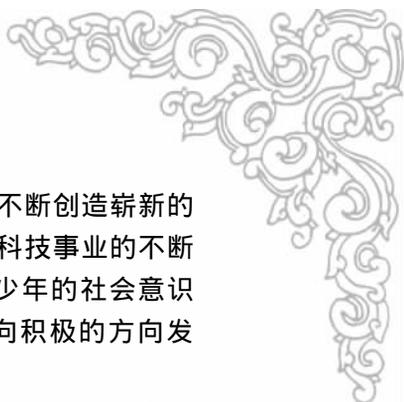
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一直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中国社会政

治斗争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开放是既敏感又十分艰难的工作,是涉及到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基于我们的国情,在真正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意识形态架构之前,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持审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的国门关闭得太久,我国的意识形态机制还十分脆弱,我们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经济文化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和补充,我国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仍处于较低的状态,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强有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政府对意识形态的开放十分谨慎,应该说这是一个负责的政府的明智之举。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国社会也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向建设现代化强国昂首挺进。经济的变革,带来了人们一系列观念的变化,人们的消费观念、生活观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改变旧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已经成为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追求,所有这些也必然会带来人们更高的生活追求和人生观、价值观的改变。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开放已经有了成熟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先进的通讯模式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无线通讯、互联网和发达的交通工具,已经进入了老百姓的生活。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入WTO等都加快了我国融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大潮的步伐,文化的碰撞和观念的交融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先进的意识形态始终将在未来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有领导的地位。我国要加快建设先进的意识形态架构,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灿烂文明,吸收人类文明的精髓,构建中华民族先进的文明和意识形态体系,应该说在当代国际社会发展的形势下,一定成为历史的必然,无可逆转。

高等教育处在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的领先地位,始终站在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先位置。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文化必将成为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积极鼓励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吸收优秀的文化遗产,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引导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科学体



系,鼓励高等学校运用知识的力量和科学的智慧,不断创造崭新的科技成果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全社会文化、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鼓励高等学校运用教育资源的优势引领青少年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在内的思想道德素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首先,要进行教育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科学的教育思想。我国的教育方针一直是十分明确的,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什么是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呢?当然要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具备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能力,具体的来说,就是小平同志强调的要培养“四有”新人,但具体到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时,我们会发现先前的各种政策无疑在对教育方针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一是,教育方针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的教育,当然也包括高等教育,其首要的也是基本的责任和功能要求是培养人;二是,要求我们的教育必须按照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这是两条最基本的要求。在中小学,现行教育的基本趋向已经开始逐渐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向,尽管事实上依旧十分艰难,毕竟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而有着龙头地位的高等教育实现这样的一种转换依然十分缓慢。因此,我觉得重新确立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种教育思想应该在吸取国外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精髓的前提下,进行不断的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开放教育领域,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交流和学习中扬弃那些落后的、陈旧的教育观念,建立符合具有知识化、信息化特征的现代社会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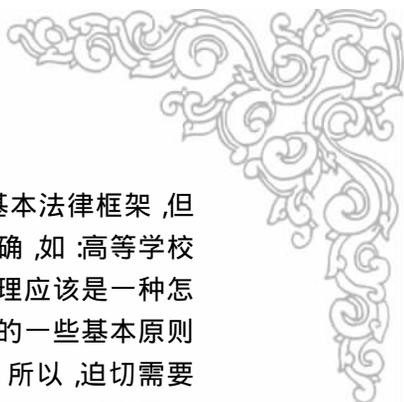
其次,创立一种良好的高等教育领导和管理模式。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直以来,高等学校的管理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政府没有在这一领域进行实质性的改革。相反,在这方面的犹豫不决使得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实施了一些较大的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如在全国实行“211工程”,进行较大规模的高校的调整、合并,进行了一系列推进高等学校科研、教学和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计划,加大对高等学校的投入。但是,涉及到高等学校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实质性措施不多。事实上,现行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教学体制、人事体制、投资体制

和收入分配体制等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政府对高等学校的体制改革的推动,需要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来实施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高等教育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种高等教育的整体改革,需要政府的卓越智慧、超凡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科技和教育系统一直是处在我国社会变革的核心,也是我国社会变革最敏感、最困难的部分,不仅涉及到我国政治、经济的变革,尤其重要的是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涉及到整个社会思想文化体系核心的建设和革新,这对于一个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封建意识阴影,至今一直处于外来意识形态压迫和包围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说,确实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第二,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适应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求。

政府的措施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也是根本。尤其是我国的教育体制仍然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体制,有学者指出“教育已经成为我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这一说法不无道理。我国的教育体制一直没有摆脱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模式,即使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尽管在我国政府的主导下,教育体制改革也进行了不少的尝试,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了许多积极的教育改革实验,但一直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这样一种模式下,在这样一种教育的领导体制制约下,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也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政府的措施包括:推动完善高等教育的立法和制定我国高等教育的长期发展战略;对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和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做出制度上的规定;明确高等学校的多元的投资体制和相应的管理措施;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求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本着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财政投资体制、学位制度、职称制度、人事制度以及相关的税收、金融和文化出版制度;切实改革高考制度,真正贯彻素质教育的精髓,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

第三,加快完善对高等教育立法。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于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这部法律基本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法律框架,但与之相配套的执行规则和相关的政策条例没有明确,如: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应该如何体现?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模式以及基本的原则等等,并且,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不能适应目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要求。所以,迫切需要完善对高等教育的立法,尽快制定出一部更加符合和贴近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法律,以及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没有法律和政策的支撑,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就没有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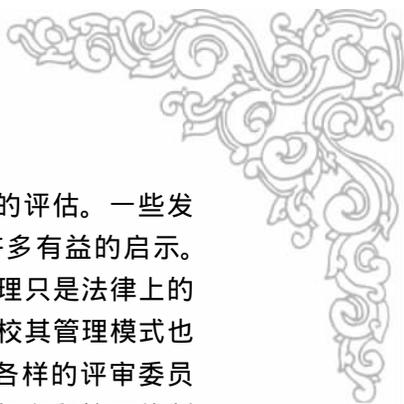
第四,建立和完善多元的投资体制和相应的管理措施。最近几年政府加快了对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全国人大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虽然没有达到一些民办教育投资者的预期,但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也说明了政府对民营资本投资教育的鼓励和支持。前不久,国务院又颁布了我国《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更是显示了政府对民资和外资进一步开放教育领域的决心。尤其是许多年来,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包括制定一系列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投资政策,对高等学校的重点项目和学科的投资政策,以及实施了鼓励地方政府投资教育的政策等等,拓宽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投资渠道,逐步实施后勤社会化改革,采取高等学校之间的强强联合,实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文理渗透等一些措施,合理使用高等学校的现有资源;下放部分部属院校,实行和地方政府联办共建等办法,打破条线分割,鼓励地方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支持。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大大加快了高等学校的发展,改善了许多高校的教育环境,增强了高校之间的合作,对提升高等学校的国际竞争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投资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发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投资,落后的教学设施、生活设施、简陋的实验室和教学手段,在大学校园里比比皆是,“吃饭财政”状况仍然没有根本解决。尽管提高了学费的收入,但对高等学校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仍远远满足不了“扩招”后的教学、科研等的发展需求,而学费的增长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发展依然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

教育经费问题已经使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长期以

来的教育观念导致“受教育权利论”主导人们的教育观念：认为教育应该是公平的，人人有享受教育的权利；认为高等教育是应该由政府来投资的，并且是低收费的。所以对民办教育大多持不赞成或反对的态度，理由是民办教育的投资者以盈利为目的，本质上就没有办教育的根基，加上目前的“纯”民办学校不尽如人意。前不久出现的公立学校的二级民办学院，又因有违教育竞争的公平性原则而受到民办教育投资者的攻击。我以为，在教育投资领域的突破，首要的原则应当是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国家对高等学校的运行体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盲目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只会妨害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战略的实施。

当前，高校收费制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以为，一是政府要建立科学的高校评估制度，在此基础上，分层次、按质量、有秩序地加大对高校的财政投入，用“效率优先、体现公平、照顾贫困”的原则，合理调节高校的收费政策。国家的教育费附加应当加大征收力度，尤其是对目前社会的高消费行业，如夜总会、歌舞厅、高尔夫等一些高档娱乐行业，甚至可以对这些行业设立特别教育附加，以增加教育的经费来源，同时也对社会高收入者提出一种教育义务要求，并且完全符合我国对社会公平的要求。二是尽快实施高等教育的投资收费分级制度，国家应该打破过去对高校实行等级管理的概念，在对现有不同类别的高等学校的质量评估基础上，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开放高等学校的投资体制，实行“优质高收费，次质低收费”的政策，鼓励民营投资者参与一些高等学校的改制、转制，建立一批公办的低收费学校，甚至是免费的高等学校，确保贫困学生的受教育权利，正确引导社会的教育消费观念。同时，鼓励探索用社会融资的办法加快对现有高校的投入，甚至应该鼓励一些公办大学实行股份制改造，坚持国家所有、民资参与、合理回报的原则，加大对高等学校的投入，部分放开高校文凭制度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真正下放文凭和学位授予权利给高等学校，制定支持教育的社会捐赠部分抵税政策，鼓励社会各界捐资助学。

转变政府的职能，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高等学校，包括坚持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坚持政府对高等学校内部管理的宏观调控、指导、监督和评估，切实改变过去那种直接干预，甚至以行政手段插手高校内部事务的做法，给高等学校以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放开对高校的职称评审、教师聘任、人事管理和学生毕业等方面的



政策,代之以加强对高校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评估。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在美国,高等学校有充分的自主权,联邦政府的管理只是法律上的宏观调控,学校的分级不十分明显,不同性质的学校其管理模式也不一样。在英国,政府的教育管理机构有着各种各样的评审委员会,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师资和管理体制等等,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评审,包括每年的全英高校排名,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衡量,比较客观和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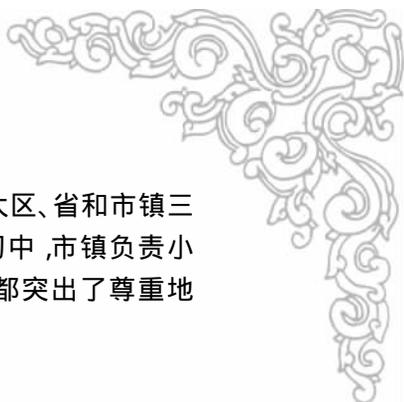
2004年2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追求自主是大学的责任》指出:“让大学拥有更大自主权于是成了英国和德国的大学必须急起直追的项目,这也是新加坡的大学致力追求学术领域的高度和厚度所必须正视的问题。新加坡的大学朝争取更大空间的方向发展,在学术之外的领域如制定收费标准、学费和资源调动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符合大学教育追求自由的本质,也是大学在行政事务方面摆脱政策羁绊的重要起步……让大学管理层拥有更大自主权是目前国际学术机构的发展趋势,其所带来的好处多而明显。英美大学的不同发展方向和所取得的不同成果,恰好说明了自主权对维持大学水准的重要……政府放宽大学行政自主权是正确方向。只有松手开步走,本地大学才能面对来自世界各地学界的竞争,找到自己的定位,并顺应大学教育体制的改变趋势,不断攀爬学术高峰。”

由此可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问题,同样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政府在处理与大学的关系时,应当更多地考虑如何给予大学发展的空间和权利,尤其在我国,有着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而且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中央政府是很难通过一些统一的政策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的管理问题的。只有下放一些基本的管理权限,给予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更多的自主权,才能因地制宜地解决一些具体的管理体制问题。

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需要法律支持,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高等学校管理。同样,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也必须服从于法律的要求。政府需要有管理高等学校的科学方法,同样,高等学校的管理者也需要改革现行的内部管理体制,切实做好自身的管理工作。目前这样的管理状态会带来许多两难困境。例如,关于四级英语是否应当是授予学士学位的门槛,有许多学生提出异

议,甚至要诉诸法律。教育部和国家学位委员会都公开表态,“从来没有将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作为学位文凭的门槛要求”,但学校还是坚持这样的做法,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对这种矛盾的解决,一直没有正确的处理方法和明确的结论。还有,前不久一些媒体炒作得十分热烈的焦点:关于新的婚姻法公布和放宽高等学校招生年龄的政策后,高校在校学生能否结婚?讨论的状况十分热烈,但最后的结局却让人啼笑皆非。再有,一方面鼓励支持教师的教学创新,包括教材的革新,另一方面,又在推行全国统编教材,限制教材的使用,导致教材落后于教学需要的问题十分严重。这些都暴露出政府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尴尬。问题出在我们的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政策统得过死、包得太多,导致许多政策在现实情况下无法实施。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如果不下放政府的管理权限,高等学校就没有真正的管理自主权。

1965年,时任英国教育国务大臣的克罗斯兰主张建立高等教育的“双重制”(Dual system),即把高等教育分为“自治”的大学部分和大学以外的各种学院构成的“公共”部分。1966年,工党政府发表了一份题为《关于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的计划》的白皮书,正式提出了双重制的构想。这种管理体制的核心要素是扩大了学校的自主权使大学能真正“自治”。“双重制”教育管理体制的确立标志着英国高等教育从一元中心到二元分立体制的确立。但这种体制也有相对不足的一面,即大学对政府拨款的依赖意识很强,缺乏为社会服务的主动性,逐渐游离于社会而处于社会的“边缘”。因此,1991年发表的教育白皮书《高等教育:一个新的框架》提出,从中央把大学基金会和学院基金会合二为一,成立高等教育基金会,以便采用统一的标准拨发教育经费,目的是促进各高校之间的竞争。而德国在教育管理上,联邦政府同各州政府有着明确的分工。联邦宪法规定:“整个教育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教育、科学的立法管理主要由各联邦州负责。”联邦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行使竞争性立法权,即联邦政府在某教育领域如果不立法,各州就可自行立法,如果联邦已立法,各州应以联邦立法为依据,制定有关规定。因此,德国各州政府在教育管理方面享有充分的自治和自主权。德国也没有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法,而是由各州在宪法的范围内独立管理发展其学校教育事业,颁布各种专门的法规。法国更是借鉴了其他地方分权制国家的教育管理经



验,将部分权利下放给地方。地方教育行政分为大区、省和市镇三级管理,大区负责高中和一些专科学校,省负责初中,市镇负责小学和幼儿学校。这些国家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都突出了尊重地方和学校办学自主权的特点,值得我们学习。[2]

## 建立学术自由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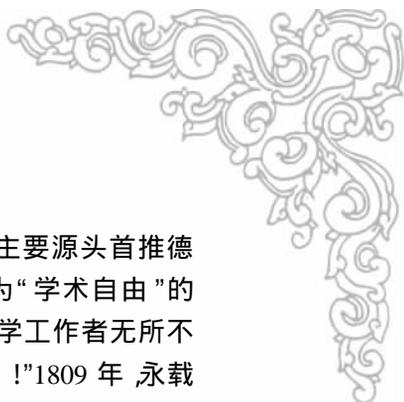
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境界,而自由的学术往往会导致一种意识的叛逆,很容易与政府的主流思想形成对立,而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繁荣不能没有思想的自由,这便形成一对矛盾。进取的政府能够重视和鼓励学术自由,又具备驾驭的能力,使其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这取决于政府的管理智慧和职能的发挥。这一点在现代的中国显得尤其重要,总结建国以来两次大学繁荣夭折的教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对这一对矛盾的处置失当。而目前我国大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一种鼓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机制,以拜金主义为特征的商业文化和平庸的市井文化的侵蚀,已经使得大学的学术文化变得萎靡不振。因此,建立一种健康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环境是政府责任,也是高等学校的责任,已显得刻不容缓。

我国的高等学校体制一开始就表现出高度的行政化倾向,计划经济的集权管理理念使高校几乎成为政府的职能机构,高校的管理人员至今仍然保留着政府的行政级别,这种官本位的管理观念严重抑制了学校的自由发展。官僚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将大学本应自由发展的学术文化变得日益僵化。发达国家大学所能享受的“四大自由”权利,即基于学术理由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以及谁可以入学,成为我国大学可望而不可即的“水中月”。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究竟什么是学术自由?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学术自由?一直以来实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为何不能鼓励学术自由?

学术是高等教育的灵魂,没有健康的学术思想,没有先进的学术水平,没有良好的学术氛围,高等学府就名不副实,就会失去社会立足的根基。我们都说高等院校是学术殿堂,没有学术文化的支撑,这座大厦迟早会轰然倒塌。研究学术领域的问题,必须要有一种学术探索的科学精神,要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同时更要有学术

研究的空间。意识形态对学术领域的禁锢无法让具有学术研究能力的学者从事创新和发明。思想的保守只能带来行动的畏缩,学术的生命也就死亡。我们一直在号召知识分子用创新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如果思想的自由境地都没有的话,哪里来创新的空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假如学校里弥漫着权威的思想,而学生也不反抗,那么权威的思想将深深地印在他们柔软且可塑的本质里,几乎再也无法变更。这样的学生将来下意识之中只知道服从和固执地反抗,不懂得如何自由地生活。”<sup>[3]</sup>从这个意义上看,高等学校追求的不仅仅是行政自主权和学术风气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态度上的自由。可惜的是,德国和英国的一些老牌大学,尽管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科学研究实力,由于受政府的保守意识形态的大力控制,以至被官僚体制拖累,无法赶上较为自主的美国大学。在学术追求依然自由的空气中,欧洲许多历史悠久的传统大学同样也为制度所累,无法展现过去的辉煌。由此可见,政府对一种自由、先进的学术思想的倡导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我国正处于变革时期,现阶段的社会形态正在向积极的趋势发展,如何积极引导良好的学术思想,建立一种健康的学术开放的机制显得十分重要。

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是人类自由的一种,它是源于“思想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它的最基本作用是能够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性,最大限度地发展知识和追求真理。“学术自由”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高等院校所普遍认同的一个办学理念,剑桥大学的艾雪培说:“在文明的国家里,学术自由已发展为一种受到特别保护的思想自由的角落。它并不是学术界有些人士所宣称的个人自由。学术自由是一种工作的条件。大学教师之所以应当享有学术自由,乃基于这种信念,即:这种自由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他所见到的真理之工作需要的,也因为学术自由的气氛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sup>[4]</sup>它的有效实施能为广大大学教师及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宽松的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人文环境,这有助于调动和激发广大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他们摆脱思想的羁绊,无拘无束地以最大的热情去追求学术的卓越,从而造福于人类、社会和国家。“学术自由”的历史源远流长。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欧洲的中世纪大学也孕育着“学术自由”的种子,而文艺复兴运动,则对这一具有浓重



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纵观世界近代史,大学真正形成学术自由的主要源头首推德国,兴建于1737年的哥廷根大学在18世纪被称为“学术自由”的一座灯塔。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相信:“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1809年,永载高等教育史册的德国教育家洪堡就任普鲁士教育部长,1810年,他在综合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等几所大学教育制度的基础上与费希特等人一起创办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首次明确地把“学术自由”作为其基本的办学指导思想。在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上,“学术自由”意味着大学有权决定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事务,国家不应以其利益左右大学的科学研究,在大学内部,应允许学者们自由进行科学研究,应允许不同的学术思想的存在和传播,应允许师生自由地探索真理。洪堡有关大学“学术自由”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德国、欧洲、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大学的发展方向。此后不久,德国的一些大学纷纷效仿,其中包括布勒斯劳大学(1811)、波恩大学(1818)和慕尼黑大学(1826)。强调“学术自由”与注重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研究,学术自由是科学家和思想家的摇篮。德国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爱因斯坦等无不得益于此,到目前为止,德国已诞生出了95名诺贝尔奖得主。<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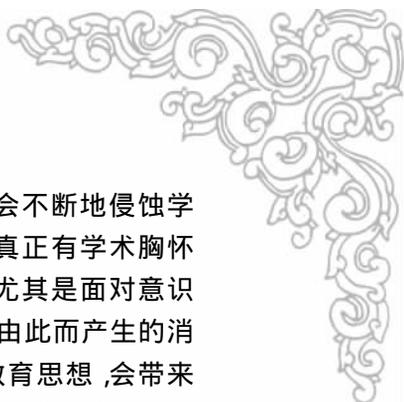
美国号称是自由世界的典范,但它所拥有的学术自由也是从欧洲引进的。187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该校仿效德国大学的样式,大力强调科学研究与学术自由。此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纷纷效仿。至此,“学术自由”这一理念开始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生根发芽。二战之后,美国高等教育的“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成为美国大学繁荣的成功经验。如今美国已有138人次之多荣获诺贝尔奖,其中绝大多数的得主来自于美国哈佛、加州、斯坦福等大学。我国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高校数目仅次于美国,超过印度,到目前为止,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也没有,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我国古代春秋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可以说,这是我国优秀学术传统的起源,诞生了孔子这样的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此以降,历朝历代都诞生一些优秀

的学者。到了近代,蔡元培先生也受德国大学影响,在北大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和办学主张。蔡先生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北大一时名流云集,景象万千。正是有了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学术自由”原则,才有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能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北大也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先锋。蔡元培的名言是:“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就是对“学术自由”最好的解释。

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更应特别强调“学术自由”这一原则,不仅是因为以学术自由为灵魂的学术文化将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先进文化,更重要的是,学术自由代表着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是全社会需要的,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所不可缺少的。“学术自由”给了学者坚持真理的空间,这将十分有利于发挥其科学研究、决策论证的智库作用。具备科学精神的决策者才会有坦荡、谦虚和宽广的胸怀虚心接受各种不同意见。目前更多的情况是,领导们总是开个座谈会来“倾听”意见,结果往往是歌功颂德者众,而领导们也往往是习惯于听到些好话。这种做法要不得,也不应是政府所为。“亲民”的政府、“务实”的政府更应该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意见。据说,上海市委在有重大的决策前总要先听一下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们的批评意见,上海构筑人才高地的意识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科技源泉。而中央领导核心一直注意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举办专题学习,听取专家教授对重大问题的见解,这些都需要学术自由。

社会科学领域的开放,涉及到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发展,涉及到社会稳定,确实要慎之又慎,但不能停滞不前。教育领域的开放是一种改革的需要。目前高等教育的学术状况不容乐观,我国科技界学术成果有突破性的不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无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都存在着很大差距。这固然与我们的经济条件和硬件设施缺乏先进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学术思想和学术观念难以跟上,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浮躁心态严重。现行高等学校管理的许多政策中没有一个合乎学术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这使得许多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患了不同程度的“学术不良综合症”,学术腐败现象十分猖獗,“学术+功利主义+人际关系



=学术成果”的学术研究模式十分流行。这无疑会不断地侵蚀学术肌体,导致科学研究肌体功能的坏死。而一些真正有学术胸怀的学者又囿于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而一筹莫展,尤其是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禁锢,更是不敢越雷池一步,重要的是由此而产生的消极的学术态度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教学态度和教育思想,会带来极其不良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消极影响已经出现。从人们对“学术不良综合症”的批评和谴责以及学生对大学教学的强烈不满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因此,要繁荣高等学校的学术文化,首先要确立学术自由的思想观念。

高等学校是知识分子的社区,也是知识和文化的发源地和集散地,高校的教师大多是有着深厚知识素养的学者。他们最大的骄傲就是对知识的拥有,最大的荣耀就是能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为人类社会作贡献。正是由于这种特性,知识分子有着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动力。作为学者和科学研究者,他们希望能够突破一切禁忌,去追求科学的真谛。学术自由是他们需要的一种新鲜的空气。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缺陷,正如胡鹏先生在他的《学术研究的大众情怀》一文中分析的:“长期以来,学者的学术研究客观上存在着两种极端化倾向,一是躲进象牙塔,钻进故纸堆,两耳不闻窗外事,搞所谓的‘纯学术’研究;二是摆出一副激进的反世俗姿态,指点江山,抨击时弊,大有‘世人皆醉我独醒’之势。这两种倾向的共同点是自视甚高,不屑与凡人、俗人为伍。”他在文章中也十分推崇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的观点,在他的文章里借用陈平原教授的话写道:“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sup>[6]</sup>这一观点强调的是学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应关注社会现实,具有文化批判意识,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这一观点适时地提出了在我国社会变革进程中学者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问题(虽然他尽量避免使用“社会责任”这个词)。由此,也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学者的学术研究,其对象选择、价值体现,如何适应社会变革的客观需要。笔者以为,在社会变革向纵深发展,文化观念多元并存的社会背景下,学者的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要能起到为社会大众“释疑”、“解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一种自觉意识,体现在研

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成果的表述上。换言之,应更新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念,体现学术研究的大众情怀。我也十分同意这种观点,也就是说崇尚学术自由是一个做学问的学者的追求,但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大众情怀要求我们对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要有责任感,否则,只能危害社会。

### 注 释

[1] 马叙伦:《五年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见《人民教育》1954年10月号。

[2] 赵雪梅:《英国高等教育的“双重制”》,见《三联生活周刊》总248期,(2003-07-14出版)聚焦世界十大名校,第一部,第三章。

[3] 参见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的理念》。他在书中认为,真正的大学必须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的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三者不可分,分则必归于衰退。

[4] 参见艾雪培(E. Ashby):University:British,Indian,African,A Study in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5] 参见孙承武编著:《聚焦全球十大名校》第一部,第八章。以及《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第四章,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6] 参见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 第三章

### 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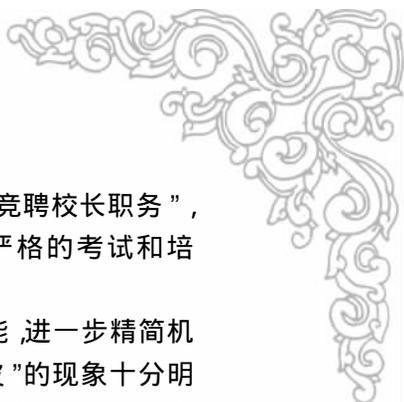
政府的政策决定了高等学校的社会定位,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决定了高等学校自身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向。目前,因为受到政策的牵制,高等学校内部管理改革很难推进,但也应该看到,加快高等学校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学校也在不断地摸索进行内部体制改革的新路子。如北京大学实行教师的全员竞争上岗;上海市制订改革方案,将在未来几年里取消对教师的职称评审,实行全员聘任制;还有一些高校实行学生选教师的菜单式教学模式;更多学校为了引进高层次人才,构筑人才高地,甚至不惜重金设立特聘教授、长江学者等特殊岗位吸引海内外人才来校任教。所有这些对高等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的探索,既说明了我国高等学校的管理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说明了高等学校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已经充分具备。而政府推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高校合并、鼓励中外合作办学等政策为高校的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

#### 高等学校的改革

高校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管理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领导体制。因此高等学校的改革,首当其冲的是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高等学校的现状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如何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地体现这样一个领导原则,使之更符合“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办学理念,是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的。现在的状况是党委的领导和校长的负责十分容易成为一对柔和碰撞的矛盾。原因很简单,党委的领导是非常任的,是原则的、方向性的,主要是决定高等学校的重大事宜,体现为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校长的负责是十分具体的,是行政性、

实质性的,并有行政管理制度作为组织实施的基本依据,在“原则性的领导”和“实质性的负责”之间出现偏差和问题时,问题的解决往往取决于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默契程度,这种配合不是取决于法治的理念,而是完全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和艺术。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种对领导素质的“理想化”和处理问题的高超艺术的要求,很多时候会令人失望,也往往会成为高等学校管理矛盾的一个“症结”。我觉得,我国的高等学校完全可以实行党政主要领导一人兼任,并实行党委常任制和校务委员会制度的领导体制,对学校的决策体系进行议事规则的规定,提升纪委的独立监督职能,或者实行“名誉校长制度”。政府可以尝试在全球招聘著名学者和教育专家来担任国内一些大学的校长,实行任期制,这样既可以使更多的著名学者和教育专家能够担任大学的校长,关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又可以提升我国大学的知名度,重要的是通过一些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的受聘能带来更多全新的办学理念。当然,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改变对高校领导的行政观念。

引进一些地方政府进行政府机关改革的经验,合并党委办公室和校长办公室为党政办公室,有利于对工作的通盘领导和提高效率,同时政府对学校主要领导实行定期考核制度和述职制度,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事实上,我们的高等学校缺少的是教育家,应该选拔既有学术地位,更有教育思想和懂得教育管理科学的专家担任学校的领导。我国现在的大多数大学校长确实是著名专家、学者,有的还是院士,但我们也看到他们中的一些并不具备教育家的素质。我并非对这些专家和学者不尊重,而是从来我们一直提倡“用人之长”,对于许多著名的专家是否一定具备很强的大学管理能力,许多业内人士是持怀疑态度的,看看我们的学生对学校管理的不满和我国许多高校的管理现状就可以了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科学家绝对不等于教育家,院士也不等于校长。其中的道理我想人们都会明白。而实行“名誉校长制”恰恰可以弥补这种领导体制的不足。另外,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高等学校的校长的选拔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不仅强调其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而且严格规定了校长必须有十年或更多时间的一线教学经历,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求校长具有充分的教学经验,懂得高等学校的管理。德国、英国等国家都实行校长负责制,但对校长的聘任要求和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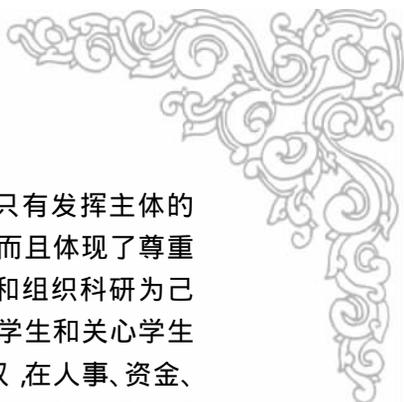
十分严格,德国就规定“必须是优秀教师才有资格竞聘校长职务”,法国十分强调“竞聘校长职务的教师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和培训”。相反我们在这方面强调得不够。

其次,是要调整党委和行政的两大系统的职能,进一步精简机构。党委和行政两大“系统”的管理功能,“两张皮”的现象十分明显,几乎波及到学校的每个角落。一边是要真正做到“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一切为了学生”,另一边是“科研是重中之重”、“学术是立校之本”,教学和科研的矛盾无法平衡;一边是,狠抓教师的思想道德教育,并以此作为考核教师的最基本的标准,另一边是“科研成果是教师评定职称的基本条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国人的管理理念向来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扫门前雪”的社会心态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古今中外的学者经常批评国人缺乏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使得一些原本十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为了弥补一些工作中的管理漏洞,学校又不得不设立了许多协调机构,使得本来就机构臃肿的学校机关进一步膨胀。所以有人说精简机构,越减越多。因此,调整学校的管理机构首先必须抹平党政分开的沟壑。高等学校本身就抓“精神产品”的“制造和培养”,不需要按过去“红”与“专”的思路来设计我们的管理模式。再说,院系的设置大多是实行院长负责制,这种体制使得院系总支书记始终是一种尴尬的角色,而且从上到下的体制也不匹配。一些没有设立研究生院的学校将研究生的管理划分给总支书记是一种很好的做法,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至少可以解决导师和研究生的协调问题。实际上,目前的院长负责制往往会将政治思想工作视作政工干部的事,而缺乏行政力量支撑的政治工作往往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意识形态的教育本身就应该渗透到教学业务中,对教师和政治要求就应当体现在对学生的评优和对教师的考核政策中,政工队伍的职能应当发挥在行政管理中。试想一个要被学校开除的学生,您让政工干部做思想工作,做到他非常乐意地接受您的处理决定,这无疑是痴人说梦。一个学校简单的教育业务没有必要设计成复杂的管理工程。依照这样一种管理观念,我想至少可以找到更好的管理办法。而这种系统的调整需要政府行为的支持,因为涉及政府和高等学校管理的衔接。

再次,学校要在政府的支持下,切实推进后勤社会化的改革。我国的高等学校已经成为一个“学校小社会”,学校的管理范围太

广事务太多,应该把属于社会管理范围的后勤体系、学校治安、医疗服务、离退休人员管理等事务交给社会,融入社会大系统管理。这一方面是社会公平原则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国外高校的管理经验,许多国家的高校普遍采取用市场换服务的管理办法,吸引社会投资者从事高等学校的后勤管理。治安管理是社会公共安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有公安系统和其相应的治安网络负责,既要保护学生的安全,又要依法打击和防范学生的犯罪行为,而不能让大学成为一个法律的“特区”。对于学生的住宿等生活问题,应该采取逐步放开、加强引导的原则管理,特别在实行大学收费以后,学校不应该再用大量的投资去谋求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应当在管理好现有学生居住小区的前提下,允许学生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生活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但也是一个必须要突破的“瓶颈”,主要涉及到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来管理我们的学生。

第四,院系的建制应当以学科为主要依据,各个学校的性质不一样,应该允许学校根据各自的特点来设置院系和学科。我国高等学校的院系和学科设置受到了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严重干扰,从来就滞后于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世界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新型学科不断涌现,但往往我们的学科建设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政府应该把学科设置的权利交还给学校,依照相应的条例来协调高校学科设置的平衡。学校应当建立完善的教学服务系统,把院系从事务堆里解放出来。同时精简院系的机构和行政人员,在实行院长负责制的前提下,实行学科的教授负责制,真正实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在目前情况下,我觉得一些高校试行首席教授制度来管理我们的学科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当然,实行教授或者首席教授负责制,应当任人唯贤,打破资历和年龄的限制,可以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可喜的是我们看到,高等学校“教授治学”的制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所接受,据人民网2004年2月5日的报道《重点高校“教授治学”制度终浮出水面》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就是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促进学术自由。就学校内部管理制度而言,这种学术权力是通过学术内行的民主管理,即俗称的‘教授治学’制度来实现的。”报道称这种制度已经在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一些



高校建立。专家称：“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只有发挥主体的作用，才能不仅真正体现了学校权力重心的下移，而且体现了尊重人才、以教师为本的人文思想。”院系以实施教学和组织科研为己任，有落实教学和组织教学活动的责任，更有培养学生和关心学生成长的重大责任，学校应当给予院系充分的自主权，在人事、资金、业务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权利。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大学，院系的设置是十分单纯的，但具有充分的处事权利，管理人员是十分精简的，十分有效率。有一点必须强调，大学的管理应当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民主是大学管理理念的根本，学校的重大事务，应当由党委常委和校务委员会决定，学校真正充分放权，对院系的领导班子设置要从紧，但要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来进行，同时应当通过实行学科的教授负责制，来分散院系的领导责任和过多的权力集中，同时要制定规则对教授负责制实行院校的两级监督。院系的重大事务应当由院系的管理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决策，管理的民主是大学管理的基础。因此，在未来大学管理中应当逐步推行民主的管理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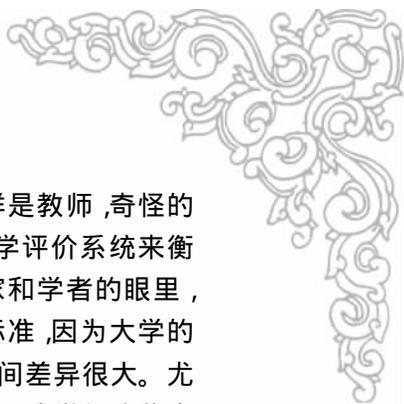
高等学校管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教师的管理。首先是应当稳定高校的师资队伍。教师是一个学校的根本，也是学校赖以生存的基本力量。师资队伍的建设，从来是学校的根本大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人事制度的开放，高校师资的流动已经出现了好的现象，有利于高等学校教师的合理配置，也打破了人才的学校所有制观念。高校教师有了流动的自主权，十分有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有利于打破人才等级观念和论资排辈的不良意识。但我们也看到，师资紧缺，尤其是优秀教师的流失现象十分严重，也是许多大学不堪重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社会各界对大学教师的责任感普遍怀疑。另外，学术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涉及到一些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还有学术心态的浮躁也影响大学教师的形象。

目前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存在许多问题，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首先是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被严重低估。这是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当然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整个教育系统的教师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教师是阳光下最灿烂的职业”已被人称之为“教育界十大谎言之一”，尽管有点偏激，但不能不说是个现象，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知识的严重贬值，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教师

是受冲击最严重的一部分。高校教师,尤其是骨干教师从商、从政的大有人在,造成了师资的大量流失。海外的一些媒体撰文批评我们将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从原来的科技教育领域引入经济大潮——“下海”,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的繁荣和进步。我们并非是责难他们的行为,人才角色的转换在市场经济社会是十分正常的,问题是大学师资的流失给高等学校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要知道培养一个优秀的教师是十分不容易的。为了阻止这种现象的继续蔓延,高校在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提高教师的待遇,不得不让学校的经费成为“吃饭财政”,甚至不惜向社会融资、借款,给学校带来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为了弥补师资的不足,高校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师资争夺战,形成恶性竞争。

作为教师,自然也有增加自身收入的渠道,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通过社会兼职、寻找第二职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已经成为许多高校教师的选择。其实,这也是十分正常,即使在美国,大学教师中的35%是兼职教师,只有三分之一的专职教师是定期使用的。由于财政的压力,专任教师的比例也在继续减少。<sup>[1]</sup>教师的正常兼职是无可厚非的,即使是在社会上淘金,或者有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移情别恋,也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学校对此也表示默许,就像许多中学教师在课外担任家教以谋取更多的收入一样,只要能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应当不会造成更大的危害。而对于大学的院系来说,也不得不以“创收”来提高教师的经济收入。大学因为财政的困扰而出现的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却很容易成为社会舆论指责的一面。

其次,应当建立科学的教师评价制度。对教师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教学和科研的评价。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教师的引进和培养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做法和相应的政策,高等学校之间对人才的重视和制定的相关措施已经基本能够和我们的人才政策相互适应。我要强调的是在学校的内部管理中,对教师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学评价和职称评审的关系。教师的首要责任是教书育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来定义教师的概念的,衡量一个教师的优劣当然首先要看他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态度,我们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强调的。现在,我们在中小学对教师的评价十分突出其教学质量,中小学教育领



域中涌现了许多全国特级教师、模范教师,而同样是教师,奇怪的是,在高等学校至今没有一个能够行之有效的教学评价系统来衡量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也许在许多专家和学者的眼里,大学的教学没有办法制定一个统一的教学评价标准,因为大学的教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教学,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之间差异很大。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教学有更多的学科和科研特色。我觉得这些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大学的教学确实不能和中小学相提并论,也确实有许多问题和因素,我们不得不考虑。我要说的是,大学的教学评价尽管很难,但必须要有,教学的评价标准可以按照不同性质的学校 and 不同性质的学科来进行设计,教学的基本规律总是有的,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应该是衡量一个大学教师的基本要素。事实上,许多高等学校有着比较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有着学科特色的教学评价标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原因很多,一是观念的问题,在学校领导层面上认为抓教学质量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而且对学校的地位和影响作用是十分间接的,在院系层面上顾及人际关系等因素,也觉得没有必要坚持,在教师层面上由于职称政策的影响,大多数教师认为教学没有科研重要。二是措施问题,教学评价确实有很大难度,需要有完善的措施和评价标准,要有管理和执行的机构和人员,要有具体的实施办法,而且,涉及到对教师个人的评价,在我们这个把人际关系看得十分重要的国度里,尤其如此。三是从上到下缺乏这样的政策环境和氛围。由于对大学教学的认识不统一,教学主管部门和学校没有认真制定相关的教学评价政策,即使有一些指导意见,也没有实施的具体细则、程序和要求,特别是教学评价政策的制定,不能和教师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就没有办法真正促动教师重视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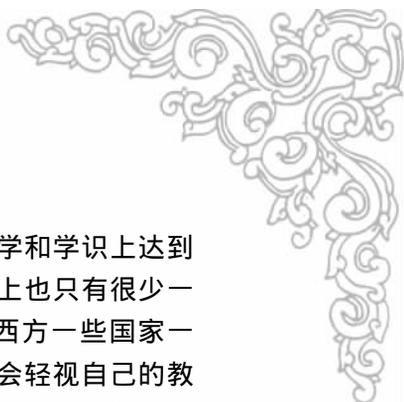
对教师的另一个评价标准就是职称的评定。职称是一个教师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外在体现,由于现行的职称政策以及相关政策都体现出了教师的职称和其经济、政治等待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教师对职称政策是十分关注的。教师职称政策至今仍然由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实施。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目前的职称政策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的弱点。

首先,只注重教师的科研成果,轻视教师的教学评价的职称标准,已经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严重滑坡。我们现行的职称政策,尽管也提到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但只是点到为止,在具体的执行中根

本没有将它放到真正重要的位置上。这种政策的指挥棒作用直接影响了教师的教学态度。这种刚性的政策作用也完全抵消了对教师思想教育、教学质量意识教育的效果。

其次,现行的职称政策已经成为高等学校科研浮躁、学术腐败现象的根源之一。正因为职称对于一个教师至关重要,为了职称,每个教师都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搞科研、写文章,有了一点成果还必须发表出来,不然就不被承认。没有成果怎么办?就陷入“不出版就死亡”的怪圈,就只有“天下文章一大抄”,有了文章赶快发表,只求数量不讲质量,因为数量是“刚性”的,质量是“柔性”的。发表不出去怎么办?就动脑筋去买版面,甚至不惜动用科研经费、教学经费和院系的基金,不惜把杂志的编辑拖下水,用种种手法来达到出版发表的目的。而这似乎已经是十分正常的“工作”,更有甚者,学校为了上博士点、硕士点、重点学科,不惜为一些“科研骨干”涂脂抹粉,在职称上做足文章,因为按现行的政策有了“点”,也就有了经费,有了经费自然就有更多的“点”,“点”多了,学校的地位就高了,就有了成绩,也就有了政绩,就能吸引更多的优秀的师资、学生。一句话,为了学校的利益。人民网2004年2月13日发表一篇纵横谈《该跑的跑 该送的送 高校公关砸钱忙“申博”》,文章就今年第1期《人民文学》上曹征路的小说《大学诗》所描写的“申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仔细想来,我国有数以十万计的高校教师,再加上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数量就十分惊人,而我們有多少学术质量上乘的报纸杂志?每年能发表多少学术文章?每年又有多少人要评定职称?尽管科研人员的数量十分惊人,但和国际上相比,我们又有多少“科研成果”真正能领先国际水平?

第三,由于现行的职称政策缺乏对教学质量应有的重视,产生了许多消极效应,学生没有成为其受益者,甚至有时成为牺牲者。教师敷衍教学的现象在高校已经司空见惯,你只要去浏览一些高校网站上的BBS,就可以感受到学生对大学教学的不满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网站上的许多偏激的言论,但若仔细考量,尤其是在与身边发生的状况相对照后,您可以发现这样的言论有道理的一面。我的感觉是学生的埋怨和不满是情有可原的,尤其是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收费教育”的时代,作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他们对高等学校的教学现状有理由提出自己的合理诉



求。

在美国,教授的评审是十分严格的,只有在教学和学识上达到严格的要求,才能通过竞争取得教授职位,事实上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教师能在教授的职位上退休,尽管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一样,有终身教授制度。即便如此,教授们也仍然不会轻视自己的教学工作,即使是在一些研究型大学,教授依然要承担一线的教学工作。英国在进行年度大学综合实力排行的同时,坚持对大学的教学质量进行单独排行,目的就是要引导大学重视抓教学质量。我所访问的约克大学,尽管在全英的综合排名在第七或第六位,但它在教学质量的排行中能够保持在前三位,这和他们对教学的严格管理是分不开的。

约克大学能够有如此的教育成就,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始终坚持走精英教育道路,突出教学的中心地位。在管理层面上,一是强化对教师的教学管理。我接触的教育学院院长是从全国招聘的教育管理专家,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学院的管理是实行高度的院长负责制,但教授和相关的教学负责人都有各自明确的责任和权限,各自履行自己的教学职能。二是高度重视教学实施环节,除了一些基础性课程班级相对大一些外,大多数是实行小班制和启发式教学,每个学生都有导师或联系的教师,尽管教师十分繁忙,但始终坚持在约定时间里和学生交流,尤其是教师通过电子邮件与学生进行经常性的联系,辅导学生学习,解答学生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对学生学习的一种督促。最值得一提的是,经常性的讨论往往在教学过程中展开,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都尽情发挥在这种课堂学术讨论中。另外,学生周期性的小型学术报告会、讨论会是教学环节中的精彩亮点。这种形式的报告会和讨论会,以及会后简单的餐会都是师生交流学习的机会和场合,通常院长和相关的教授都十分重视并亲自参加。参与这种教学实践过程,我觉得这种教学的境界正是我们的大学所缺乏的宝贵之处。

高等学校的教师是支撑一个学校的基础,对教师的管理政策和措施,涉及到一个学校的根本。从办学的指导思想、贯彻教育方针和对学生负责的角度,都应该合理调整对教师的管理和评价政策,使之符合教学科研的规律和培养人的规律。可喜的是,许多高等学校已经开始这些方面的改革尝试。北京大学目前推出的人事改革方案中的按科研成果将教师分成不同等级的做法,引起了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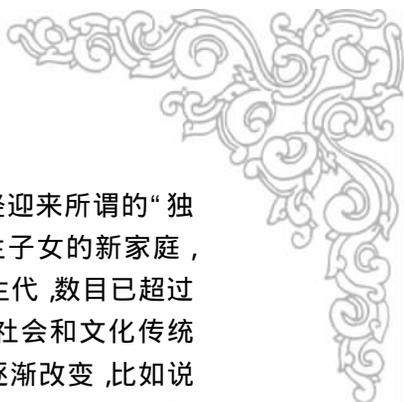
泛关注,虽然也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我想其实质是没有跳出以科研衡量教师的观念,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对教师的科学评价体系,但毕竟良好的起步。一方面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反思。我们诚挚地希望看到这样的改革向有利于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有利于扭转在科研学术领域的不良现象,有利于更好地解决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方向发展。

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对教师指责和批评的言论,甚至有的言论十分偏激。他们应该看到教师的职业和社会其他职业相比存在的特殊性,应该看到教师职业所承担的社会义务的特殊性,应该能够区分教师队伍存在的个别腐败现象和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状况,应该能够理解学校和教师队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我们政府的政策走向是密切相关的。尤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全社会都应当来维护教师职业的荣誉感,对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而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把教师所应有的素质和职业要求过分美化和过度要求,甚至到了“神化”的地步。过去我们常常将教师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这是对教师职业崇高意义的一种赞美,是对教师职业的理想化描述,但这种观念与对教师职业的现实要求和社会地位有着极大的反差,社会对教师认识的矛盾性将教师的理想和现实彻底撕裂。因此,过高美化教师,过高提出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同样也是有害的。教师的职业是有其崇高的一面,首先要作为教育理想的“化身”来言传身教,但过分的神化只能起反作用。应该让社会和学生都能理解教师的“现实形象”,用他们的精神来教育学生,这才是对教师真正的呵护。

## 学生的特征

我们不妨再来讨论高校的学生。我历来主张,对当代大学生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和20世纪80年代,甚至是50年代的大学生来进行比较,不能简单地对中国的大学生作道德评价和社会评价。我们应当把他们放到这个时代发展的历史背景来考察,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发展的眼光来考察。仍然要坚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剖析,结合他们生长的社会背景来研究他们的特点。

一是当代大学生已经基本是独生子女群体。随着1974年后



出生的独生子女逐渐进入一个婚育高峰,中国已经迎来所谓的“独生子女时代”。统计资料显示,独生子女养育独生子女的新家庭,将突破千万大关,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中国新生代,数目已超过8000万名。<sup>[2]</sup>“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社会和文化传统中的一些观念和行为,正在随这个时代的来临而逐渐改变,比如说“姓氏”问题受到颠覆,企业管理模式,甚至是独生子女生活方式,都得接受这种变化,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观念革命”。《联合早报》2003年12月9日有一篇报道《令人忧心?8000万独生子女开始冲击社会》称:

“最近的调查发现,独生子女就业综合征正在悄悄露头,给企业管理带来了不少新的挑战,也对传统的管理机制造成巨大冲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一名教授表示,独生子女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会给管理者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愿意接受公司纪律和体制的约束,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没有组织和集体的观念,娇气,不愿意接受批评等。广州应用心理学会会长傅荣教授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显著差别主要在个性方面,一是独生子女责任心比较弱,二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明显。独生子女工作以后,因为环境对责任心和协作精神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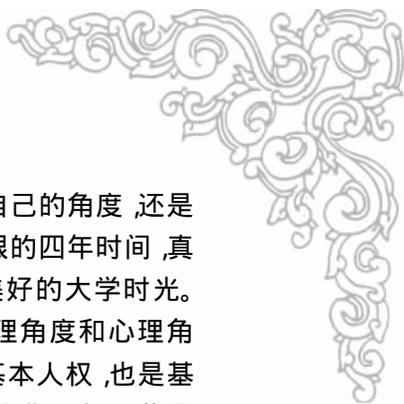
这种特有的“中国现象”是没有办法用西方人的思维来理解的。在中国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独生子女,备受父母和家庭人员的宠爱,他们中的多数是家庭的“皇子”、“皇女”,绝对享受着家庭的所有关爱。由此而产生优越感是十分自然的,由此而来的生活上的“依赖意识”与“乖巧理念”、处事上的“自私意识”与“任性作风”、人际关系上的“自我中心意识”等等也受到具有传统中国文化典型特征的“家庭教育”的熏陶而慢慢形成。所以,普遍地说,当代大学生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他们身上,有敢于追求新鲜事物的勇气和行为,有着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思想和理念,更有着开阔的眼界和审视社会的独特思维。总体上来说,当代大学生有着这个时代的显著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生活特性,有着我们年轻一代的共同理想,有追求生活和社会进步的行动。

二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文化教育背景。关心中国教育问题的人士都知道,我国的教育体制给了年轻一代怎样的教育环境。

可以说从小学开始,甚至从上幼儿园开始,家长和教师的共同愿望就是把学生送进大学的校门。家长和老师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成绩好”。因为在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中,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甚至是大学,共同的评价标准就是“成绩好”,无形之中“成绩好=好学生”的等式,深深地印在学生、家长和老师的脑海里。可怕的是,这个等式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等式。所以,在这样一种教育评价背景下,做个好学生,就是要成绩好。如果这个成绩包括了人生观、价值观等综合内涵的话,还无可厚非,遗憾的是,它仅仅是指知识的多寡。人人知道这就是“应试教育”。如果说在过去的十二年教育中,应试是学生生涯的主旋律的话,那么,进入大学校门的社会宠儿有没有摆脱这种教育的环境呢?没有,在大学里他们仍然要应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四级、六级、计算机、考研、考各种证书、考公务员等等,还是要不停地考试。我真不知道我们的素质教育如何来进行。从这个教育环境培养出来,而且依然要在这个环境中成长的大学生,我们能指责他们只会考试,高分低能吗?我看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

三是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处在变革状态,开放后的中国,新旧观念的交织,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传统和现代的矛盾,贫穷和富裕,落后和进步,各种各样的思想行为,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就像一大盆没有烹调好的菜肴,堆积在他们的周围,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如何来挑选,挑选哪一个,就凭他们自己的感觉来尝试其中的酸甜苦辣,当然失败不可避免。有人会说,我们的主流思想教育,不是十分清楚地给了他们答案吗?不错,是有这个答案,而且十分明确。遗憾的是这个答案太遥远,而且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没有两样,可是,没有能解决他们的许多具体的问题和困惑。思想教育的空洞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一大弊端,大学文化的沉沦也使他们缺乏精神的依托。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代大学生身上有着种种不良的思想和行为,以及我们用过去的或者正统的眼光去衡量而觉得无法理解意识和举止,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试图说明我们的大学生所具有的特征,以及他们形成的背景。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应当把这一代学生放到时代的背景中去考察,去理解他们,而不要盲目地责怪,片面地批评。大学生们有一个普遍被人批评的现象,就是“恋



爱现象”,许多指责他们的人们,认为无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还是从家长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他们都应该利用有限的四年时间,真正把精力放到学习上,而不是因为恋爱而浪费美好的大学时光。这个意见不无道理,但是,现在的学生无论从生理角度和心理角度,都已经进入恋爱的年龄,求偶和择友是一个基本人权,也是基本的生理要求,无可厚非。如果这些指责他们的人们了解一些国外青年人这方面的状况,就应该理解。在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13~16岁年龄段中的相当多的青少年已经有了性行为,而不久前,美国芝加哥大学刚刚结束了一项受美国国家卫生保健院委托的为期10年的大规模“性调查”,调查发现40年前只有29%的美国未成年少女发生过性行为,但今天这个比例已经猛增至63%。而另一项由政府发起的全国性统计数据调查则显示,美国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中,70%的男生和50%的女生都有过不同方式的性经历。<sup>[3]</sup>

如果我们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青少年的状况,我想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再去指责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大学生们。我并非是性解放的鼓吹者,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一味回避,不敢正视。需要一个有效的教育渠道让他们懂得这些知识,需要有这样的教育渠道让他们知道怎样来解决恋爱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 高考和招生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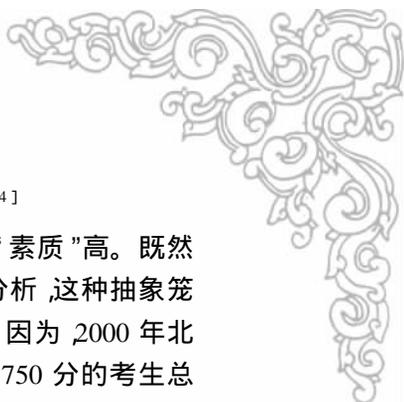
讨论到大学生的素质问题,就不能不提到我国的高考制度和招生制度。因为,大学生都必须经过这样两种制度的洗礼,也是这两把“筛子”筛选出来的“优良种子”。所以,讨论大学生身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不先了解这样的选材标准——两把“筛子”的模型。

1977年恢复的高等教育考试制度,在“文革”以后的特定年代里,对很快恢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功不可没的。回首20年,什么事件对青年影响最大?根据《羊城晚报》1998年12月17日的一则报道,中华青年联合会和《中国青年报》曾经在2.5万人中做抽样调查,这项调查显示:恢复高考是二十年来对我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31岁至40岁的年龄段,是受恢复高考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73.8%的受调查者认为,恢复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前途。高考是对“文革”践踏人才野蛮行径的有力否定,它赋予千千

万万的青年以神圣的公平竞争权利。这种公平竞争,促使全国形成追求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气。因此,恢复高考,被认为是20年来对我国青年影响最大的事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考制度已日渐显现出它的历史局限性。

一是现行高考制度忽视了我国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政府片面追求统一考试的公平性,又忽视了制度的不统一,从而导致了另外一种不公平。谁都知道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导致了教育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要在有着如此众多差异的地区实行统一的考试以追求公平性,实在不是一种明智之举。事实上,由于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各地的招生政策的不统一,导致了招生录取分数线也相差悬殊。

比如北京市1999年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控制线是466分,而湖南则是556分,湖北为544分,最高相差90分;北京市去年第一批理科院校最低控制线是460分,而湖南则是537分,湖北为566分,最高相差106分。甚至连中国最穷的贵州省高考录取最低投档分数线理工科本科重点线也是480分,也高于北京市!2000年依然相差悬殊。北京市文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65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重点本科528分,湖北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史类第一批为535分,最高相差70分;北京市理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76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理科重点本科535分,湖北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理工类第一批为559分,最高相差83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部分外省文科专科492分,高出北京市文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27分,部分省理科专科490分,高出北京市理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14分。连中国最穷的贵州省,第一批录取院校(211工程及同批本科院校)最低投档分数线(原始分)理工类也为474分,文史类为487分,均高于北京市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这组数字意味着,在湖南连专科都上不了的人,如果他们能弄到北京户口,就可能考上重点大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考生的户口比法律赋予他(她)作为一个公民的平等的入学和升学权利更重要。就这样,法律规定的平等受教育权利,长期公开地变成了省、市、自治区内的考生平等,而这种“平等”,恰恰表明地区间的不平等和高考招生的地区性歧视。高考成了对国民隔离的公开确认。至于长期



这样做到底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4〕

有人认为北京上海的学生比其他地方的学生“素质”高。既然高考成绩不算数,又没有其他方面的定量或定性分析,这种抽象笼统的说法,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是一块遮掩的盾牌。因为,2000年北京高考报考人数为56003人,文理科考分在450~750分的考生总计21865人,少于24711人的本科招生计划,若以450分为及格分,总及格率尚不足39%,至少需要2800多个总成绩不及格的人来“填空补缺”。若今年北京的高考录取率为75%的话,那就意味着,考上大学的人里头,几近一半总分未到及格线。据《北京晚报》报道,2003年北京考生文科约在300分以上,理科约在290分以上可以填报专科志愿。2003年北京高考文科及格率仅语文一科过半,数学只有16.15%,外语25.69%;理科中数学及格率为27.43%,外语及格率为36.78%,物理及格率为32.04%。这组数据表明,2003年北京高考被录取者里头,大约有一半人至少有一门课不及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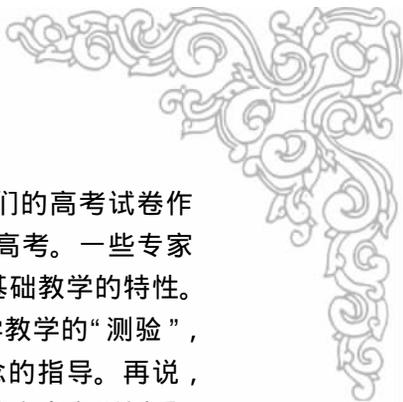
这种统一的考试,又不统一的招生,而仅仅由于地区的不同,导致了高分进不了大学,低分可以进大学的奇怪现象,也就产生了另外一种不公平,于是就有了山东的学生要状告教育部的事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国家统一的考试就应该有国家统一的招生制度和政策。而我们的政府部门就是要在统一的考试前提下,实施不一样的招生制度,在同一个国度里,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也就会出现参加同一张试卷考试,高分的进不了大学,低分的却能读北大的怪事。这种考试与招生制度分离的状况导致了实际上的不公平。

二是高考事实上已经成为选拔人才的工具,也是衡量人才的标准,更是对基础教育有着指挥棒意义的政策性措施,已经严重冲击了我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和制度。由此而来的升学考试,即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考试等,逐渐成为一个“考试系列”,使得应试教育在基础教育时期越演越烈。甚至一些中学普遍用两年的时间学完高中三年的全部课程,腾出一年时间专门复习应试。据了解,这样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甚至一些中学在初中乃至小学就沿用了这样的“先进经验”,足以看出高考对基础教育的冲击程度。在这种制度的强有力的引导下,素质教育很难有普及的可能。尽管教育主管部门也看到了这种事实状况,想方设法来改变高考的

命题方式和内容,希望以此来引导基础教育向素质教育方向发展,但事实上效果不佳。道理很简单,不管您方式怎么改,题目怎样变,出题如何灵活,加几个“X”,都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你总是要考的,你要考,中学的办法就只有“应试”,不然,学生不答应,家长不答应,校长、局长、市长也不会答应。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素质教育在口头上,应试教育在行动上”的基础教育“两难”局面。

三是我国的高考制度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人才评价和选拔体系。仔细观察我们的周围,你不难发现,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都离不开考试。干部选拔要考,录用公务员要考,评职称、持证上岗等等都离不开考试。这种以考试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造就了我们的考试一族,出现了许多“考试专家”,甚至有学生一不小心四、六级英语都考了个满分,即使是由国外专家命题的托福考试也能满分过关,使得我们的外语专家都瞠目结舌。而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高分低能、高学历低素质的现象。

四是现在的高考为了照顾中学各科之间的平衡,一味追求知识的广泛性和综合性。从主导思想来说,似乎完全正确,但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对学生学习的指导观念。谁都知道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知识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已经非昔日可比。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要求学生能掌握文学、历史、哲学、英语、数学、物理、化学,还有各种各样的时事、经济、社会知识,无疑有点过分。高考试卷内容越出越“综合”,范围要求越来越广,这与我们这个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对 21 世纪人才提出了四个要求——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认为这四种基本学习是人生的支柱,教育应当围绕它们加以组织。我们都知道知识越来越多是这个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所需要的是不同领域的专门人才,这些人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和研究这个领域的专才,我们不能要求这些专家去懂得这个领域以外的其他知识。例如陈景润,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对数学研究有着突出贡献的数学专家,尽管他在其他方面有着人所共知的“弱点”,再比如体育界,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造就世界冠军必须“从娃娃抓起”,而这些“娃娃”能懂得多少数理化文史政的渊博知识呢?而我们的高考和招生体制对他们不也是网开一面吗?为什么对韩寒<sup>[5]</sup>这样的学生,我们的体制就无能为力了呢?我并不赞同像韩寒这样有严重



偏科现象学生的学习方法,但我们确实应当对我们的高考试卷作反思,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指导高考。一些专家认为高中以前的教育是基础教育,高考应当注意基础教学的特性。我觉得高考首先是选拔人才的考试,而不是对中学教学的“测验”,应当代表我们的人才选拔标准和对学生学习观念的指导。再说,基础教学的测试有会考和毕业考试来承当,高考就应当有所侧重,文理分科应该坚持,“综合考试”应当有个“局限”。

最近读到一篇报道,《哈佛拒收高考状元,美高校招生制度能否存活中国》<sup>[6]</sup>：“今年(2002年)高考,全国70名高考‘状元’中,北大录取了35名,清华录取了28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佛大学在1996年对165个SAT(学术评价考试,性质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满分的‘高考状元’说‘NO’!”“当年全美有365个‘高考状元’申请哈佛,几乎是每两人中就有一个被拒收。理由是对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为什么美国的高考没有导致应试教育,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高考改革与素质教育研讨会”上,旅美教育学专家黄全愈在别人代读的致词中对中国高考提出了反思,认为高考成了制约人才资源发展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连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去“残酷”地培养一流的考生;瓶口内——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学生,反而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学生”。

尽管高考有着诸多弊端,对我们实施素质教育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甚至有些激进人士根本就主张取消高考,但我以为,由于我国的国情,至今人们还不能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办法来取代现行的高考制度。应当说高考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样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要改革和完善我们的高考制度。怎么改才切实可行?如何改才能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我也不妨说一些拙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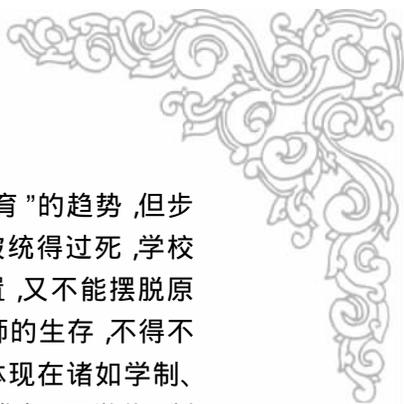
首先,我以为高考根本就应该放权。教育部应该把高考的一些权限下放,推行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组织考试,或者在总结上海、北京的地方高考的经验基础上,推向全国,因为我们的招生体制是以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进行的,理论上说考试和招生一致起来是有利于照顾不同地区的教育现状的。教育部出原则和负责督察。为防止腐败,可以采取让地方自己出卷、批卷或者交换批卷的

办法。鼓励各个地方探索高考的经验,每年进行交流,以促进工作的开展。而在招生方面,一些全国招生的高校依然可以采取分指标到地方的办法招生。令人高兴的是,教育部的高考改革已经开始启动。据人民网2004年2月20日的报道《中国改革高考制度,增九省市单独组织命题(名单)》称: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增加单独组织本省市高考命题制工作的有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九个省市。近年来,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以省为单位逐步推进,自1999年起各省在选择考试科目方面已有所不同,全国高考使用一张试卷的格局已经打破。这说明,教育部的改革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迈进。

其次,在放权的基础上推行两次高考的制度甚至更多,在总结上海的两次高考的经验基础上推行两次高考,坚决改变一卷定终生的高考制度。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了我们高等学校的学制改革问题。教育部应该全面实行高等学校的学分制改革,实行真正的学分制,允许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基础上提前毕业。

再次,高考应该和中学的毕业考试、会考实行联动,各有所侧重。毕业考试应当侧重对学生的知识考试,是高中学历的考试。会考应该成为高考的基础,注重于对学生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的知识测验。高考是对学生的学科方向及其所掌握和感兴趣的知识与能力的测验。招生应当以学生的高考成绩为主,但应当参考他的毕业考试和会考成绩,以帮助大学更好地选择学生。志愿是一种招生的依据,按考生志愿录取是现行招生制度的必须,但是我们在现实操作中不难发现,很多学生其实并不了解他们所选择的学校和专业,这些学校和专业往往会成为一些考生的志愿“陷阱”。

招生制度的改革和高考制度的改革是血肉相连的,在改革高考制度的基础上必须同时改革招生制度。而招生制度的改革又与高校的许多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改革招生制度,某种程度上比改革考试制度更加重要。目前有识之士的第一个共识是,高校应该实行“宽进严出”的政策,这个“宽”不仅表现在对考生的录取条件放宽,如入学年龄、身体素质、婚姻状况等其他社会条件,而且表现在对考生的专业实行宽“口径”录取。随着社会对人才的基本素质和技能、能力素质越来越重视,由于一些专业划分过细,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知识面太窄,使得这样的学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积压,社会人才需求的多样性也要求高等教育向“宽口径”演变。



所以高等学校的专业划分虽然已经出现“通识教育”的趋势,但步子仍然很慢。原因是高校现行的专业设置体制被统得过死,学校没有充分的自主权来及时调整专业和学科的设置,又不能摆脱原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困扰,为了某些专业和专业教师的生存,不得不沿用过去的招生体制,因人设事。另外,“宽”还体现在诸如学制、学科、专业等方面,不少学校实行了“一本一专”或者“双学位”制度,鼓励有能力的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多学知识,掌握多种学科,以弥补专业划分过细带来的就业弊端。但总体上来说,专业改革的步子不大,依然不能满足“宽进严出”的要求。第二个共识是:重视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学校应该把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和能力提升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这种教育的模式,实际上是要改革目前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体系,使之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一致,从而彻底克服“高分低能、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尴尬局面。如果我们认同高等学校要培养学生掌握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的话,就应该让他们懂得和掌握与之相关的社会要求,以及相应的能力素质。这样才能建立起学校和社会之间的“人才绿色通道”。

如果我们认同这样一种培养人才的理念,那就应着手来改革招生制度。一是要改变“一卷定终生”的局面,尽快推行两次高考制度;二是扩大高等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允许高等学校设定自己的专业要求和限制;三是拓宽录取特长生的渠道(目前只有文艺和体育类),特别是要形成对一些在某一领域确实有一技之长的学生的上学通道,采取“宽学科录取,小专业划分”的方法,来平衡学生的志愿。对一些冷门专业,政府和学校从长远的人才培养计划出发,只能用扶持的政策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保护国粹京剧一样,没有办法用市场的原则使其“合理配置”的。学生志愿的“冷”和“热”只能用市场杠杆原理来加以解决,政府的统计部门和人力资源的主管部门应该对我国宏观的人才需求趋势有一个中短期的预测,这是对学生就学志愿最好的调节方法,光凭学校的招生宣传、中学教师和家长的推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任何一种方法不可能没有弊端,现在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强调考试的公平性和招生的公平性原则,不得不用分数线、专业线来解决这个问题,但牺牲了素质教育。改革的方向要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有人会担心出现另一种公平性的失衡而导致腐败。其实,对付腐败真正有用的办法就是公开和民主,实行“阳光政策”。高校应该通过新闻媒体

和现代通信手段全程监督招生过程和公布录取的结果,应该用透明的办法来进行录取工作,当然还有政府纪律部门的行政督察,有这两条我相信可以大大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 注 释

[1] 引自〔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著:《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顾明远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9页。

[2] 数据来源于中国计划生育统计公报。到2000年,全国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数量达到5578万,比1995年增加672万。预计到2003年将突破8000万。

[3] 美联社2003年12月11日报道:《美63%少女有过性行为,青少年中流行“性手镯”》。

[4] 以上使用的相关数据,参照了教育部和部分省市公布的高考统计资料。

[5] 韩寒:上海市重点中学松江二中高一(10)班学生,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如不办休学,他可能会遭到开除学籍的处分。年仅17岁的韩寒是一个集“留级生和少年作家”于一身的“偏才”。他的数理化三门功课考试总成绩才80分,可是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已由作家出版社付印,另一部14万字的散文、小说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而且,韩寒此前还曾在全国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以《书店》、《求医》、《杯中窥人》分别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这样的学生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也影响了许多中学生,被称为“韩寒现象”。

[6] 引自《中国青年报》2003年09月16日报道。



## 第四章

### 高校的教学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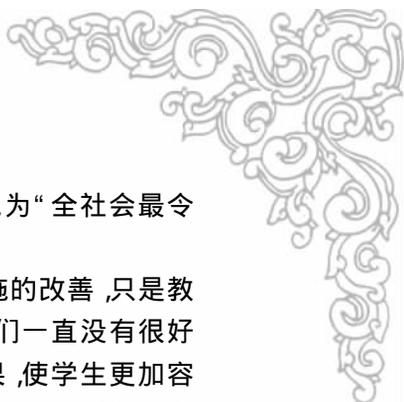
大概从孔子和自其以降的先贤哲人开始,就开始致力于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传授给弟子,以造就更多的社会贤才,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他们开始重视教育,就办起了学堂和私塾,教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先贤的哲学和自己的政治思想、伦理观点,他的“传道、解惑、授业”的成功与其弟子的勤奋好学,终究形成了他的思想哲学——儒家思想。孔丘“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仁学德政和礼治思想形成了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庞大系统,经其后来学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正统政治思想的基本格局,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政治心理素质,直到如今,其思想的精华仍为世人所尊崇,也曾对东亚、东南亚、欧洲产生过影响。社会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替,都没有改变这种思想文化精神强大的生命力。他提倡的“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以致用”的教育观念,成为了不朽的教育传统。他的思想之所以能世代传承下来,我想一方面因为统治阶级出于执政需要而大力地予以推广;另一方面大概也不能不说越来越多的学堂、私塾和先生的教学起到了十分巨大的知识传承作用。从年幼的学童被送进学堂识字开始,他们就接受了先生教授的《论语》、《三字经》等充满孔孟色彩的语言文化、道德文章,后来才有了唐宋诗词等等中国的文化精粹。政府的学堂、先生的教学和孔孟的文章构成了中国几千年的教育传统,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的中国教育体系就这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 课堂教学改革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不仅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同化了所有试图征服它的异族文化,同样,也用它强盛的生命力始终掌握着与之

血脉相承的教育传统。即使是当代的教育,从幼儿园、中小学,乃至高等学校,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教学的模式:知识的单向传输、学生的被动接受,仍然是每天教室里奏响的旋律。尽管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我们的课堂教学摆脱这种呆板的灌输教学方式,一直在倡导一种启发式、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气候。如果说幼儿园和小学需要“艺术地灌输”的话,在大学的课堂里实在不应该再延续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模式。

目前的高等教育有许多令人窘迫的状况,由于教育经费的拮据,高校的教学设施普遍比较简陋。尽管一些高等学校有了一些经费投入,改善了部分教学设施,如实验室、电化教室、多媒体等等,添置了一些较好的教学设备,确实改善了教学手段和教学环境,也把教师从繁重的备课、板书和自制教学用具的辛劳中解脱出来。电脑、投影仪和其他一些教学设备的运用,也确实加强了形象、直观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更加容易接受复杂的理论分析和运算演示。这些强化了了的先进教学设备使教师的教学手段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更加优化了教师的口头表达方式,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大多数高校在“吃饭财政”的情况下运转,学校的教学经费实在是捉襟见肘,比起一些先进国家的高等学校,自然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政府对于高等学校的教育投入只能优先改善教师的教学设施,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我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高等学校的“扩招”,学生不断增加,而教师数量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充,使得高等学校的教学越来越依赖先进的教学设施和现代化教学手段,这是目前解决师资不足的唯一的办法。2000年10月,时任教育部的陈至立同志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会议上指出,要努力推进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整合,鼓励在其他学科的教学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并把信息技术教育融合在其他学科的学习中。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多媒体教学进入每一间教室,积极探索信息技术教育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整合。所谓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就是通过学科课程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教与学融为一体,提高教与学的效率,改善教与学的效果,实现传统教学模式的创新。尤其是我国政府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以后,不断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数量势在必行,但目前政府似乎还没有这种决心来采取措施,大幅度增加对高等学校的资金投入以不断地充实教师队伍,提高教师队



伍待遇,稳定高等学校的师资,使教师职业真正成为“全社会最令人羡慕的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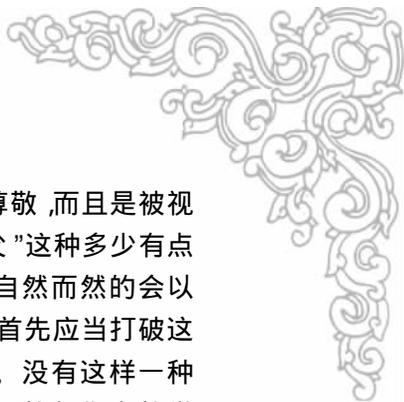
但我也一直认为,教学手段的优化和教学设施的改善,只是教学外在条件的改观,确实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也确实达到了教学的形象、直观效果,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接受复杂的理论知识和抽象的公式。但是,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已经成为世界性教育理念的今天,仅仅解决教学的单向传授手段的先进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彻底转变教学观念,使我们教师的教学理念符合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要求,真正实施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实行教师和学生有限教学时间里的教学互动。按我国传统教育理念,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历来强调教师单向传授知识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学生对知识追求的主观能动性。这在过去“文以载道”“教以传道”的历史时期,教师的单向传授、灌输式的教学手段是符合这种教育观念的要求的。

在当今时代,知识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已经远远出乎人们的想像,也远远超出了每一个人头脑对知识的包容程度,任何人想完备地掌握知识的全部,已是天方夜谭,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知识的精深和交融,香港大学副校长程介明教授在1999年南京大学教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知识经济社会,“知识不断膨胀,无所谓饱读诗书;工作不断变化,无所谓一技之长;意念不断更新,无所谓一劳永逸;关系不断变更,无所谓从一而终”。程介明先生还有三句颇有历史意义的箴言:“我有三句话。第一句,The best regulations are not written.最好的规章制度是写不出来的,像武侠所说‘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第二句,The best learning are not credited,最好的成绩是成绩表上没有的。第三句,The best warden does nothing,最好的舍监什么也不干。”<sup>[2]</sup>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的理念,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多样化要求的特征。科技领域的不断扩展,学科的交融和碰撞导致了許多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产生,更加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科技知识。尽管我们也要求从事文化科技教学工作的教师能够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更好传输给学生,启发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追求,但是,教师的知识结构总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成为知识的“百宝箱”,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本身就是某一学科领域,甚至是十分细小的领域的专家,他们往往拥有这一领

域丰富的知识结构和尖端的知识水平,大多数教师还往往站在他所在学科的学术前沿,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但他们对其他知识领域的学术科研成果了解可能就十分局限,因此要求他们能够十分懂得他所在学科以外的更多知识也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和信息科技的发达和普及,已经完全打破了知识的封闭性,也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知识的交流和传播,学生取得知识的渠道变得更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的开放、知识的开放已经使得学生能够通过课堂以外的许多途径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在大学校园,几乎可以装下所有知识的互联网系统,已经全方位覆盖,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现代大学生所拥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尽管没有大学教师的丰富和精深,但实在是有着一种不可预见性。事实上,许多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着很强的广泛性,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我们的教师在某一领域的知识水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有着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有着学术性很强的学生科技活动和比赛,甚至有的学生对某一领域的科学知识的掌握超过了教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学生看到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而产生了教学的不满,特别是对大学教学内容与知识增长的严重脱节感到不满。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这个因素而产生厌学情绪。因此,对于有限时间的课堂教学来说,教师单向传输的教学模式往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容易忽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对教师自身知识的补充。我们的教学传统也强调“教学相长”,但这是一种宏观的教学原则,有着渐变和含蓄的演变过程,因为,它始终没有摆脱“师道尊严”的思想。我觉得,在现代教学理念里,更需要互动的、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并且,需要有一个表现在外在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方式的直接改变。

如何做到师生之间的互动呢?我觉得困难并非在于如何找到怎样一种行为方式,而在于要真正在教师和学生的观念和思想深处建立起这样一种行为的动机。在教师一边,应该彻底抛弃影响了几千年的“师道尊严”的观念。大凡人的自尊都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在教师的身上,可能更多的是表现在学生对教师的教学和知识的尊重,这是十分严肃的,也是每一个学生需要做到的。何况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人们对于“礼”的理解是十分复杂的。在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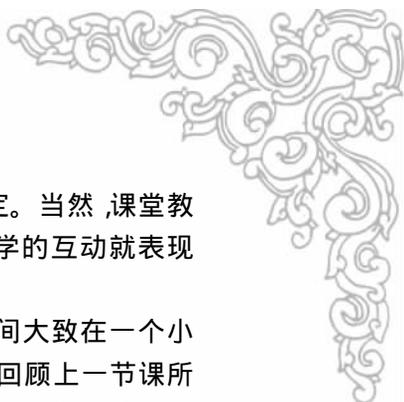
师和学生的关系上,更加强调的是学生对教师的尊敬,而且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从来就是主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多少有点封建色彩的观念,几千年的传承使得我们的教师自然而然的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对待学生。而教学的互动首先应当打破这样一种关系,换之以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没有这样一种关系的改变,是不可能进一步的有教学互动的。而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主导者,能否首先做到对学生的尊重是十分重要的。它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每个人或许都有一种经历,就是自己对一门学科的兴趣和爱好,往来之于教师的鼓励和赞扬,尤其是在启蒙教育阶段,更是如此。同样,在大学阶段,学生对专业的了解和兴趣,往往也受到教师的影响和启发。爱因斯坦说过:“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真正的学习者就是要到有意义的知识和精神海洋里畅游,就是要追求学习心理的渴求和满足,这正是人的深层精神需要。它会使人丰富多彩、妙趣横生,使人生健康和圆满。教师的责任就是要激发学生的这种爱好,使他们自己驶入学习的轨道。

教师对学生的尊重表现在对学生的宽容,要宽容学生的“无礼”、“幼稚”甚至是“无知”。记得在几年前,我读过一本译著,名字就叫《宽容》<sup>[3]</sup>,很有感触。我记得在书的序言中就说了一个情景,大致是这样:“在宁静的无知的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知识的)漫游者带着遍体鳞伤回来了,向村民们描述了他已经找到的一条通往更加美好的家园的大道,而守旧老人认为他是对神圣的亵渎,叫喊着人们杀死了这个漫游者。”书的作者以诗化的语言描述这样一种思想:要人们对新生活、知识和科学的探索者给予更多的宽容。宽容对于敢于追求真理的人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想如果牛顿在我们这个时代,问周围的人们“苹果为什么掉到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仍然会有人认为他“无知”,因为苹果掉到地上始终是“真理”。人们是不会那么容易接受有人对习以为常的“真理”的挑战的。所以,“宽容”十分重要,如果牛顿的老师不能宽容他的“无知”而对他实行“封杀”的话,可能“万有引力”的发现会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历史是如此,现在何尝不是这样。对知识的挑战和追求,往往从这样的“无知”开始,往往需要这样的“宽容”。

有人认为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学有更多的“民主”气氛,您也可

以这样说,但我觉得宽容可能更加确切一点,毕竟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和追求者。民主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我觉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宽容更重要。在具体的表现上,教师应当把一节课的教学设计成讨论式和交流启发式的。允许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随时提问,而不是“插嘴”,允许学生提出不同见解,甚至是反对意见和观点。甚至可以改变教师原有的教学计划和程序。这样才能抓住学生的兴趣和热点来讨论学科知识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才能做到师生间的互动。不然会流于形式。

美国的大学教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它的本科教学的教室有大有小,但多数教室是中型的,可容纳 20~30 人上课。据调查,美国大学 83% 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采用讲授法进行教学。尽管如此,讲授法并不是教师们使用的唯一的教学方法。一般来讲,在一门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大都在使用讲授法的同时,会穿插使用答疑、小组工作、读书报告、社会调查、实习、实验等教学方法。就教学技术而言,他们使用传统的板书、幻灯、投影等技术设施的同时,也更多地采用现代先进的教学设备。这些教室里有的安装了多媒体教学系统,有的安装了闭路电视,但都有投影仪,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灵活组合。黑板是各类教室必不可少的,在第一堂课上,教师都要将自己的 e-mail 地址告诉学生,以方便师生通过 e-mail 进行交流。有的教师不仅通过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向学生授课,而且利用多媒体技术组织课堂教学。如果有更多的学生选修某一门课程,就可能分班上课。我在英国约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经常参加他们的各种教学活动,听课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我发现,不论是在哪一个教学环节,学生随时都可以举手提出问题,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提问已成为大学课堂教学的一景,教师也十分欢迎学生提问,哪怕是在讲授中,教师也会不时地询问学生是否有什么问题。教师并不在意自己的讲授为学生提问所打断,相反,会不厌其烦地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直到学生清楚、满意为止。正因为课堂上有较多的师生问答交流,所以,课堂气氛往往比较活跃。如果有学生提出一些显然是十分有趣而且值得探讨的问题时,一些教师往往会改变自己原来的教学思路,组织学生开展讨论,甚至是争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教师是一个组织者和参与者,而且,允许学生各自发表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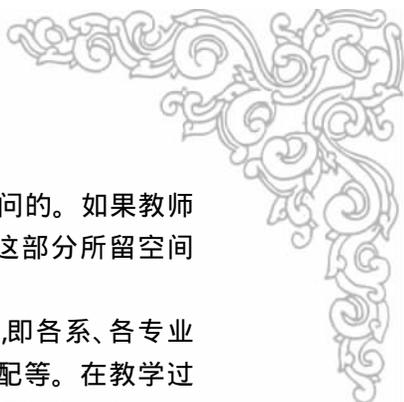
即使是看起来十分荒谬的观点,教师也会加以肯定。当然,课堂教学涉及的相关问题的讨论是没有禁区的,这种教学的互动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一堂典型的课堂教学课上,教师的讲授时间大致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教师讲授的内容主要是总结和回顾上一节课所教学的主要内容、本次课学习内容介绍、要点讲解以及相关的教学资料和信息等。在讲授结束后,教师通常都要安排讨论或小组工作等活动。小组工作可能是仅次于讲授法的主要教学方法。教师通常将一个教学班分为三到四个小组,课堂上组织小组工作时,可以是按这三四个小组开展活动,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分组。教师针对具体教学内容,或提出问题供小组讨论,或布置案例由小组研究,或由小组汇报课前布置的课外小组工作的结果。这时学生开始成为课堂的主角,他们解答老师、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介绍自己的看法和相关经验,提出自己的疑惑。由于桌椅是灵活的,所以课堂也是经常变化的。一般来讲,教师们比较喜欢圆桌会议的形式,即使是在配备拐手椅的教室,教师也较多地让学生呈弧形坐在自己的周围。这样能够方便教师与每一位学生交流,也便于学生相互之间进行交流。如果安排分组讨论或小组工作,学生们就顺势移动桌椅,在教室的各个方位形成不同的组合,开展小组工作。每一次课结束前,教师都要针对下一次课的教学内容,布置学生需要重点阅读的文献,包括有关教材的章节和重要论文、研究报告等。正是这种承上启下的安排,使得教师和学生课堂上都是“有备”而来,师生都希望通过课堂教学中的交流解决各种问题,使教学富有成效。

考试仍然是美国大学检验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手段。有人认为,美国大学的考试过多,让学生疲于应付。不仅有例行的期中、期末考试,而且有的课程还进行月考,有的即使不举行月考,教师也会布置一些需要上交的作业,且这些作业的好坏都会影响最终的学习成绩。考试的方式有当堂闭卷考试、开卷课后答题或撰写课程论文等,在课程考试中采用口试的较为少见。学生一门课的最终成绩往往由平时作业、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成绩等几部分构成。不管是平时作业还是期中、期末考试情况,教师都要将评阅意见及时告诉学生,以便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由于美国大学在一些主要宗教节日和政治性节日都停课放假,有的课程遇上节

日就要停课,所以,各门课程的期中考试时间有先有后,但期末考试时间则是统一的,通常利用一学期的最后一周的课时进行课程考试。采用当堂闭卷考试的,当堂答题,当堂交卷;开卷课后答题或撰写课程论文的,往往在一周前公布题目或要求,最后一次课时交卷。学生对考试成绩非常重视,因为各门课程成绩综合后的优劣,将决定学生能否评优,能否享受某些特殊的待遇。比如,有的学校允许高年级学生修第二学士学位课程,波士顿学院还允许学习优秀的学生在三年级时同时选修研究生课程。

课堂教学的最后环节除了考试以外,就是课程教学评价,由全体修课的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评价。课程教学评价一般在最后一次课的前一周上课时进行,教师在完成当堂教学任务,也就是完成全部课程教学内容后(因为最后一次课是考试时间),留下5到10分钟,发给学生统一印制的课程教学评价表,由学生填写。评价表既有选项题,也有表述填充题,但都简明扼要,便于学生填写。波士顿学院的课程教学评价是这样进行的。教师将评价表发给学生之前,要选出一位学生志愿者。教师发完评价表和填表铅笔后,即离开教室,学生独立填写评价表,互不讨论,互不交流。学生志愿者收齐评价表后,即装袋密封,然后连同填表铅笔一并交给系主任办公室。波士顿学院的课程教学评价表包括5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回答,主要问题是该教师的长处是什么,该教师应该如何改进教学。第二部分是选项题,主要选项内容是该教师可以评为哪一等级(优秀、很好、好、可以接受或差),该教师能定期接待学生来访吗(是或否),该教师有无缺课现象(有或无),在学校教学手册和注册资料中关于该课程内容与方法的介绍是否清晰(是或否)。第三部分是对教学过程的评价,包括14个问题,如课程组织是否良好,教师是否清楚明白地解释资料,作业是否对学习很有帮助,教师对教学是否负责,教师对课程内容是否充满热情,教师对学生的需要是否敏感,课堂气氛是否有助于学习,教师在课堂上是否关心学生,教师是否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成绩的考核方式是否公平,等等。第四部分也是选项题,包括8个问题,分5种程度,学生选其一。主要问题有:每次上课对学习内容的学习是否必要,这门课是否有助于你获取实际信息,掌握有关原理和概念,获得学术技能,获得实用技能、人格发展,教师在课外是否提供帮助;与其他相同学分和学时的课程相比,这门课



的时间安排是否合适等。第五部分是留给教师提问的。如果教师要求学生就某些问题进行补充回答,学生可以在这部分所留空间予以回答,如果没有,则不必填写。

而在日本的一些私立大学,主要由教学人员,即各系、各专业的教授,集体研究、决定每年课程设置、奖学金分配等。在教学过程中,不采用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而是由各任课教师自行决定其教学方针、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校方对教学质量的评估和考核,主要是依据学生选课的人数,以及学生对有关任课老师的意见。可以讲,教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并受到广泛的尊重。<sup>[4]</sup>

这种对课堂教学的设计看似十分简单,实际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如首先要解决学科的课程设计。我们的高等学校现在普及了学分制,对每个专业的学生设计了不同的课程和学分,规定学生必须完成所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而学分的设计是单向的,菜单式的。学生只有选择的权利,而没有改变的余地。而且这种选择是十分有限的。更加令人不解的是现在的学分制,仍然需要学生按照一定的时间限度:学期、学年的概念,循序渐进,即使完成了所有学分也不能提前毕业,这似乎和学分制的本质有很大区别。而究竟设计多少学分来作为衡量学生完成专业学习的标准,仍然是教学专家们争论的问题。但我主张,无论如何,大学的教学,应该给予学生足够的发展空间,有更多的时间来充实其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学分的设计应当是满足完成其所学专业的基本知识就可以,这样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 教学的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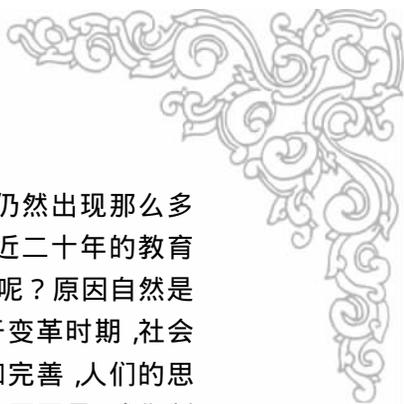
再来讨论教学内容的含量。近几年,高等学校设计的学生专业培养方案中,四年理论课的总学时一减再减,从原来的3000多个降到目前多数院校的2400个左右,确实花了一番工夫,反映了教育思想观念转变和教学改革的成效。但教师普遍觉得内容与学时的矛盾很大:一方面各种专业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需要更多的课时来完成;另一方面,学生的时间又被占得比较满,自主学习空间往往所剩无几。专家在制订教学方案时对知识点考虑太多或许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旧的课程经过精简、压缩、整合,腾出了一些时间,但新的内容又需要必需的补充,学生每周的课程被排得满满

的,几乎没有余力去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参加自己爱好的活动或发展自己的特长。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从宏观控制角度对每一门课程作进一步的精选、整合和精简,新的内容是学不完的,关键是要善于从“广而博”中选择、重构“少而精”的教学内容,始终紧扣人才成长的需求,着重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我认为,只要安排得当,总学时还可以再降下来。关键在于我们用怎样的观念看待大学的教学成效,应该指出的是,现代大学的教学已经从纯粹的知识传授向学生的自主学习转移,教师应该在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方法论的指导上下工夫,引导学生在专业学科中刻苦钻研。

目前,普通高校文科学生总学时在2400,学分140左右,理科学生学时在2600,学分150左右。而每门课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又十分具体,教师教学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完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教学失职。在这样的前提下,庞大的教学容量无法让学生和教师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教学的互动,也无法让学生有更多的兴趣深入地研究感兴趣的学科。如果仔细分析学生课时量的结构,不难看出,基础课和公共课的含量过大是一个共同的现象。值得讨论的是两个焦点问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课;二是公共英语教学。

第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现在大学开设的有关学生政治和思想教育的相关课程有:《形势和政策》、《思想品德修养》、《毛泽东思想概论(一、二)》、《邓小平理论概论(一、二)》,还有《法律基础》、《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等等,占了相当学时。一些专家还呼吁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等问题,有必要开设《心理学》等必修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其主要的作用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行为规范教育。但在大学教育阶段是否值得用如此多的学时对学生进行理论上的灌输是值得探讨的。

我国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建设所要求的,学校是思想教育的主要阵地,作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手段之一,就是开设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为了突出这一课程的重要性,不仅具体规定了课程的基本内容,而且将它列入必修课的范畴。几乎是从幼儿园开始,思想教育课始终是学生的必修课程,从来没有放松过。但是,我们如果审视一下校门外的社会,就会存有疑问:为什么一代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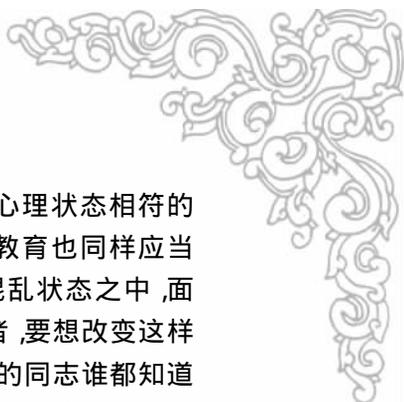
代经历了如此严格的思想政治教育洗礼的学生,仍然出现那么多信仰危机、思想危机和道德危机呢?为什么过去近二十年的教育仍然不能解决学生思想和灵魂深处的世界观问题呢?原因自然是十分复杂的。最深刻的原因是我国整个社会处于变革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人们的思想仍然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期。另外一个突出的原因是,我们制定的一套以政治思想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实际。过去有人说我们的思想教育体系和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是呈反方向发展的:“对小学生抓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大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少先队队歌;对中学生抓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学生为考上大学发奋学习,成为祖国栋梁之才;对大学生抓集体主义教育——要团结友爱,反对自由散漫;对研究生抓文明宿舍——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偏激,但却反映了一些高校思想教育的现状。

众所周知,一种思想观念的形成要靠社会许多因素对人的综合作用,包括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道德取向、法律的完善和来自家庭、学校与其他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包括每个学生所经历的成长过程。学校的教育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学校的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更不能光靠理论知识来解决问题。现在的思想教育仅停留在书本上,作为知识内容,作为一门课程来教学,这是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效果的,也不能解决学生的具体思想问题。更何况大学思想政治课的教材,除了更深的理论色彩以外,与中小学生相比没有更多的新意。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政治学、历史等学科和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些理论知识是其研究的专业领域,处于学科的需要,专业的需要,要学深学透。而对于其他更多专业的学生来说,实在没有必要用那么多时间来重复已经接受了十几年教育的政治理论和观念。应当相信从小学到高中的思想教育的成果,应当相信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基本的政治立场、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都是具备的,道德观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决定于社会意识形态取向的变化。事实上,在开放的世界和社会里,我们也根本无法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何况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追求的普遍目标,鼓励社会创新、观念更新更是我们倡导的科学探索精神。

我是主张压缩大学思想政治课学时的,主张教其精粹,学其精

华,特别是要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解决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高校有一支由学校党委部门和院系的总支书记和辅导员组成的专职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他们长期以来承担了大学生思想教育的艰苦工作。但这支队伍的建设和职能的发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由于政治问题的敏感性,对这支队伍的高度重视是主流意识教育的需要,而高等学校管理改革的趋向,又使得这支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两难”的境地。首先高校党委和行政的“两张皮”现象没有得到充分解决。尽管学校给了这支队伍党委和行政职能,同时兼有的“特殊待遇”,但是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分岔”现象,往往会导致这支队伍处于尴尬境地。其次,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普遍陷于空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得到充分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相适应,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矛盾十分尖锐,这种矛盾反映在主流媒体的宣传和人们客观思想实际的脱节。由于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内在认知,而且表现在外在的行为,自然也就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影响了这支队伍的巩固和发展。相反,正是由于这支队伍的存在,业务教师自然也就将学生的思想教育“边缘化”,学生的管理和教育严重依赖于这支队伍,有的甚至还与这支队伍唱反调,那么“全员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或者名存实亡。

谁都知道学生的思想变化总是与其生活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改革开放的考验。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总结了我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出的基本结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不同历史时期,取得革命和建设巨大成就的正确的指导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从事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应该结合不同发展时期特点,结合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变化,及时调整主流意识的宣传,使之越来越切合人们的思想实际,越来越紧密结合社会的最新变化和发展,越来越容易让人接受,把主流意识观念的宣传搞得更加坚强有力。在政治层面上,确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思想教育的首要。其次,必须充分解决好道德层面上的问题,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制定的道德规范不能总是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特别是对学生进行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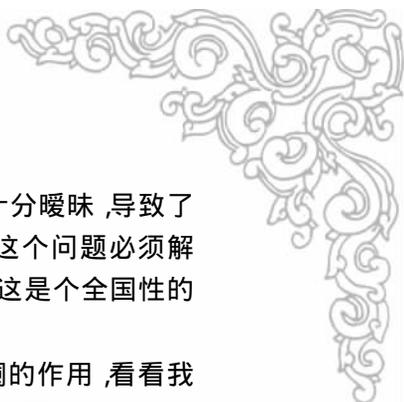


教育应当采取与其不同成长期所表现出的生理、心理状态相符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即使是对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教育也同样应当加以区分。而目前的思想教育恰恰陷于这样的混乱状态之中,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具体执行者,要想改变这样的不利局面无疑是独木难支。问题是工作在基层的同志谁都知道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和敏感性,谁都知道要想改变目前的状态所面临的困难和症结,但因为政治风险,绝大多数只能保持沉默,而任其如此发展下去。

高等院校要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应当考虑将这支队伍和高校的行政管理队伍合并,使之成为管理和教育集于一身的教育管理工作队伍。这样既能消除“两张皮”的现象,实际上也起到了精简机构的作用,更是为思想教育附之有力的制度保障,也能影响制度体现更多的思想教育取向。这种措施是针对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的,不能将其视为取消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扣上一顶削弱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帽子。事实上,学校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单位,只是整个社会运转体系中的一个具体组织,我认为没有必要将它人为设计成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教育培养人才,思想教育必须渗透在培养教育的全过程,不能将其人为地分开。两支队伍的合并,同时也能真正赋予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基本职能,而使其不再依赖于专职队伍而置身事外。我无意主张取消这支队伍,我们应当看到大学与中小学教育的显著不同点,就是大学生已经是成人,这个事实我们是不能忽视的。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完全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对于成年人更多的要强调法制和纪律,以及道德范畴中带有强制性的一面,所以,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让大学生成为社会特殊的一群,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法律上“享受”着某种特权。譬如,公检法系统基本有一种共同的默契,对大学生涉及重大刑事犯罪以外的违法行为基本从轻处理,大量的轻度违法行为基本交于学校处置。正因为如此,许多学生常常忽视不道德行为的危害,法不严则行为轻。当然,除了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之心以外,我认为实在应当让他们尽早承担起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在国外留学过的学生都知道,外国的许多学校,除了允许学生第一年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里以外,其余的时间学生都要自己在社会上解决住宿,甚至几乎是强制要求,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学生学会照料自己的生活,

能尽快融入到社会中去。学生涉及的违法乱纪行为,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程序来处理,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和违纪行为的处理,严格按照学校规章制度运作。而学生的社团组织、学生会组织都由学生自己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组织开展,根本不要教师和学校机构包办,甚至一些大学的体育课和体育活动也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组织开展的。这是一种观念的不同,但是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第二个值得探讨的焦点问题,就是大学的英语教学。如果您留心一下学生对现行大学英语教学的看法,会得到许多令人惊讶的观点。针对英语的教学方法和方式,特别是一些高校将英语的四六级测试成绩和学位挂钩的政策等,持批评反对意见的大有人在,偏激一点的学生视之为“扼杀人才的棍棒”。我相信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事实上,新一轮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已经悄然拉开了帷幕。据称,新的改革方案将着力于学生能“听得懂和说得出”,如果是这样,我认为是符合英语教学本质属性的,方向是正确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流的大门洞然打开,我国的英语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培养社会急需的英语应用人才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外语教学被大学迅速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加以重视,也是情有可原。进而国家教育部推出了国家统一的英语标准定级考试,应该说这一政策对推动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学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也对加强学生的英语学习自觉性功不可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国内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高校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英语学习,推出了将英语四六级测试成绩作为学生取得毕业学位的一个必要条件的政策,其他一些高校也争相效仿(更有个别头脑发热的大学,要求英语过六级才能取得本科学位),一时将英语教学摆到足以凌驾于其他所有课程教学的高度。但据说国家教育部从来没有正式出台过相关文件肯定这一做法,也没有任何文件反对过这种做法。而据业内消息灵通人士说,确实有相当权威的教育部官员在有关会议上支持过这种做法,当然也是传说而已。但事实是,有相当多的学生因为英语测试没有达到四级合格水平而没有取得大学的学位证书。这就引来了一个颇有争议的法律问题,这就是:国家主管部门没有这样的规定,国务院颁布的学位条例中也找不到相关的政策,单凭学校的文件是否可以推翻国务院学位条例而拒绝颁予这些学生以学位证书?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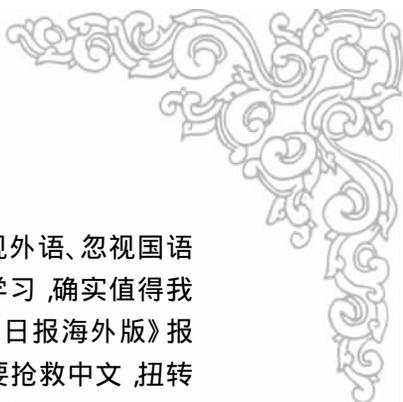
于对这个问题认识有歧见,教育部对此的解释也十分暧昧,导致了司法的尴尬,也导致了英语教学的许多误区。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毕竟这涉及到学生的切身利益问题,而且毕竟这是个全国性的问题。

社会上对英语的“发烧”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看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和选拔制度。不管你是搞中医、中药、古汉语、二十四史的,还是做教师、工程师、技术员、编辑、记者、搞企管的、做内贸的,一概不管你的专业能力,也不问对提高工作的业绩有多大帮助,只要你想晋职、评职称、升中学、上大学、考研究生、攻博等等,如果你学不好英语,只有两个字:“没门”。由于英语决定着学生的前途和命运,大学生只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英语。四级通过了,就准备考六级,六级考过了,准备考托福、考GRE、考雅思。因为英语对于学生实在是太重要了,至于专业课就对不起了,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只要能考及格就行,如果运气不好,补考也能过。毕业论文、毕业设计也只能走走过场了。

如今,由于几乎所有高校有了这样硬性的规定,又是全国统考,所以各个高校放大了英语教学时限,使得英语课的比重不断增加,不仅是课内,事实上它也占据了学生大量的课外时间,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教育不发达地区的学生,由于基础教学条件的限制,他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通过英语等级考试。事实上,据作者调查,相当一部分未能通过四级测试的学生来自于落后地区。学生的英语学习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通过四级拿学位,通过六级为就业,或者保送研究生、考研。这种以考试为目的的学习忽视了英语作为语言工具而应有的特性,导致了相当多的学生只会阅读,只会考试打钩,不会说,也听不懂,成了“哑巴英语”。这一点许多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是有相当多的感悟的。

英语之为语言同样也是人际交流的工具,首先要能听、能讲,我们学母语不也是这样的过程吗?我们面对的英语,不同国家的发音是有区别的,就像我国的方言,尽管英语国家试着想推出一种标准英语——international english,但仍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学语言是需要一个环境的,没有这种环境想彻底改善英语会话能力是不大可能的,即使你能说得“很流利”,也只是“中式”英语,老外听不懂,除非你是有了一段时间的留学经历,或在英语国家生活过较长时间。所以有人说“中国的一个大学英语教授,英语说不过英国

乡下的菜农”不无道理。何况语言是有文化背景的,你不了解他们的文化,学语言会很费劲,没有效果,文化伴随着观念、伴着思想和意识形态。我们应当理解为什么新加坡要如此重视汉语的教学,因为他们知道,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与之相伴的文化的消亡。而法国为了保护国语,政府决意封杀“E-mail”一词<sup>[5]</sup>。法国人对母语的热爱,对英语的鄙视是众所周知的,法国文化部宣布一项禁令,为了阻止英语的入侵,禁止国人使用电子邮件的英文单词“E-mail”而必须使用法语版的“Courriel”。作为国际大都市,在巴黎,懂英语者大有人在,如果有人同他们用英语交流,他们大多不理不睬。只有在机场接待处或在像欧洲迪斯尼乐园等国际友人众多的公共场所,英语才能派上用场。这倒不是法国人高傲,而是他们已把使用法语提高到民族形象和尊严的高度。我就不懂为何我们的教育部门会看不到这一点,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学生的国语和英语水平有呈反向发展的趋势,表现在一方面将英语教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取消了大学语文的教学,甚至将一些专业所要求的基本语言和写作训练也简化掉了;一方面,大多数学生英语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相关的国语水平却每况愈下。许多大学生中文语言的运用能力还没有达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应有的国语水平,而教育部门和学校从来没有制定政策来提升学生对国语的认知水平。上海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也不禁发出感叹:“我做了将近20年的大学教师,现在的博士研究生,只相当于过去的研究生,现在的硕士生相当于过去的本科生。整个大学生的语文水平令人摇头。”而人民网2004年2月13日转载《光明日报》的文章《大学语文日益边缘化,遭遇前所未有尴尬》指出:既缺乏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也没有外语四六级考试那样的“尚方宝剑”,作为高校基础公共课的大学语文,面临着尴尬的境地。高校教学体制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更让一些优秀教师纷纷远离大学语文的讲台。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生对中文的驾驭能力、对文学的品鉴水平却不容乐观。“大学语文同中学语文到底有什么区别?大学语文同人文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关系?大学语文课和学生的专业课是什么关系?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大学语文教材?”在近日召开的一次大学语文研讨会上,武汉大学的吴天明教授一口气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问题看似突兀,实际上是有感而发。文章同样也提出了对大学国语教学存在的尖锐问题



以及对现在大学忽视国语教学的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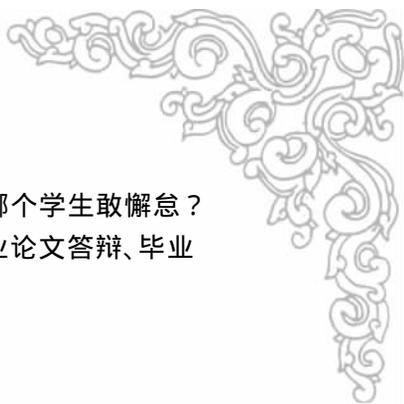
为什么会如此状况呢?道理很简单,重视外语、忽视国语的政策使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片面强调英语的学习,确实值得我们反思。据人民网2004年02月12日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指出:“台湾作家白先勇<sup>[6]</sup>近日发表谈话,呼吁要抢救中文,扭转全盘西化的文化教育。他说,台湾近年来进行的所谓‘教改’,把儿童学习英语的时程大幅提前,但许多学生的中文程度反而大幅降低,不仅作文错字连篇,内容也愈发贫乏。白先勇认为,语言及文化教育全盘西化的缺失,才是当前‘教改’的最大危机。他坚信中文会在21世纪扬眉吐气,成为国际强势语言,白先勇称,文字是文化传承的基础,下一代应先学中文,再学英文,先了解、发扬中华文化,才能了解西方文化,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由此看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一些著名人士的关注。

我无意指责哪一方,问题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凭良心说,学生的不同意见也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以为应当重新审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大学英语教学。首先,在指导思想应该将英语教学进行合理的定位,改变英语教学的应试目的,注重对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提升,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可喜的是中小学已经先走出了一步,能够按照英语学习的规律设计教材,注重英语的情景教学。其次,必须实施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我们也注意到,大学四六级英语的教学和考试改革也提上了教育部实施教学改革的日程,新华网北京2004年2月18日报道:“围绕全面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使我国大学生在毕业时达到能基本听懂英文广播,能进行简单英语交流和具备一定程度写作与翻译能力的总目标,180所高校从2004年2月启动为期1年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应该说这确实是可喜的一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回到英语教学的正确轨道上来。再次,以不同标准来衡量不同专业的英语要求。学生的英语学习应该和专业要求相符合,也就是说允许一些专业降低对英语的要求,如中文学、历史学、中医学等专业,而且可以开设专业外语的选修,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要求。因此,可以适度减少外语教学的学分和学时比重。

有人或许会说,如果按照我的观点,大幅度减少学生的学时和学习压力,不是让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本来就不高的学生更加荒

废学业浪费时间了吗？我首先不能苟同这种对学生的定义，我认为现代教育应当以确立自主学习为首要。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大学的学习应当以自学为主，而且这应当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E. 莱文认为未来大学会有九大变化<sup>[7]</sup>，他认为其中一大变化是“高等教育焦点是从教到学的转变”，他认为“目前大学强调的是学生‘听课时间’这一共同过程，即每个学生接受教育的时间，学生们按照规定的课时学习，取得每个学时的学分，拿够规定的学分之后，取得学位。然而，随着教育提供者的数量、教育个性化和学生群体差异性的增大，可能会失去教学过程共同点，教学焦点将变为学生们完成学习的效果。时间将是可变的，而学习将成为永恒”。我们推行素质教育就是要让学生的个性和自身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张扬。事实上，学生并非没有学习积极性，只是我们对他们还缺乏强有力的引导。国外的一流高校对本科教学都是十分重视的，这种重视体现在每个学习和教学环节上，一方面对学生的选课、学习兴趣放得很宽，另一方面对学生的学习要求很高，并且，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就是学生自己选定学习专业和课程，按照十分严格的规程，包括对学生的课外阅读、学年论文、教师和导师等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课堂教学是十分精练的，讨论式的，大量基础性理论要求学生通过课外阅读来解决。

其次，必须严格教育各个环节，加强对学生学习的要求。人才质量的提高并非与教学课时的增加成正比，除了要求学生必须完成教学要求的所有课程，并达到各自专业学分要求外，更重要的是，应当建立起培养学生的全程质量控制体系，从平时的课堂教学到学生各种能力的自我提升和培养，应当有一个设定的参考指标，尤其是能够表现为外在数量和内在质量相结合的指标，而且严格控制，只有学生达到了相应的要求，才能毕业，真正做到“宽进严出”。在英国约克大学留学时，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一个在教育学院攻读 PHD 的日本留学生，和我经常在一起学习，我旁听了她的论文答辩。我也知道她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她没有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尽管她有很多理由，而且又是一个留学生，最后也只能按照要求推迟半年再进行答辩，通过后才能毕业，目睹这样的情景我十分感慨。据说，这样的情况在教育学院每年都会发生。她的导师除了安慰和勉励外，并没有感到意外，反而



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事。面对这种学习压力,有哪个学生敢懈怠?而我们现在对学生的要求很宽松,光从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毕业设计的要求、包括教学实习等等就可窥见一斑。

## 教材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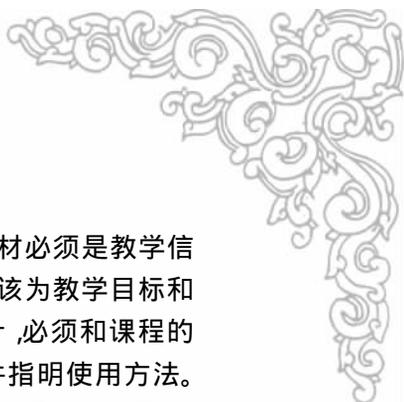
要改变这样的教学模式,还涉及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教材。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也是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的行为目的指向。一本好的教材是学生求知的源泉,也是教师施教的指南。在基础教学阶段,国家实施统一的教学大纲,实施统一的教材,一方面是为了能为基础教育提供教学的精品,使之更加符合中小学生的学习要求,也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教育意志。同时,可以根据社会的变化及时调整对中小学生的知识要求。改革开放后,中小学教材逐步地由分省编制改成全国统一编制。统一教材的益处:(1)节省了大量的教材编制劳作,有利于降低课本的费用,也有利于出精品教材。(2)统一了全国的高考、中考制度——即应试制度,能够在学生学习相同课程的基础上用统一的尺度去衡量。(3)有利于学生跨省区流动,使学生不会因教材的不一致而跟不上教学要求。(4)能用统一的尺度衡量老师的教学质量。也正是由于有这些好处,才使我们选择了统一教材的模式。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它也有最大的弊端,即培养和教育出来的“人才”模式的统一。课程内容上的统一使得学生的知识也基本一致,缺乏互补性。即使课程选编的内容是最优秀的文化成果,也杜绝不了千篇一律,更何况目前的教材编制还达不到这一点。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在这种统一的教材体制下,不但未能培养出类拔萃的世界级顶尖人才,甚至科学成果还不如以往。不难想像,千篇一律的教材及其统一的教学模式,对于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强则同强,弱则同弱。强则也罢。但要是培养出来的人弱了呢?这可要影响十三亿人哪,谁能站出来挺直了腰杆承担这个责任呢?

基础教育是这样,因为中小学毕竟是教与学的开始,知识认知的基本规律决定了中小学教学的基本属性,相对而言,有着较多的

同一性,实行统一的教材利大于弊。而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如何来确定和使用教材,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高等学校应当使用统一的教材。尽管我们的高等学校层次差异很大,但相同的学科和专业,其知识程度和对学生的要求是相对一致的,使用相同的教材,可以更好地促进教学交流,更好地衡量学校的教学水平,尤其重要的是,能够组织这一领域的专家编写一流的精品教材,以提高教学的质量。从中小学的教学实践来看,这是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不同于中小学的教学,不管从知识结构和知识水平,还是从教学对象和教学方法来说,都有着决然不同的方面,大学教学的要求,不应当仅仅是给学生灌输和传授知识,而且更加应当加强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启发他们科学研究的兴趣和探索精神,尤其是在素质教育时代要求下,应该鼓励学生和教师用创新精神进行教学活动,而且再好的教材总是滞后于知识的更新,统一教材的做法,无疑封杀了教师和学生创造性教学的空间。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教学观念。

现实的情况是,高校的教材使用存在着许多问题,按照有关规定,除了在一些学科强调使用指定教材外,高校的一部分教材是可以由教师来指定的,也是可以使用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经审定批准的教材的。但由于编写和出版环节的原因,教材内容经常会滞后。为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利益,往往又不得不使用这样的教材,有的甚至出现两本教材或重复使用教材的情况,或者会出现教材脱节等其他问题。即使是一些由政府部门指定的统一教材,也会出现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现象。教师抱怨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则抱怨教学内容的严重落后,一些社会用人单位则抱怨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我觉得一个学科或者一个专业总是有一个业内人士公认的比较好的教材,一些在某个专业领域内从教多年的学术泰斗和经验丰富的教学前辈,他们以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编写出来的精品教材是一个知识宝库,应当值得提倡和尊重。国家教育部对一些专业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教育领域的教材,提出统一的要求和指导原则,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需要,也应当认真地贯彻实施。另外在一些普通学科,知识的相对稳定性和一致性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应用相对统一的教材也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以外,我认为应当坚决放开对教材的使用限制,鼓励教师在吸取新知识、新观念的基础上不断地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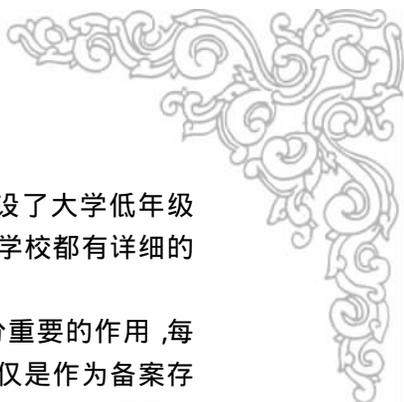
新教材和教学内容。

21 世纪高等教育对教材建设的新要求是:教材必须是教学信息的载体,是学生学习和老师讲授的基本依据,应该为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服务。教材的编写应体现多样化的方针,必须和课程的性质相统一,每一本教材都应有所侧重,有特色并指明使用方法。同一门课程可以有多种类型的教材,还可以出版一系列相互配套的教材和参考资料。教材也应当具有层次性,它是根据学习者的专业程度来决定的,层次越高,教材的理论性越强,反之,教材的形象性越强。一本教材中的知识点要具有层次化和模块化的特点,尽量使每个知识点简化,而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清晰,整部教材中的知识点相互勾连成为有机的整体并体现出应有的风格和特色。在最近的国际国内人才培养规格和基本素质要求的客观背景之下,突出强调教材要为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同时要与教学方法相匹配,并且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习对象,遵循教材编制的客观规律,编写系列教材,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 etc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结合深入的教材编制理论研究,编写出多样化、多层次的高质量教材。而且,知识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我们应当极力用“明天的知识来培养今天的人才”,而不是总是用“昨天的知识来培养今天的人才”。高等学校的学科知识的先进性和特殊的教育地位,决定了高等学校始终应当站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始终应当把最先进的知识教授给学生,始终应当结合社会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来调整对学生知识结构的要求,甚至建立和创新社会急需的学科和专业。所以,高等学校的教材使用必须要有充分的灵活性,同时也要有严肃性,根本的宗旨是鼓励教师不断地根据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更要鼓励学生不断用崭新的眼光看待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敢于挑战知识和追求知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考试,教材的使用和对学生的考试要求是密切相关的,也是有着制约作用的。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到以后的章节加以阐述。

在这里,我们不妨介绍美国大学的一些经验。美国大学没有一个适用于全体本科生的统一教学计划,也没有一个适用于各院本科生的统一教学计划,甚至没有一个适用于各专业本科生的统一教学计划,他们所称的教学计划是一个由各类必修课、限选课和任选课所组成的、具有很大弹性的、适应本科生各种学习需要的、

庞大的课程体系。大致而言,一所大学的教学计划主要包括低年级本科生所必修的核心课程计划、高年级学生应当主修的专业课程计划以及其他供学生任意选修的课程计划,有的大学还有不占学分的课程计划、培训课程或活动计划,由学生自愿参加。各大学的核心课程计划通常都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几大基础学科领域的数十门课程,学生根据对不同学科领域课程选修的规定,在有关教师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学习基础和兴趣爱好,选择规定学分的课程作为自己的核心课程计划。如斯坦福大学要求本科新生在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工程科学与数学领域、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世界文化、美国文化与性别研究等领域修满9门课程,其中在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工程科学与数学领域应选修3门课程,但2门课程不得同属一个学科领域;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选修3门课程,其中必须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选1门课程。这样一来,即使同时入学且在相同学院(系)或专业注册的学生,所修的核心课程也都是各不相同的。

各大学的专业课程计划一般为三、四年级本科生所开设,通常分为初级专业课程和高级专业课程两类,选修高级专业课程之前,必须修满初级专业课程所要求的学分或课程门数。有的大学要求学生选修高级专业课程后写出本科毕业论文,或在专门组织的高级研讨班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大学在专业课程计划中也列出专业核心课程或课程组合,要求学生必修或限选。对于任意选修课,学校一般不作具体要求,凡本校开设的课程都可以选修。当然,有的课程本身附加了选修的条件,学生如果任选,也要达到相应的要求。任选课一般在大学一、二年级选读,为学生拓宽视野、增加知识、培养兴趣服务,也为高年级学习专业课打基础。因此,可以说大学没有针对某一个年级或某一个专业大学生贯通整个本科四年学习过程的教学计划,每一个大学生的教学计划都是在一定原则指导下由学生自由选择各类课程所组成的,具有对学生个体的适应性,但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所以,在一届学生毕业时,一个专业的毕业生所修的全部课程可能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的。各大学对学生转换专业持十分宽松的政策,只要学生提出申请,一般都能满足,学生还可以多次转换专业。当然,转换专业后,就要按所转专业的要求来选修专业课程。美国大学本科生中有很大大比例的继续教育学生、从其他大学转学来的学生以及从初级学院或



社区学院升上来的学生,还有一些学生来自于开设了大学低年级课程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对这些学生的教学计划,学校都有详细的规定和要求。

教学大纲在美国大学本科教学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一门课程都有详细充分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不仅是作为备案存档的主要教学文件,也是教师教学的基本依据,是学生进行课程学习的主要指南。有的大学将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录入学校的教学资源库,在学校网页上公布。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查阅,一般只有在学校注册的学生才可能获得相关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上网查阅。教学大纲的主要内容包括课程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考核要求、教材、参考书目、参考资料和每门课程每一次课的教学内容与要求等。教学大纲由担任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编写,在上第一次课的时候发给学生。教师按照教学大纲授课,学生按照教学大纲预习和复习功课。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不得随意更改教学大纲所列出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安排;否则,在学期结束时的课程评价中,教学组织或完成教学任务情况就可能难以得到积极的评价。不同课程的教学大纲尽管在编写体例上大致相同,但详略不同。由于每一位教师对教学要求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不同教师所编的教学大纲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一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只有五六页纸,有的达十多页;有的对教学内容只列出每次课的主题及必须阅读的主要文献,有的则不仅列出每次课的主题,而且列出具体将要讨论的各种问题,甚至通过教学所要达到的教学目的。教学大纲是经常变化的,有的教师每一轮授课的教学大纲都不一样,都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学术界的新进展对教学内容进行增删或调整。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基本素材。通常一门课程教师都要列出至少2至3本专业书籍作为教材,在教材之外,教师还要列出数目不等的教学参考书和数十篇或更多的相关报纸、学术期刊的论文。有的教师将重点论文或一些著作中的重点章节编辑成册,或通过书店或通过院系办公室向学生出售,收回成本。有的教师还在教学过程中印发一些新的论文或资料,确保教学能够跟上学术的新发展。在教师建议阅读的材料中,有关专著达到36本之多。教师在每次上课时还为下次课带来一些复印的阅读材料,分发给学生。所以,一门十几次课的课程的阅读量非常之大,有人说一堂2.5小

时的课的阅读材料可能需要 20 到 30 个小时才能阅读完。因此,美国大学生的学习压力是很大的,课后大量的时间都用在阅读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上,因为如果不读完全部或大部分的阅读材料,就很难在课堂上参与讨论,很难参与小组活动,很难完成每次课后的作业,也不太可能通过期中和期末的课程考试,即使勉强通过了,也很难得到好成绩。

教材的供应与管理是市场化的。一般每所大学都设有一个教材书店,专门负责教材的采购、供应与管理。学期开始时出售教材,学期结束时收购学生用过的教材。所以,书店里的教材不仅有新书,而且还有往届学生用过的旧书,当然新书和旧书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差价在 1/3 或 1/2。教材书店只供应本学期所需的教材,一学期过后,书架上都摆上了新学期要用的教材。<sup>[8]</sup>

###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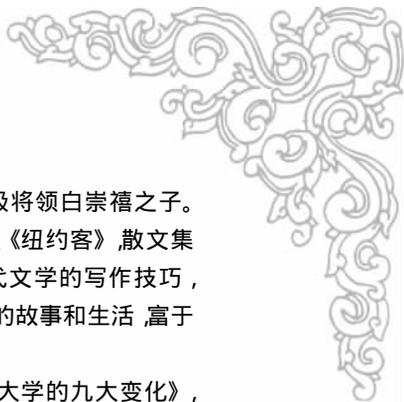
[1] 参考金耀基著:《大学的理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 12 月版。

[2] 转引自《新周刊》文《“离经叛道”的教育者程介明》。程介明,香港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院首席教授。他极力主张“无为而治”的教育理念。他以为:“大学不在乎灌输知识。大学里面最快乐的就是生活,离开以后找不到了,一生以后不会再有了。”

[3] [美]亨德里克·房龙著:《宽容》,迺卫、靳翠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年 9 月出版。

[4] 参见[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著:《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出版;贺国庆著:《外国教育专题研究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8 月出版;[荷兰]弗兰斯·F. 范富格特主编:《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出版。别敦荣《美国大学教育观察》一文,原载《中国大学教学》月刊。

[5] 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办的“国际在线”(CRI Online)2003 年 7 月 23 日报道,法国政府为阻止外来文化的入侵,决然封杀“E-mail”一词。法国文化部的这道封杀令内容如下:禁止法国的一切政府部门、文件、出版物或网站使用“E-mail”一词,相应的“电子邮件”之义改用法语中的合成词“Courriel”来表达,该词是由两个法语单词“courier”和“electronique”合并而成的。法国文化部下属的术语和新词最高委员会解释说,“Courriel”一词的发音非常具有法国特色,可以唤起民族自豪感。而且它现在广泛用于报刊,与借用的英语单词“mail”相比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6] 白先勇,当代著名作家,广西桂林人。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7]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E. 莱文:《未来大学的九大变化》,陈海东译,《中国高等教育》2001 年第 19 期。文章提出了未来大学即将出现的九大变化,即:一、高等教育的提供者越来越多,并将更加多样化;二、正在形成三种基本类型的学院和大学;三、高等教育正在变得更加个性化,教育日程将由学生而不是大学来设定;四、高等教育焦点是从教到学的转变;五、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可能被分离;六、大学教学人员将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于学院和大学;七、学位的重要性将降低;八、每人将有一份教育证明书;九、花在学生身上的费用将比花在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更多。

[8] 参见〔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著:《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出版;贺国庆著:《外国教育专题研究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8 月出版;〔荷兰〕弗兰斯·F. 范富格特主编:《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出版。别敦荣《美国大学教育观察》一文,原载《中国大学教学》月刊。

##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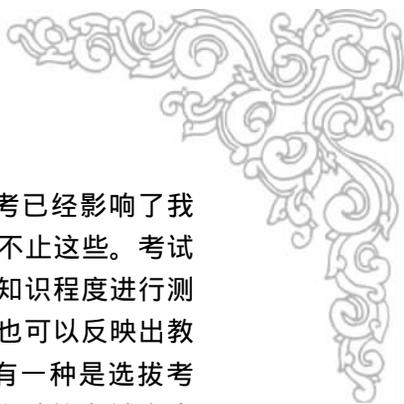
### 高校的考试和教学评价

我国社会有一大奇观就是“考试现象”，不仅学生要考：期中、期末考试、升学考试、高考、英语等级考试、托福、雅思考试等等；教师也要考试：资格考试、职称考试、专业业务考试、出国选拔考试、晋升考试；社会上各行各业也要考试：考公务员、考上岗证书、业务测验，等等。政府的人事局有个考试中心，每年组织考试任务，特别繁忙。考试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考试现象的背后，有着一种人才观的支撑，我们现在有着怎样的人才观呢？《深圳商报》2002年1月14日一篇题为《讲学历讲职称的今天，谁是人才》的文章<sup>[1]</sup>指出：

在现在的人才政策中，“学历、职称、职务、资格”之类字眼，构成了时下“人才观”的最显明的基本特征。在此“人才观”的误导下，出现了盲目追求学历文凭的怪现象——学子混学历文凭，官员捞学历文凭，商人买学历文凭，大逆不道者买卖假学历文凭证书……学术职称的获得也是一样不择手段。因为，学术职称 = 工资级别 + 福利待遇 + 住房条件 + 退休医疗费 + ……以上这种以学历、学位、职称论高低的思维方式和人才观，在市场经济中实际上没有多少意义。在市场经济中用不着伯乐来“相马”，一般用市场机制的“赛马”形式，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因为“赛马”是公开的竞争，在公正的规则下，哪匹马跑得快，大家一目了然。

人才 = 学历文凭吗？人才 = 学术职称吗？人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人才吗？人才是伯乐相出来扶起来的还是“赛”出来的？人才只有一种标准：学历文凭与学术职称吗？这些问题困扰着人才培养、使用部门和每个新世纪的中国人。如果新世纪的中国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必然会加速人才资源沙漠化。

《深圳商报》这篇文章指出现象，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或许也被我们的社会所认可。这种现象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的人才评



价体系是以考试为基本手段的。我前面说过,高考已经影响了我国整个人才评价体系。实际上其深层次的意义还不止这些。考试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评价考试,就是对参考者的知识程度进行测试,以达到检查其学习效果的目的,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教学的水平,大多数的学生接受的是这种考试;还有一种是选拔考试,无疑是一种竞争性很强的考试。社会上选拔人才的考试大多是运用这种考试方式。两种考试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当然其涉及的知识范围也有很大区别。人们普遍认为,考试至少有其相对公平的一面。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法制尚不十分健全的国家,运用考试的方法来测试、选拔人才,仍然有积极的意义。譬如高考,尽管它存在着许多弊端,但之所以能被大多数人接受,我想很重要的一原因就是它多少还具有公平性的一面。特别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要求社会公平是其追求的首要目标,相对金钱和权力来说,他们更愿意选择考试来争得教育公平。正因为如此,许多全国性的考试越来越多,全国公务员考试,外语统一考试,还有各个系统内举行的知识考试等等,地区性的考试就更加多。现在流行选拔招聘干部,其首选的方式就是考试。更有甚者,有的单位为了摆脱一些用人选任方面的麻烦,也进行考试,目的只是用考试来回避某些矛盾。可见考试已经不是学校的专利,而是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工具。

## 考试的社会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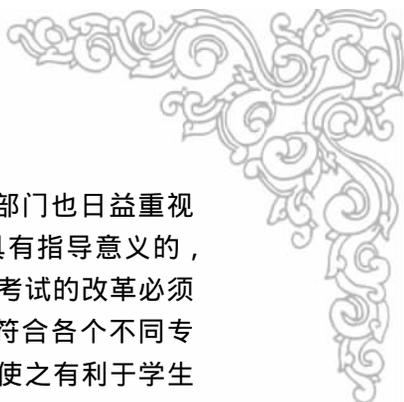
过去,我们的人才标准主要强调工作阅历和经验,后来比较注重教育背景——文凭,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仍处于精英教育的历史时期,人才青黄不接的时候。用人单位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具有依赖性,文凭的“含金量”就比较重。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而走上了大众化道路,社会拥有各种不同文凭的群体不断膨大。人们也慢慢发现学历文凭和人才所具有的实际水平有着一定的差距,过去的实践也证明“文凭不等于水平”。那么,如何真正了解人才的实际水平呢?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考试。但组织考试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省事省力,就推行“标准化”考试,其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采用答题卡的方式,让应试者选择、打钩、画圈。当然试题也要标准化,高考就是一例。这种考试如果运用于有着

丰富实践能力并且只要求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的劳动者,倒是有好处,而且可以推动知识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但把它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似乎有不妥之处。尤其是像高考这样意义重大的考试,不仅代表着我们选拔人才的政策倾向,而且对中小学的基础教育有着重大指导意义,对学生来说则是“一卷定终身”,关乎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如果我们选拔的学生只能应付考试,如果我们的学生只会回答“是”还是“不是”的话,这与我们提出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方针岂不是背道而驰吗?在大学也一样,我们的考试如何真正体现教育方针,体现人才培养要求,使之符合社会不断进步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因此应当对存在诸多弊端的现行大学考试制度进行改革。

《中国教育报》曾经报道:在武汉举办了大陆、港、澳、台海峡两岸四地考试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两岸四地的100余位考试界专家学者,围绕考试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就考试理论、考试制度、考试管理、考试技术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这次研讨会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等部委的考试中心与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大陆20多个省市考试管理部门和高校相关科研院所,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相关考试机构负责人出席会议,共提交60余篇学术论文。与会专家在研讨中指出:

在新的世纪,作为考试故乡的中国,考试事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导致中外考试文化互相渗透加剧,国外新的考试观念、理论和考试技术不断涌入,与中国传统考试文化产生碰撞和交融。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考试制度越来越与政府行政、人力资源开发、职业资格准入、教育革新等密切关联。考试制度的改革创新,已经成为两岸四地政府、社会舆论和民众关注的热点。中国传统考试文化既面临适应社会变革所提出的新要求,也面临着自身结构与功能优化的现实需要。现时的中国,无论是领导人才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职业资格考试,还是学校招生考试、中学毕业考试、高教自学考试等,都需要完善考试制度,规范考试管理,不断推进考试的制度化、科学化建设,有效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sup>[2]</sup>

这则报道说明,考试制度的建设十分重要,中国的考试制度改革已经引起了教育专家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如何改革考试制



度涉及到社会多方面的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有关部门也日益重视考试制度的改革问题。高校的考试改革当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我认为,高校的考试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考试的改革必须符合人才培养和开展素质教育的要求;二是必须符合各个不同专业对学生的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方式,使之有利于学生的成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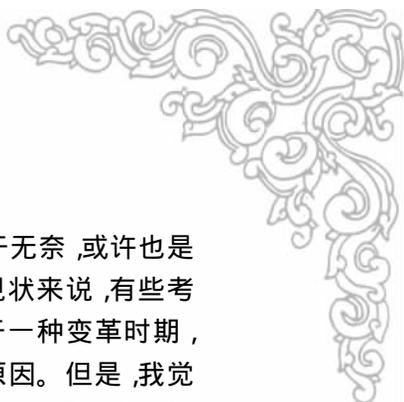
## 考试的理念

首先,考试应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符合素质教育的理念。考试是一种评价,是对学生的学习评价,同时也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我们可以通过考试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生的学习给出教师的评价。但同时,考试更是一种引导,教师一般是根据课堂教学的重点和学生应掌握的每门课程重要的知识点出考题的,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掌握每门课的重点内容。以教师的经验和对每一门课教学重点的理解,引导学生掌握教师所教授的课堂知识,这就是考试的指挥棒作用。一般来说,教师的考试设计是根据教学的要求进行的,每门学科的知识内容都有系统性,在这个系统里的任何知识点都可以成为教师出题内容,任课教师也拥有这样的权利来根据自己的教学重点决定考试的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更加应当拥有这样的权利。即使是一门公共课,即使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学科内容,高校教师也应当有这样的权利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设计考试。再者,我主张大学的考试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卷定乾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随时可以用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测试,包括课堂回答问题,包括平时的作业和讨论,还有对课外自学的抽查等等,都可以视为考试的形式。这种综合的评分当然可以避免学生“一失足成千古恨”,也能对学生的学习过程有了一个良好的监督和引导。

我在前面强调过,教师要对学生“宽容”,在考试过程中也有一个“宽容”的观念。考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检查自己的学习状况,更好地接受知识,学好专业。如果学生的考试一次不能过关,不符合教师的教学要求,达不到应有的标准,应该给予更多的机会,这就是补考的意义,评价的方式是可以改进的。我们不当

在考试制度上让学生产生一种学业的暂时性失败。考试总会反映出一些学生比较优秀,另一些学生差一些。学校的评价是可以引导的,比如评价可否全面一些。人不是完人,有的学生在知识性方面表现比较优异,但有的学生在其他方面更有才华。对一个人的评价应该是完整的,应该是对人的一种全面性评价、发展性评价。要让学生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怎样在现有知识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不是整天想着自己的分数比同学低一分或高一分。如果学校不断地给比较多的学生以挫折感,这是学校评价制度的一个失败,不能体现考试的真正意义。考试的真正意义应当是促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各种素质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考试不是评价的惟一手段,这是一个始终应该坚持的教育理念。一次考试不合格,可以再给一次机会,甚至更多,学制可以延长,考试方式可以改变。在目前,高校普遍的办法就是重修或者补考,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应当给学生更多的机会。这是教育的“宽容”。当然,考试的制度是应该严格的,也应当维护考试的公平性,否则,考试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学校在制定严格的考试制度及其相应的管理措施时,始终应当坚持“考试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当然,我觉得,在考试环节中,教师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我国,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教师队伍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十分严重,社会反映也很强烈。主要是教师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存在问题。其实质性问题,我觉得一方面仍然是教师的地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师资的紧缺,高等学校不得和中小学一样放低要求吸纳师资,造成一些教师的任职条件达不到要求;另一方面,由于高等学校改革的滞后,一直缺乏一种良好的政策环境进行人事改革,以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但是,应当指出,这样的问题毕竟是极少数的。为了避免产生一些考试环节上的问题,现在出现的一种趋势,就是采用标准化考试,以排除教师人为因素对考试的影响,来维护考试的公平性和评分标准的统一性。我认为,这绝对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办法。一些高校采用建立试题库,抽取标准试卷对学生进行测试,甚至,也运用答题卡的方式进行标准化评分,以保证对学生评价的“绝对公平”。这种方法导致试卷越出越“死”,越出越简单;另一种方法是采取“教”和“考”分离,试图抹平教师评卷的差异,还有的学校居然也试行部分高校相同课程联考的办法。如果这是一种偶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成为



一种制度,就实在值得商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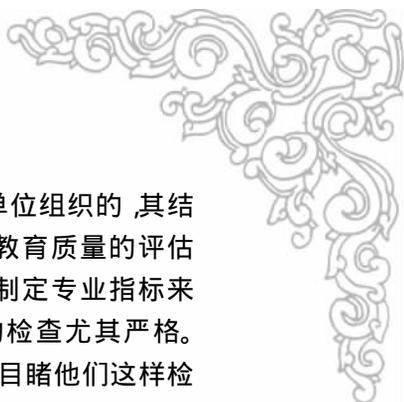
平心而论,一些大学采取这样的做法也是出于无奈,或许也是为了尽可能减少麻烦和问题,确实,就大学管理现状来说,有些考试方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我们还处于一种变革时期,这样的一些管理办法确实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具体的教学环节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人才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涉及到我们大学应该建立怎样的教学评价体系的重大问题。我在前面一再强调,大学要培养高素质人才和创新人才,这一原则应该结合在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中间。在教学过程中,我坚决主张教师用启发式、双向交流的方式来引导学生的学习,既要引导学生对自己所学知识的灵活掌握和运用,更要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更深入地学习钻研所学的知识。那么,作为教学评价的主要方法的考试也应当与这种素质教育的教学理念相适应,应当是这种教学理念的进一步巩固和升华。不能因为在考试评价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彻底否定这样的考试评价理念。“死”的题目只能导致“死”的思维,“活”的试题才能激发学生“全新”的、“灵活”的思维,只有“灵活的”思维才能具有更多的创造性。“灵活的”试题也意味着“灵活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在不同教师之间显然也有着评价标准的差异。有人就认为这就会导致“不公平”,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是大学教学的多样性、教师教学的多样性所在,换句话说,这也是大学之间和教师之间的差异性所在。我们应当把这种教学和考试的权利还给教师,也交还给学生。

现在的高校还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学生考试作弊。教育行政部门一再强调要抓好学风建设,杜绝学生的考试作弊之风,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手段,要求各个高等学校的领导重视抓学生的考试作弊问题,每当期末考试来临,各个高校也是全校动员,严阵以待,“如临大敌”。何以至此呢?一方面确实与一些学生的主观上的投机心理有关,一些学生平时对学业不重视,考试就想冒险;另一方面,我想和现有的考试制度不无关系,考试机制呆板,考题“偏死”,形式单一,除了闭卷考试,没有更新的考试手段。惟一的好处就是教师评分的“公平”和便于监督。如果考试的形式多样化、出题灵活,甚至采取开卷考试或公开答辩的话,我想学生作弊概率是否会更少一些呢?如果一门课的考试是实行公开的答辩方

式进行,学生想作弊也不可能。

其次,考试也应当符合知识学习的客观规律。我们对知识的学习是分几个阶段的,是一个学习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创造新的知识的过程,不同的学习者会停留在不同的阶段。就比如学习英语单词,你第一次学到了一个新的单词,知道了它的意义、读音和拼写,只能说你认识它了;后来,你又碰上了这个单词,你能记起来它的意义、读音、拼写,只能说你掌握了它;但它还不是你的,只有你真正在实际生活中能运用自如了,能说、能听、能写了,它才真正属于你的工具,而如果当你能用它来创造更新的含义,你才是它真正的主人。科学知识也是这样,大学教学的理念就是要培养学生真正做知识的主人,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不断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这才是创新人才,才真正是我们高等教育应当培养的人才。谁都懂得,创造知识意味着对自己所学知识的怀疑和背叛,换言之,这种怀疑和背叛是创造力的源泉。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怀疑和背叛是遵循科学规律的,是知识学习的一种升华,绝对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怀疑和背叛。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教师对教学活动的重新设计,需要发挥教师的个性,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宽容”,来完成教学和对学生的评价。

有人会指出,教学评价不仅仅是对学生的测试,以评定学生对每门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也包括了对教师教学的评定。按照以上的教学评价理念,如何来对教师进行教学评价呢?首先,我认为对教师的教学评价不能全部通过考试这一形式来进行,高等学校没有升学率的问题,和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应当通过对教师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的调查才能全面地评估,特别应当相信学生的评价;其次,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同样应当将其科研成果与教学效果相结合,与教师的基本素质和敬业精神、职业道德、行为操守等方面的考核结合起来。但不能只用科研成果来衡量教师的优劣,同样也不能只用教学的成效来评价一个教师的成败得失。在英国,教育部下面有许多专门的委员会,其职责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全国教育系统进行各种各样的检查和评估,它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就专门对高等学校的教学进行检查,十分严格,包括对每一个教师三年一次的教学评估和质询,这些都面对面地进行。英国大学每



年一次的综合实力排行榜,是由多家机构和新闻单位组织的,其结果也不完全一样。除此以外,英国每年还有一个教育质量的评估排行榜,主要就是针对各个大学的教学质量专门制定专业指标来进行评定,教育部对位居该排行榜前列的大学的检查尤其严格。2003年末,我在约克大学进修时,正好赶上机会能目睹他们这样检查。不仅对整个学校的教学整体情况进行考查,而且对每个教师都进行面对面的考核评估。教师要准备自己的教材(在英国大多数教师是自己编写教材的),尤其是教材的更新部分,以及相关的参考资料、教学成果和学生的评价资料。大多数教师要接受评估委员会专家的质询,甚至是现场听课。这种检查的结果,对每个教师的升职、评职称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没有一个教师会懈怠。这种非常专业的检查和质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教师的教学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几年前也开始了对外高校的本科教学检查和评估。其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求高等学校重视本科教学,其决策的背景,我想一定是看到了这几年由于高校学生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了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的滑坡。检查的出发点是十分正确的,应当扭转大学不重视本科教学的现象,尤其是实行收费制度以来,老百姓对大学的本科教学更为关注。但检查结果令人惊讶,居然绝大部分高校本科教学都是优秀,再看看这些优秀的学校的网站,学生在BBS上发表的抱怨何其多,再实地去考察、领略一番,也大失所望。学生的网站一向不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正宗的言论,也招到了“网官”的管制,确实也有一些人惟恐天下不乱,发布一些不实之词,但我倒是认为,至少可以从中获得一些信息,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一些比较真实的信息,其中不乏一些对大学的现状提出的一些诚恳的意见。这就令人大惑不解。其中的缘故,想来自然会被许多人理解。我无意贬低这种大规模的评估检查,但教育部要管到一个具体的教师的教育质量,确实是有点勉为其难,但为什么不能放手让地方(省、市)一级的教育部门来管呢?

我也深知我国教育机制中存在着怎样的弊端,偌大一个国家,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数量众多的学校,如此巨大的地区差异,都是我国教育领域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在教育管理上,教育部应该让地方教育部门、高等学校承担起更多的管理职能。不能在管理理念上只追求“大一统”的观念。在具体的管理措施和规则上,应

该给地方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予更多的管理自主权。比如考试制度,应当允许各种类型的学校大胆地进行有益的尝试,鼓励学校结合各自的办学特色,探索出一套适合学校发展的方法和措施。高考的改革已经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将高考划归地方,教育部宏观调控,应该是成功的一步。其实,在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都可以尝试这样的改革。譬如:文凭的授予权、专业的设置权、学制的改革权等等都应当交还给学校,只有将高校推上良性的竞争轨道,才有可能使高等教育发展得更快更好。我只是真诚地希望,对大学的教学、考试理念有个良好的改变,使之更加符合时代对人才的要求,符合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科学规律。

#### 注 释

[1] 参见2002年1月14日《深圳商报》,文章《讲学历讲职称的今天,谁是人才》。

[2] 参见《中国教育报》2003年10月15日第五版。



## 第六章 素质教育

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三百多年前现代实验科学始祖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强调学校应传授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强调“知识教育”(尽管培根自己在剑桥上学的时候,也背叛当时的思想和信仰)理念<sup>[1]</sup>,到劳厄的“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和爱因斯坦的“想像比知识更重要”的主张<sup>[2]</sup>,强调“能力教育”,期间经历了漫长的二百多年历史,这种转变是缓慢的。进入 19 世纪,这种强调培养能力的教育思潮,逐渐演变成一种全新的教育思想——素质教育。特别是上世纪 70 年代,哈佛大学马克雷朗教授提出,能力是与创造高效业绩挂钩的职务行动特性,提倡基于能力评价业绩的“能力主义”理论,使得这一理念具有了世界性意义。世界各国的教育纷纷制定教育发展战略,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1985 年美国提出 2061 计划<sup>[3]</sup>,超前规划美国公民需要进行科学扫盲,出现了 STS(科学、技术、社会)式的中学教科书。英国中学课程也出现了与过去的学科式大纲完全不同的、以社会热点为教学中心的大纲。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确立了高等教育的全球战略。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突出了培养创新人才的素质教育理念。因此,有理由相信,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念,这必将引发教育的深层次革命。<sup>[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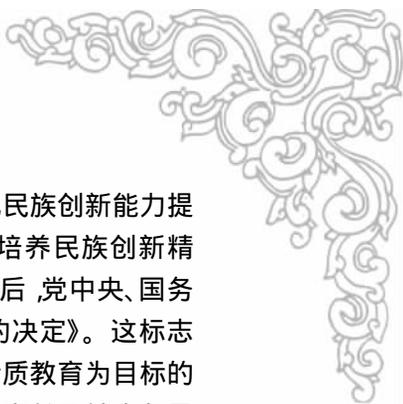
### 素质教育的背景

“文革”以后,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高等教育重现生机,二十多年来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但就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原有的单纯的“知识教育”又进一步走向“应试教育”的死胡同,高考本身也出现许多困惑和误区。本应生机勃勃

的青少年为了挤进大学这座“象牙塔”，顶着家长、社会和学校教师的压力，用尽自己所有的心智，毕其功于一役，闯过独木桥，进入大学校门。而一旦入了大学，不少人又完全放松自己，开始暴露出其素质脆弱的一面，心理问题、生活问题、学习问题等等充分暴露出来，以至于学生一旦离开教师的指挥棒就会显得无所适从。这种局面已经严重阻碍了青年一代的成长。时代呼唤素质教育。

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深刻揭示了教育在服务现代化建设，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开拓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任务。1982年小平同志提出：要使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公民<sup>[5]</sup>，具体地把提高公民的基本素质确定为教育目标。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培养“四有”新人，此后，培养“四有”公民即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要求而写入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和《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文件和法律法规中。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1986年《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指出“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着重论述了“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的深远社会意义。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把素质教育摆到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日程。1985年之后颁布的一些重要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都强调提高民族素质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发表后，素质教育这个概念风行起来了。后来在199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把素质教育提高到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认为素质教育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是一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落实



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会议。会议强调：“我们必须把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新阶段。时至今日，素质教育已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但要在更高程度上取得共识，形成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机制，仍需做进一步的努力。在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仍有待不断探索、研讨和解决。

譬如，对于素质教育的理解有差异。什么叫素质教育？《现代汉语规范词典》<sup>[6]</sup>对“素质教育”的解释是：依据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促进个体德智体美的发展，着重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以发展个性为目标的教育。一般认为，素质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与“应试教育”相对的一个概念。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长远进步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受教育者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素质教育要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学会审美，为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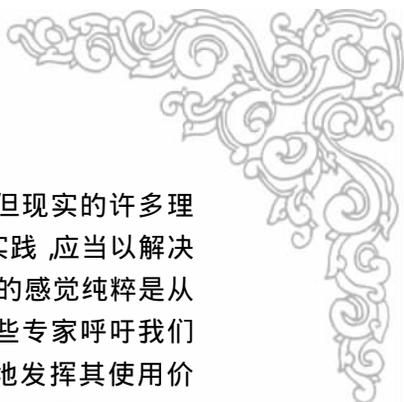
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为贯彻落实邓小平教育理论，摆脱“应试教育”羁绊而进行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结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理想、愿望和改革主张的凝聚。如果要就素质教育的涵义作一个表述的话，可概括为：素质教育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教育。相对立的，“应试教育”则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由于教育指导思想不同，两者在教育目标、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重大问题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应试教育”以应试为目标，片面追求考试得高分，围绕考试，构建教育体系，安排教学内容，考什么教什么，考什么学什么，偏重智育，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教学方法则是频繁考试，题海战术，死记硬背；在分数高压下，学生负

担过重,处于被动地位。素质教育力求改变这种状况,以面向 21 世纪中国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为依据,以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为目标,按照学习者自身发展的规律构建教育体系,安排教学内容,重视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方法则主张因材施教,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

## 素质教育的内容

自素质教育的理念被提出以后,专家学者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各有不同,关于什么是素质,什么是素质教育的内容,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也已经有了相当完全的阐释。至于高等教育,对于大学生来说,应该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应该怎样开展素质教育,又是一个需要我们积极探索的课题。我认为强调素质教育,重要的是突出一种教育理念,一种要求我们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实施的理念。有人希望专家们能够设计出一套素质教育模式,由教育行政部门下达,以规范各地素质教育的行为,这种要求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实际的。不能将素质教育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公式。素质教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体系,没有也不应该有固定不变的模式。素质教育永远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变化的,不断创新的。科学性是它的内容,丰富性是其内涵,多样性是其形式,创造性是它的灵魂,优化教育、教学过程,使之生动活泼、充满创造力则是它的精神实质。当然,素质教育也不是不可捉摸的,相对于“应试教育”,它有自己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要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发展、完善的。这个体系目前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基本框架已见端倪。这就是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围绕做人、求知、办事、健体、审美、创造等行为展开教育活动。

因此,我觉得我们讨论大学的素质教育问题最好摆脱那些“高深而难懂的”理论羁绊,结合大学的实际来审视素质教育。并非我不重视理论,也并非我们排斥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实在是感觉一些理论作为研究的成果是绝对有意义的,但作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和结合现实情况的分析,还需要有一个实践的飞跃。我们有了太多的理论,一旦被实践的需要束之高阁,就失去了它作为理论的实际指导意义。许多研究文章确实十分透彻,也是十分深奥,但给人



的感觉就是离现实太远。我并非提倡实用主义,但现实的许多理论,必须要有实用的观点来加以评判。理论对于实践,应当以解决实际问题为首选,而一些研究文章,读了以后给人的感觉纯粹是从理论到理论,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有些专家呼吁我们的学界,应当更多地提倡实证研究,使理论更好地发挥其使用价值。我国对素质教育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也有了专门文件,专家学者的文章也很多,可现实情况仍然不容乐观。针对目前大学生存在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要解决哪些問題,我也试着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路。

第一,高校的素质教育首先应着力于养成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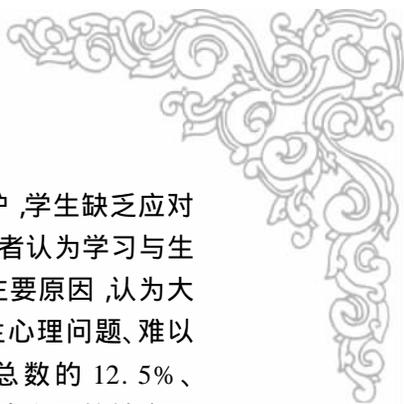
着重于养成教育,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让学生懂得怎样应对生活,这是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也是对基础教育进行“补课”的无奈之举。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过“独生子女现象”已经开始冲击我国社会,这种时代特征越来越明显地在大学生身上表现出来。大学校园里存在的许多问题和不良现象,说明许多学生至今仍不懂得怎样应对生活。心理健康、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等等方面都出现许多“不良反应”。人在不同年龄段对生活的理解和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婴儿时期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是学会吃奶,幼儿时期要求他懂得安全,青少年时期要求他开始学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开始懂得怎样学习,懂得基本的行为规范,大学生应该是成人了,应该理解更深层次的生活含义和有更高的生活追求。由于我们基础教育的缺失,许多学生没有很好的本应在基础教育阶段拥有的素质,在大学里进行养成教育,实在是属于补课之举。让大学生学会生活,内容实在很多。但根据我的观察和调查,我以为,现代的大学生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是心理健康问题。在教育研究中我们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前不久,在南京召开的大陆、香港、台湾三地 21 世纪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有报告说:在我国 80 年代中期,23.5% 的大学生有心理障碍,90 年代上升到 25%,近年来已达到 30%。<sup>[8]</sup>而另外一项以全国 12.6 万名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显示,20.23% 的人存在不同的心理障碍,在一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两年内就有十几个学生因严重的心理疾病而休学或退学。其形成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我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影响。大多数家庭的教育观念没有立足于让子女提高独立生活的

能力,特别是没有教会他们拥有健康的心理。对子女过度的保护,残缺的教育和成材观念,致使孩子们除了学习,并没有在真实的生活环境中独立生存,遇到困难与挫折难以承受,缺少应对知识,于是就屡屡发生各种问题。第二,我国的基础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的模式。中小学生在学校也得不到应有的心理教育和辅导。值得关注的是,从生理成长的过程来说,医学专家也认为,现在的青少年生理成熟期普遍提前,随之而产生的心理问题也提前出现,高考前紧张的学习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关闭了某些心理欲望,而事实上单纯的中学校园使他们生活在相对纯净的生活环境里,缺少对社会的了解,更不要说许多重点中学为了保证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采取了近似于“军事管制”(一个中学校长的用词)的管理办法,更使学生“与世隔绝”(一个高中学生的用词),连家长的关心也几乎与“探监”(一个家长的用词)一样。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心理关怀、教育和辅导,这些积聚在一起的精神上、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因素,一等到学生“如释重负般地”踏进大学校园,或走上社会,会得到一个集中的释放。这种释放是一种必然,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就会呈现出混乱状态。那么,产生心理健康危害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在大学生身上存在的状况就是如此。

而一些学生由于缺乏健康的心理知识和社会经历,又得不到心理健康辅导,自然就会出现不适应症,严重者则“病入膏肓”。实际上,每一个人是多少有一点心理健康问题的,而每一个人由于个人的认识能力、意志力、判断力和应对能力的不同,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和阅历的差异,自然在产生心理问题时所作出的反应也完全不一样,如一些大学生中出现的“轻生现象”、“偷盗成癖现象”、“考试作弊”现象、“行为怪异”现象等等。2004年2月20日雅虎中国网报道了一则题为《北大才子拾垃圾续:衣衫褴褛,性情怪异,吓跑母亲》的新闻采访就十分典型,正像记者报道的那样,“北大才子”(江淘)仅仅因为受到感情的打击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心理健康的原因十分明显。

再看另一个报道。中国教育网公布《关于何种原因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调查报告》称,2003年9月27日,中国教育网(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展开了关于何种原因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调查,截至2004年2月13日,共有1786名热心用户参与了调查投票。调查结果表明,34.94%的读者认为,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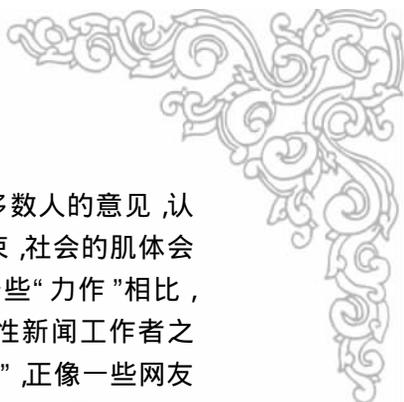
的主要原因是应试教育导致家长、学校的过度保护,学生缺乏应对困难及心理承受力等锻炼。同时,有31.12%的读者认为学习与生活、就业的压力也是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一个主要原因,认为大学生人际关系处理不当、属于敏感群体,容易产生心理问题、难以排除的情感危机等为主要原因的分别占投票总数的12.5%、9.78%及7.47%。根据我国著名的医学心理学家李心天的健康理论,健康状况的评价公认的心理指标有三条原则和七种能力。三条原则是:(1)心理与环境的协同性;(2)心理与行为的统一性;(3)个性的稳定性。七种能力是:(1)适应能力;(2)耐受能力;(3)控制能力;(4)知觉能力;(5)思维能力;(6)社交能力;(7)康复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是不可能用简单的教材和课堂教学来解决的,加上心理问题大多涉及到学生的隐私,只能在个别的领域里加以解决。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许多专家和学者一直呼吁高等院校重视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事实上,许多高等学校也开始了这种教育的尝试和探索。我认为,就目前而言,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更需要学校政策的支持。我读过岳晓东先生的书——《登天的感觉》,虽然是几年前读的,但我印象很深。书中主要介绍了他在哈佛大学做心理咨询的一些经历,介绍了哈佛大学是怎样重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值得我们参考。他在里面介绍,哈佛大学处理学生的违纪事件,一般首先要请负责心理咨询的老师对违纪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并且有较充分的时间反复地进行,即使是像考试作弊这样的事件也是一样,然后由心理咨询老师对犯错误的学生做出一个结论,提出对学生的处分意见,针对学生的心理情况,再根据学校的管理条例,选择怎样的处理办法对该学生今后的成长更为有利,最后由校务委员会根据心理咨询老师的意见做出裁决。这充分体现了对犯错误学生的心理关怀和人文关怀,也体现了学校管理的严肃性。在我们的高校中,有些事不是做不到,关键是缺乏这样的观念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就比如考试作弊,在大学校园里可以说是常见病。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考试方法就应该改变,使考试形式多样化,这在前面我有过论述;另一方面,我觉得对考试作弊的学生给予留校察看处分,甚至取消学位证书的做法过于严厉,在操作过程中也缺乏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应该给学生改正错误的机会。我赞

成一些高校采取对学生停学一年、保留学籍的做法,让其有机会改正错误。再说,得到学位的权利,似乎应该是每一个有政治权利的公民都可以享受的权利,只要你能达到相关的学科知识水平,特别是高等教育进入收费教育的阶段,更应该给学生以更多的选择机会。

二是性和情感问题。中国以“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羞于谈“性”的,甚至禁止在公开场合讨论“性”问题,更不要说进行“性教育”和“性的心理辅导”,即使是有一些谈“性”的书籍,往往也会被斥为“不道德”而被打入“冷宫”,一些涉及“性”描写的小说,即使十分含蓄也被列入“淫书”而遭到禁止。但是“性”的问题谁都回避不了。“性”的要求是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十分重视“人性”和“人权”,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他们把“性”看成与“生存”和“生命”一样重要的权利,是生活幸福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社会也已经出现“性开放”趋势,国外一些研究专家甚至预言,如果说20世纪是西方国家性开放的时代,那么,21世纪这将是中国的时代。不管是否正确,至少我们也应该正视这样的问题存在,并且,应当及早采取措施,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领域仍然难觅“性教育”的影子,在一些主流媒体也看不到这样的宣传,倒是网站占据了这片阵地。过去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技术的原因,无法阻止国外的一些色情内容的流入,后来进行了技术过滤,封闭了这些网站,可国内的一些网站,在有关栏目中开设了有关“性知识”的教育窗口,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一度成为另一个黄色污染源。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政府部门对互联网的发展缺乏充分的估计,忽视了互联网对社会,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没有及时占领网络教育阵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失去了网络教育的主动权,使得网络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利影响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更令人担忧的是,网络意识已经成长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这值得我们充分地关注。

前一段时间“木子美”的《性爱日记》事件产生了“轰动”效应,我们姑且不论作者的目的何在,也不去评论这些网站炒作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事件本身首先说明了我们对于“性”问题采取回避、禁止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错误的,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也说明了青少年学生对“性观念”、“性道德”的关注。恰恰在这个事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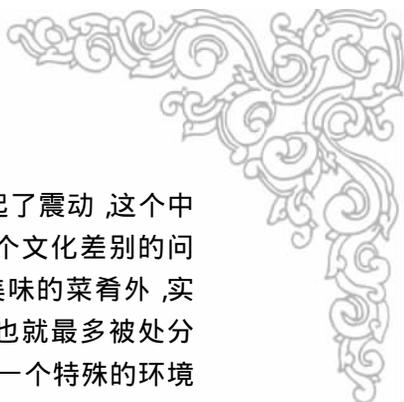
受影响、受冲击的也就是青少年学生。我支持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性爱应该要有个道德规范问题,没有道德的约束,社会的肌体会被腐蚀。说实话,就《日记》本身而言,与国外的一些“力作”相比,最多只是泛泛之作,问题是它出于一个中国的女性新闻工作者之手,而且是采用了如此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性”,正像一些网友评论的那样,“木子美已经沦落为个性器官,满脑子都是性,所有的需要都是性,所有的动机都是性,为性而活着,她的需要几乎都异化为性,她是流窜在网络中的狐狸精——网络狐妖”。更可怕的是,我们一些“社会学家”、“伦理学专家”在接受一些采访中对此持放任的态度,而且呼吁“不必做道德评价”,实在令人诧异。“木子美”并非是在追求女性解放,而是试图扫荡一切规范、伦理、道德。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压抑人性,女性受到的毒害尤其深重,追求解放,是女性的正当诉求,应当给予肯定。然而“木子美”试图颠覆一切规范、道德,似乎不是健康社会的价值标准。这样的价值存在于一小部分人当中也罢,若蔓延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势必带来社会伦理道德的混乱。即使在性观念开放的西方社会,像“木子美”那样崇尚淫乱、放荡也是不为主流价值所认可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sup>[9]</sup>指出:“木子美现象并非个体现象,它是中国社会中新兴的缺少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代表。”

最近有识之士提出了要对青年学生实行“性知识”教育,一些比较开明的学校领导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性教育”要不要进入学校课堂,成为课堂教学的内容,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但“性教育”不能没有,谁来扮演这个角色是可以讨论的。现在已经有一些高校开始了这样的尝试。但目前高等学校的心理咨询仍然处在十分不景气的阶段,仍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值得指出的是做心理咨询绝对不是一般的工作,也不是哪个教师和辅导员就能胜任的,对心理医生绝对是要有很高的专业水准和职业道德要求的。学校的讲座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形式,特别对于大学的新生来说,十分重要。“性”的道德和观念是与感情和行为相伴的,对大学生进行恋爱观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家长的配合更是必需的,对青少年学生来说,家长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性教育“老师”,而且某种意义上,能够起到十分突出和明显的效果,学校应该建立与家长的联系,共同做好大学生的性教育工作。社会环境和知识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社会主流媒体的宣传与影响更是不可忽视,重要

的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和文化环境,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有的专家指出要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也就是要提高学生的“情商”。列宁曾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为真理的追求。”同样,没有可靠的情感基础,不仅不会有成功的学习,甚至连一般的学习也是不可能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些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别人的关怀、同情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不光如此,有的学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北京清华大学的刘海洋用硫酸伤害动物园黑熊事件激起了人们的愤慨,许多人认为应该从教育上反思刘海洋伤害动物的行为。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情感的教育,也缺乏爱护动物的教育。而一个大学女生将别人的“宠物猫”放进微波炉,仅仅是“为了看微波是如何作用于动物”的事件,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无独有偶,这不禁让我想起我的一段经历。我在英国约克大学进修的时候经历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我看到在学生会的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小广告,称有个叫 Sam Ward 的学生将在 2003 年 11 月 30 日下午做一个公开的实验,他想知道,如果把自己喂养的一只小老鼠从学校有六层楼高的 Central Hall 的楼上抛下,老鼠会不会死亡。广告登出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学生反对这样做,一些有动物保护主义思想的学生发表意见强烈反对,一些学生社团也纷纷予以谴责,只有少数人认为如果真是为了某种研究目的,未尝不可,如果没有科学研究价值,就不主张这样做。最后这个学生放弃了这样的念头。有趣的是学校并没有干涉。这与刘海洋事件相类似,但是当事人却有一个决然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不同的情商教育使然。

英国的许多家庭都喜欢养宠物,特别是养狗,不仅是老年人的喜爱,其中也体现了对孩子们的情感关怀教育,使他们从小就知道照顾别人,即使是动物。我们许多独生子女家庭缺少这样的教育,相反是以孩子为中心,造成他们从来不懂得关心别人的后果。还有一件事是这样:到过约克大学的人都知道,约克的校园里有着许多鸭子、黑天鹅、鸽子等动物,这和英国的一些其他大学有共同之处,特别是鸭子已经成为校园独特的一景,校方曾经想处理掉一些以减少其数量,消息走漏了,结果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最后校方只好作罢。而一段时间以后,一个中国留学生趁晚上天黑,抓了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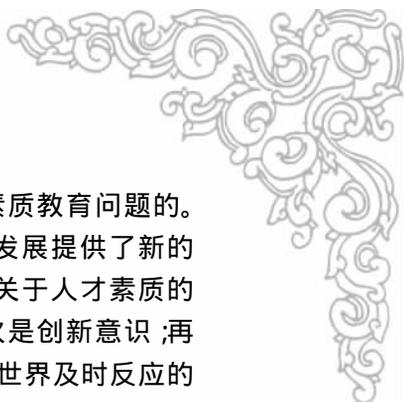
只鸭子,回到宿舍做菜吃,被发现以后,在学校引起了震动,这个中国留学生也被学校开除了。当然,这本身有着一个文化差别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眼里,普通的鸭子除了是一道美味的菜肴外,实在算不上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我国,可能学生也就最多被处分或批评教育一下,赔偿损失就完事,但确实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这个学生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习惯,也是造成这个结果的症结所在。相反,撇开文化的差异,我们也可以看出英国对学生进行情商教育的成效。

英国是最先把同情的眼光投向动物,并在法律实践中解决这个道德议题的国家。1809年,一位英国勋爵在国会提出一项提案,要求禁止虐待马、猪、牛、羊等动物。这项提案在当时遭到了人们的嘲笑,结果,虽然在上院获得通过,但在下院被否决了。到了1822年,英国人关于动物的思考已经相当成熟,所以,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正式获得通过。它使虐待动物成为一种犯罪,这个法令不仅影响到本国民众,也影响到其他国家。法国也在1850年通过了反虐待动物法律。随后,爱尔兰、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等国也通过了反虐待动物法案。这个时期的仁慈主义思想者提出了人应该善待动物,并把道德对象扩展到了动物。实际上,培养人们对动物的爱护之心,也是提高公民情商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和途径。我觉得中国也确实需要这样的法律。

三是行为习惯教育。对大学生的行为教育首先是法制观念教育。我是主张把大学生作为成人放到社会环境里探讨对他们的行为规范教育的,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政府部门一直要把大学生“圈”在校园里,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来对待,尽管我们最近也提出了要将大学的后勤服务社会化,但政府仍然主张搞“大学城”、“研究生城”、“学生公寓化管理”,其管理理念实质上仍然没有改变,外在的、“物化的”管理形式的改变,没有解决内在的管理观念问题。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高等学校,学生是不被允许长期住在校园里面的,除了一年级的新生和外国留学生,学校应他们的要求帮他们解决住宿问题以外,绝大多数学生都要住在校园外的、不属于学校的公寓里,完全由学生和经营者按相关法律来管理。所以在校园的周围有许多家庭愿意为学生提供住宿,政府也出台相应的措施加以管理。而我也不理解,一方面我们的教育经费如此青黄不接,还要用大量的资金建造学生公寓,学校自己在背管理的包

袱,而事实上许多学生和家长在高校实行收费制度以后,更加愿意自己解决学生的住宿问题,学校为何就不能依靠社会的力量,而且又能避免那么多的管理矛盾呢?当然,这一观念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大学必须改变现在的学生管理模式。而事实上,实行学分制以后,大学的班级、宿舍的概念已经淡化,学生公寓管理和后勤服务的矛盾却日益尖锐,现行的学生后勤管理模式,实际上已经成为学生和学校之间矛盾的焦点之一。

再次是行为规范的观念教育。在日本,青少年成人时要进行成人仪式,郑重地宣布他们进入成人阶段,也唤起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同样,他们也可以开始享受社会的政治权利和法律权益,也意味着他必须增强法治意识,遵守国家的法律。我国不少学校曾经也尝试过进行成人宣誓仪式的做法,但是没有见到很好的效果,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大概是我们人口众多,学校没有办法很好地组织这样的活动。一些大学采取与学生签订公约的方式唤醒学生的公民意识,也没有见到很好的实效。我想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在观念形态上首先转变,管理上没有摆脱传统的“圈起来”的、“半封闭式”的模式。到国外的大学访问,你是很难找到校门的,更不要说围墙。我国大学的围墙是不可能少的,当然这或许主要出于安全考虑,毕竟我们的社会环境还没有达到可以夜不闭户的程度。围墙和校门可以存在,但管理可以开放。我也主张学校不应成为司法的“特区”,更不能对学生的违纪、违法甚至犯罪采取游离于司法之外的手段处理。对学生的行为教育必须突出法制和法治,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应当有法律基础和法律精神来支撑,而且应该有具体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长期以来,我们每个学校都制定了学生的行为守则和行为规范,为什么这些规范和规定一直不能很好地执行,原因之一就是过于原则化,没有操作的实际意义,更不要说许多规定的内容不切实际。比如,过去曾经有过规定“大学生不许谈恋爱”,做得到吗?不可能。后来就说“不提倡谈恋爱”,也很滑稽,恋爱什么时候都不用提倡。还有“大学生不准酗酒和不准喝烈性酒”,也让人犯难,喝醉酒是不是就是“酗酒”?你能管得住吗?即使是享有“酗酒”盛名的俄罗斯,事实上也没有办法禁止人们喝酒。再有,一些高校经常发生学生“破坏公物的行为”,学校更是显得无可奈何,其实,这种现象来自于现在的“集团管理”模式的弊端,而且,很多时候就是因为管理的不规范导致的。



一些西方国家是从高科技发展的视角认识素质教育问题的。正是高科技的发展引发知识经济的出现,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远景,对人才素质的内涵提出了新的强烈要求。关于人才素质的内涵,他们侧重的首先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其次是创新意识;再次是继续发展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及时反应的能力,新知识的及时吸收能力,知识的迅速更新和创新能力等等。这一点和我强调的并不一样,我们把生活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放在首要位置,实在是针对我国大学生的现状,因为我强调的是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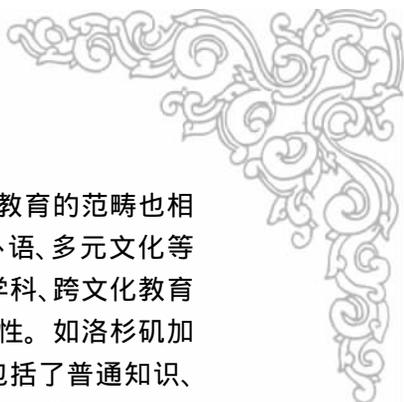
首先我们应该提及的是罗马俱乐部的观点。它是最早从高科技发展带来的全球问题的视角提出素质教育问题的。罗马俱乐部<sup>[1]</sup>于1968年成立,汇聚了国际知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哲学家,探索和研究全球发展问题。因其预测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而获得国际智囊团的美誉。早在1977年,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佩西在《人类素质》一书中率先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人的素质问题。他认为,人类通过物质变革,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力量,从被动地接受自然支配,转变为主动地支配自然。这就要求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类使用自己力量的智慧,提高全球50多亿居民的一般素质。罗马俱乐部认为,提高人的素质的核心是建立人们对全球发展的责任感,特别强调提高人类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要从青年抓起。占全球60%的青年人的责任感更为容易建立,效果更为明显。各国应该着力培养这部分人的责任感。因此,对学生的行为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树立大学生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培养这种责任感,才确立了大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的基础,所以一些国家鼓励学校想方设法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采取措施,从青少年开始培养社会责任感是许多国家教育界正在努力完成的使命。他们甚至将这个教育使命贯彻到整个教育过程中,并且使之制度化。例如每年春季,德国的中学和小学都按照惯例,开展保护环境的行动教育。每年四月间,莱茵兰—法耳茨州的蛙类动物要越过公路,从冬眠地区迁徙到繁殖地区。车辆往来,对它们是十分危险的。这时候,孩子们的任務就是拿着小盆捉青蛙,并把它们送过公路。该州的报纸教育版每到这时候还提醒学校开展这类教育活动,并且在蛙类的整个迁徙期间,都连续报道学校的这类教育行动。

## 第二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科研素质。

首先是文化知识素质。对于进入了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来说,其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化知识,他们是文化科学知识的追求者。知识对每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在现代社会,正像李嘉诚<sup>[12]</sup>先生提出的,“今天社会已容不下滥竽充数的人,现在是一个范式转移的关键时刻,知识就是人最核心的价值”。进入人人向往的校园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是每个年轻求知者的梦想。但我们却发现,实际上,学生对自己所选的专业和学科了解得很不够,尤其是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只在乎能不能考上大学和读什么学校,注重学校的知名度和毕业文凭的含金量,一般不太在意自己所学的专业和学科。更值得提醒的是,由于升学率观念在地方政府官员、教育主管部门,乃至中学校长和教师的头脑里,一直是衡量中学教育质量的主要杠杆,他们都指望学生能尽可能多地考上大学,尽可能多地考上名牌大学,所以在指导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很少考虑学生本人对专业的兴趣和对学科的了解,这种忽视了学生专业学习兴趣的做法,事实上,已经成为大学生“厌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等学校本科知识教育的基础应当是以学科和专业为主要依托的通识教育,这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但是,我国高等学校因历史原因存在着专业分类太多太细的现象。近几年来,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合并,也调整了专业目录,力图改变单科学校林立的情况,并且开始组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尽管已经初见成效,但真正能做到合并院校间的完全磨合尚待时日。而专业目录的调整,也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识教育是高校自身教育观念转变的要求,确立这样的教育理念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可喜的是,许多高校也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教改实践。在试行学分制的基础上,开始向完全学分制过渡,实行文理渗透、学科交叉、“一本一专”、双学位等制度,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学习,一些高校实行必读书制度,还大幅度增加任意选修课,彻底打破学科界限,实施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又一重要传统,几乎所有大学都有详尽的通识教育计划。在美国,通识教育一般被定义为主修和辅修专业教学之外,服务于学生的智能、情感和社会知识等方面发展的教育。传统上,通识教育主要包括人文教育、社会科学教育、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等。在当今信息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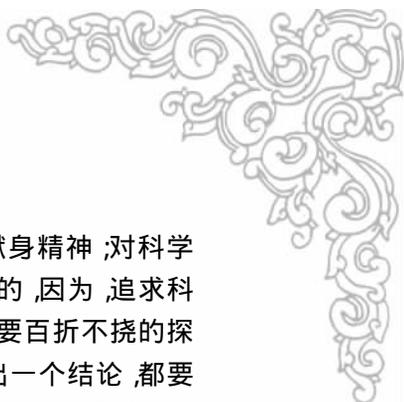
日益发达,全球化和国际化愈益加强的时代,通识教育的范畴也相应地得到了拓宽,很多大学都将信息技术应用、外语、多元文化等学科的教学包括进去,并在通识教育中融入了跨学科、跨文化教育的理念,更注重通识教育的整合性、目的性和确定性。如洛杉矶加州大学1998~1999年修订后的通识教育原则就包括了普通知识、整合学习、公民教育、文化多样性、经典原著学习、智能教育等。

通识教育的实施形式也有多种,这些不同的形式都是各大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或经过专门委员会充分研究后确定的,具有鲜明的学校特色。但概括起来讲,最普通的形式还是核心课程。多数大学根据自身的通识教育理念,组织一组或多组课程,作为核心课程,要求本科生必修或限制性选修。如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包括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思维、数量思维、科学与社会分析等领域;斯坦福大学的核心课程包括人文概论计划、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工程科学与数学领域、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世界文化、美国文化和性别研究等领域;各校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本科生教育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具体要求则相差很大。如哈佛要求本科生修满32门课程方可毕业,其中16门课程为主修专业课程,8门课程为核心课程,8门课程为任意选修课程。一般而言,学校都要求本科生在入校后的头两年内完成核心课程学习,第三年开始则进入主修专业课程的学习。通识教育的课程不是随意确定的,而是经过研究,精心挑选、组合而成的。如波士顿学院核心课程研究小组经过长达两年的多方征求意见和深入研究后,于1991年6月向学校提出了重组核心课程的建议,内容主要包括核心课程的学科分布与特征和成立学校核心课程开发委员会及其组成方式等。该研究小组提出的核心课程的特征主要是:(1)持久性问题讨论;(2)重视学科历史;(3)重视学科方法论的教学;(4)重视将写作融入课程教学;(5)包含多元文化的观点;(6)关注学生的道德观与实践。根据这些要求,研究小组精选了10大学科领域的15门课程作为核心课程,供学生选修。担任通识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必须是教授和高级讲师,教学效果经评估是优良的。之所以这样,都是为了确保通识教育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sup>[13]</sup>

从以上比较来看,我们的本科教育要真正达到发达国家的通识教育水平还有一些距离,况且目前我们的许多高校仍处于调整

时期,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专业设置缺乏科学性,一些学校为了扩大招生吸引力盲目上新专业,结果出现师资力量跟不上、学科和专业建设严重不足的状况。还有一些学校因人设事的现象十分严重,对一些不景气和“濒临死亡”的专业盲目招生,又没有及时的调整措施跟上,也导致了学生的学习障碍。这些都是目前高等学校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除了高校的专业设置和学科的调整,以及采取种种措施扩大学生的学习面,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比较全面地提高自身素质以外,我觉得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和提高外在的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是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对大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培养。一是培养他们对学科和专业的浓厚兴趣。不同的学生会对不同的专业和学科产生兴趣,兴趣是学生学习心理基础,是学生学习意志力构成的重要基石,也是学生学习的基本因素。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来源于好奇,一个人只有对某件事情产生了好奇心,才会启动思维,苦思冥想;只有对一个问题感兴趣了,才会主动去寻找解决它的办法,而且,一个人只有在做事情时感到其乐无穷,精力才会高度集中,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因此,兴趣是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动力,也是激发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孔子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古人云:“启其蒙而引其趣”,兴趣也是教学的生命力所在。学生一旦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就会产生自发吸取知识养料的要求,繁重的学习对他们来说,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享受,他们就会在知识的王国里自动地觅取珍宝,乐此不疲,甚至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即所谓的“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也。心理学家认为:学生在兴趣盎然的状态下学习,观察力敏锐,记忆力增强,想像力丰富,会兴致勃勃、心情愉快地去学习,表现出个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对学习活动本身的兴趣,对于学生学习有巨大的作用。有一个例子,如果您让一个卖门锁的人改行,去卖一套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通讯网络设备,你能想像他会成功吗?他的中文名字叫思文凯<sup>[14]</sup>,51岁,是大名鼎鼎的爱立信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比专业对口更重要。2003年他还访问过中国,他说:“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对一个人很重要。从一生来看,它比你的专业背景更重要。”这个例子说明,对学生的学



习兴趣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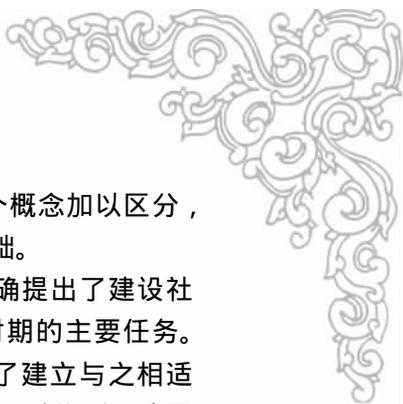
二是培养他们追求科学知识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对科学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是需要一种伟大的精神来支撑的,因为,追求科学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一方面追求科学本身需要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科学家获得一个发明,认识一种理论,得出一个结论,都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达到真理的巅峰。科学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家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居里夫人、达尔文等等。而当代伟大的科学家,著有《时间简史》的霍金<sup>[15]</sup>,也给我们树立了当代科学家的典范。霍金是在知道自己患了卢伽雷氏综合症(肌肉萎缩)陷入残废并被医生宣布不久于人世以后,才发疯似的开始探索宇宙,研究时间—空间奥秘的。在此之前,霍金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可见人类内在的精神力量是远远超乎于现实之上的。霍金的病情日趋严重,不但已经失去了行走的权利,而且丧失了说话的功能,然而,他的精神地位却是如日中天。尽管他那么无助地坐在轮椅上,他的思想却出色地遨游到广袤的时空,解开了宇宙之谜。他在他的著作《时间简史》——《大爆炸的黑洞》里,试图为人类解开时间之谜。他思想的触角依托其伟大的科学精神而离开了轮椅甚至地球,进入到外层时空的奇妙领域,对遥远的星系、黑洞、夸克等最大的和最小的物质进行了天才的探索。他认为时间—空间的奇点存在于黑洞以及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处,霍金著名的“黑洞理论”诞生了。由于奇点处的边界条件只能由宇宙外的造物主给定,命运已非“上帝之手”所能控制,因此,霍金不但超越进化了“大爆炸理论”,而且证明科学是宇宙的“第一推动”。一种“没有区界”的宇宙理论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时空线索。这场科学革命使霍金站到了宇宙物理的前沿,他天才的想像和推断使理论物理在本世纪获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超越。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宙的伟大时代。他现在大名鼎鼎的剑桥大学,担任着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崇高的教授职务,那是牛顿和狄拉克曾经担任过的卢卡逊数学教授,每天霍金驱动着轮椅,沿着美丽的剑河,沿着剑桥大学特地为他修筑的斜坡,缓缓地驶向“有史以来最崇高”的讲坛。这些科学家的典范给我们当代大学生树立了榜样,也充分说明,培养一种追求科学的精神比追求知识本身更加重要。

三是培养学生挑战知识的欲望和能力,也就是要培养他们的

创新意识和能力。我以为我们在讨论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的时候,并非仅仅是指学生所拥有的知识量的多少,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过去的教育理论忽略了这个问题,知识水平的高低和拥有的知识量的多少,绝对并非意味着知识能力的强弱,更不能说明他拥有的对知识的挑战能力和创新能力、创造力的强弱。如果我们只注重于对学生的文化知识的灌输,是很容易提高他们的知识量和知识认知水平,但对于知识的运用就不可能达到相应的层次,更谈不上对知识的创新。现代教育思想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对求知者来说,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尽管大学校园是求知者的天堂,但终究是短暂的,绝大多数的学生终究要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为社会经济建设和事业发展服务,所以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在大学期间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十分重要的,对其以后一生的学习和工作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素质教育的理念更加强调学习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知识量的增加,这是一个辨证的关系。如果说基础教育是一种知识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要教会学生社会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知识,以及从事简单劳动的技能,当然也应该包括相应的基本能力的培养,那么大学期间的文化知识素质,就应当是更高意义上的学习能力和相应知识水平的提高。我在这里突出了这种能力的基础作用,目的是要强调在大学教育理念里始终贯彻它,而不是过多地强调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量的增加。所以,我在前面的章节提到,教师的教学过程应当始终是一种教与学的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有专家指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网络时代的到来,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21世纪学习将是一种以求知者自主学习的时代。这样一种时代的来临,将要求我们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 第三,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来区分我所指出的这两个概念。许多研究者和专家们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很难将人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加以区分,其原因很明显在于两者之间是相通的、互为基础的,又是互相影响的。所以有很多专家将他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并提倡在实践中实施他们的研究理论。关注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如果考察一下目前大学状况,就不难发现,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没有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而我



在这里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当首先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这是我要在这个章节中阐述的我的观点的一个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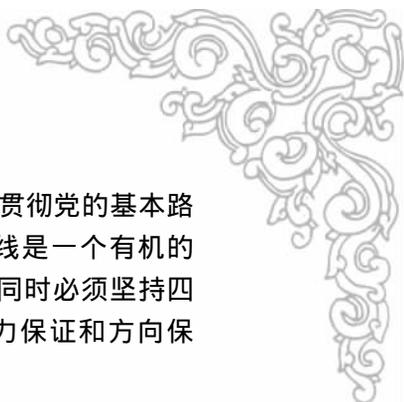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然也包括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道德体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多元经济成分基础,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政治挂帅、一元化管理的模式,也正在逐步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方面,也提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使之更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

多元经济成分的确立必然逐渐形成多元的观念形态和民主思想,政治意志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依然存在,但只有当它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的时候,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提出“三个代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主张的原因,政治意志越贴近老百姓,就越能成为百姓的共同意志,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必须将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党的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道德体系的重新构建,既是对过去几十年“左”的道德体系的“矫正”,又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体系的创新。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矫正”和创新是一个艰巨、复杂和漫长的过程,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一些过去我们一直坚持并且为之骄傲的观念要得到调整,过去我们摒弃的,甚至是嗤之以鼻的观念我们要接受,更多的观念需要我们去完善,这就是处于转型期间的观念形态特征,也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所在。

政治素质就其含义来说,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理想、组织纪律、政治知识和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方法等要素的总和”。简括之,即“指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观能力”。根据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政治素质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即政治观念、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政治素质作为大学生的一项重要素质,也决定着其参与政治的主观上的能力。政治素质决定了被西方学者称为“学生行动主义”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方向,学生运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历史上,还是在我国历史上,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事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加强学生政治素质的培养。

对大学生开展政治素质教育主要要解决其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问题,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首先,要求大学生解决“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这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阶级的主观臆断,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必须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方向。大学生走出校园后将成为经济建设的骨干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优秀者会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因此,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学生,必须在学习、工作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向,时刻牢记,我们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大学生脑子里只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而忽视或淡化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就会迷失方向,这完全与我国高等教育的目的相背离。再次,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经过千辛万苦,历经艰难曲折,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才找到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为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政治立场是每个人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所坚持的政治态度。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立场决定着一定的观点。在中国,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新时期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是指导中华民族振兴和发展的“生命线”,它对我国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将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首先要求学生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大学生必须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并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才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才能



真正站稳正确的政治立场。其次,还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核心,是主体,不能动摇,但同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保证和方向保证。否则,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是一句空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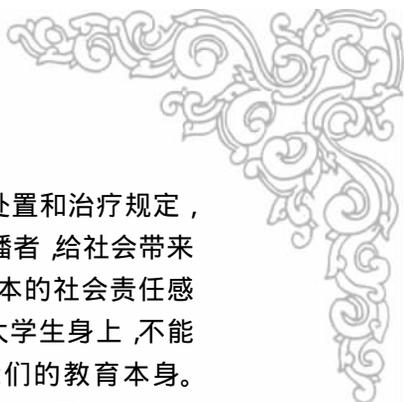
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即当社会事物刚刚萌芽时,能够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分析问题,并据此确定正确的态度和对策;政治鉴别力即是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是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要求学生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就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眼光,洞察和鉴别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见微知著,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做一名优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首先要求学生能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矛盾,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政治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其次,要增强分辨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的能力。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是建立在一定的分辨政治是非能力基础之上的。否则,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就会处于迷惘,有时会迷失政治方向,其结果会给国家和个人造成损失。只有掌握观察事物的科学方法,增强分清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的能力,提高运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共产主义信念,是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崇高理想所持有的一种确信态度和坚定决心。它是建立在人们的认识 and 情感基础上的思想意识,是决定人们政治行为的精神力量,也是培养良好思想道德素质的思想基础。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会丧失前进的目标和克服困难的坚强信心。

道德素质包括良好的品德素养、健康的思想情操、远大的理想抱负等。这是调节个人行为、处理个人与他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必需的,是学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学会做人的根本。它不仅限于培养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诸如礼貌待人、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讲卫生等养成教育,还包括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等。道德素质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共产

主义道德观念、法制观念和文明行为习惯,以形成学生完美的品格。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要着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同时还要教育学生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物,教育学生大公无私、热爱集体、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教育学生忠诚老实,谦虚谨慎。一个国家的公民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公民的道德素质与国家兴衰、民族的存亡息息相关。因此,也有人说道德素质教育是整个素质教育的灵魂。

确定素质教育的内容是前提,但由于素质构成的复杂性,在教育内容的选择和实施环节仍需要避免两种不良的倾向。一是“泛政治化”倾向依然存在。政治理论的教育是必须的,宣传马列理论、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其他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大学生政治素质提高的主要途径,包括对大学生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吸引更多的学生加入党的组织。但这些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不能替代对学生的基础道德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目前而言,对大多数学生的基础道德教育更为重要。另外,我们应当懂得,缺乏基础道德支撑的政治素质是一种“浮化”的素质,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高等学校出现一些学生党员缺乏最基本的道德素养,违反校纪校规、考试作弊,甚至违法乱纪的现象。二是素质教育缺乏“知”与“行”的统一。可以说对学生的政治和道德素质教育贯穿了青少年学生时代,道德理论的灌输,相应知识的认知,对他们来说已经比较充分了,但是缺乏实践的自觉性。而学生的道德行为,不仅是校园行为,更多的是社会行为。党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基础地位,明确指出:公民道德的建设过程,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牢牢抓住实践环节,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活动,吸引青少年普遍参与,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道德教育是“知”与“行”相统一的过程,最终要落实到“行”上。因此,针对青少年的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实践活动,让他们在道德实践中进行自我教育,在实践中进一步强化教育效果,既符合青少年的特点,又体现了道德教育的“知”、“行”统一。

2003年的“非典”事件给我们整个社会都出了一道大考题。对于高校而言,引起社会关注的不是“非典”在高校的蔓延,而是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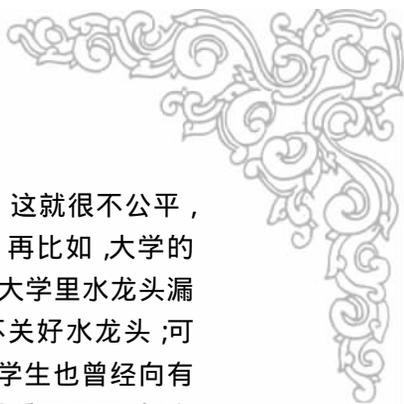


学生在“非典”出现的情况下,不顾政府和学校的处置和治疗规定,“惶惶乎作鸟兽散”,以至于一部分成为“非典”传播者,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和损失。这种有悖于社会公德、缺乏基本的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如此普遍地出现在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大学生身上,不能不令人反思。而比学生更需要反思的,恐怕是我们的教育本身。我们的大学教育到底缺失了什么,会使学生一遇到问题就失去理性和基本的道德判断力?有位高校负责人指出: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的表现进行回顾、总结和反思。青年学生也要思考,在突发事件面前,如何处变不惊,做一个自觉的、理性的人,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不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某种危害,做一个自律的、负责任的人,如何充分相信组织、依靠集体,做一个有组织纪律性的人。而学生又是如何理解的呢?一位学生为“出逃”辩护说:“(1)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长时间地隐而不报,一旦公布疫情,我们害怕,我们不信任任何人。(2)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都说大学生是社会精英,好像我们应该是先知先觉,理所当然有多大的智慧和能力,你们错了,从小到大没人告诉我们遇到危机该怎么做,我们的思路限制了我们的行动,我们不可能都无师自通。(3)我们不知道听谁的话。从小就被大人教育要听话,当时,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家长都是命令:赶快回家,坐飞机回来!我们服从了,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有很多的恐惧,只是习惯了听从……”这两种说法的差距正说明了“知”与“行”的距离。而据说,从2003年4月20日公布疫情到25日教育部要求学生不得随意返乡,短短四五天时间,北京的高校居然有近三分之一学生离校。“溃散”得如此之快,固然跟突如其来的信息混乱和不全面有关,但是,难道这与学生缺乏道德实践能力培养就没有关系吗?而我相信这些学生绝对有足够的道德认知水平。

另外一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就是道德规范的形成和社会行为规则的制定。有许多人指责我们的大学生缺乏社会公德,学校更是为学生的一些不道德行为而伤透脑筋,比如,学生在食堂就餐不守秩序,有人指责这是学生缺乏公德的表现。学生不服,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实例:许多高校的食堂,一般免费提供菜汤。供应点是有限的,而且没有专人管理。但令人奇怪的是,无人管理的菜汤供应点前排起了长队,相反,有人管理的其他窗口前却乱作一团。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倘若大学生不排队买饭纯粹是道德原因

的话,那么,一个刚才在相对稀缺的资源(菜汤)前,表现出谦谦君子风度的人,为何一转眼就变成“道德低下”、连“先来后到”的道理都不懂的不文明人?奥秘在这里:盛免费的菜汤要有勺子,而勺子只有一把,一个人打完菜汤后传给下一个人。而传给谁,就是文章所在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秩序,也都吃过在食堂不排队的苦头,所以在传递勺子时,自然就把它传给身后排队的人,而不是旁边的夹塞儿者。夹塞儿者等半天也没有人把勺子给他,自然就去排队了。用不着有人大声呵斥,用不着什么道德教育——利益是最根本的动力。我们再看看食堂大师傅们是如何卖饭菜的呢?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先来后到,谁的胳膊伸得长,就先给谁。现在问题清楚了:原因不在于道德水平高低,仅有合理的规则也是不够的,关键是执行规则的人。买饭要讲究“先来后到”谁都知道,谁也都承认它合理,但要想把它从制度转变为现实,执行规则的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们制定规则时,不能把规则的执行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将规则的不被执行归结为参与者的错误,而规则的执行者却不受指责。真正完善的规则或制度即使有破坏者,规则或制度本身也能够自行协调,使其重新走上正常轨道。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安全警戒标志有“绿、兰、黄、橙、红”五种,每一种标志都有相应的规则,美国的安全官员称之为“菜单式的措施”(there's going to be a menu of visible and invisible measures),所以,只要宣布安全警戒处标志是什么颜色,人们就知道怎样来起用相应的措施,这就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规则的执行者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足球比赛的规则需要高水平的裁判去执行,裁判执行规则的好坏决定着比赛秩序的好坏。还有排队是有艺术的。在英国,我注意到这里的人们是怎样排队的:不管前面有几个窗口,大多情况下排的队伍只有一支,哪个窗口有空,排队的人按秩序去哪个窗口办事,这是绝对公平的。我做过一个实验,有一次在火车站的问讯处,我故意装作十分急,想夹塞,可是柜台的先生十分有礼貌地对我说:“queue up please sir(先生,请排队)。”有一次公交车故障,人们排了很长的队,绝对没有夹塞的,而且,绝对依次上车;我们的方式是一个窗口一支队伍,队伍移动的快慢取决于窗口的办事效率(这是很不确定的),就会出现先来的不如后到的现象。更糟糕的是,等你到了窗口了,卖票的将窗口一关,下班了,你就只



好重新排队。我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就很不公平,这是规则出现的问题。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传统。再比如,大学的“长明灯”和“长流水”现象严重。一些学生认为:大学里水龙头漏水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半是确有大学生不自觉,不关好水龙头;可也有一半是水龙头自身的问题。一些有责任心的学生也曾经向有关的管理部门反映水龙头漏水的现象,但他们总是爱理不理,加上劣等的管理,热心的人也就没了脾气。久而久之,再见到水龙头漏水,许多学生也就麻木不仁了,没有心情去管到底是没关严,还是龙头漏水了。还有指责学生不珍惜粮食,如果我们的责难者也能够去体会一下食堂饭菜质量的话,相信对学生的行为会理解一些。所以,我觉得良好的道德行为,必须要在一个相应的环境中培养。何况道德行为范畴的一些规则是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的,你不能只要求社会中一部分人做到,严格公正的管理机制才是良好的保障,因此,道德教育不能脱离这样一种机制的保障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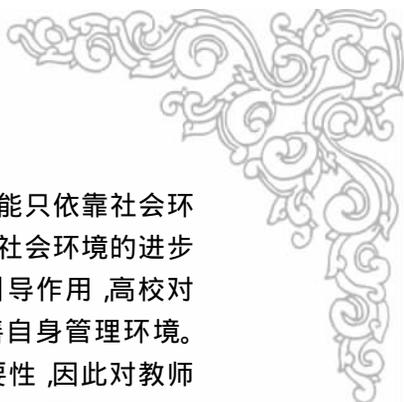
### 素质教育的机制

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是对原有应试教育理念的一个拨乱反正,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应试教育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损害着我们的教育机制,有害于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在高校,素质教育的理念应该更加明显地融入高校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中。建立高等教育的素质教育机制,应当对现行高等教育机制进行改造,使其更好地表现出素质教育的含义。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谈到,应当将我们现有的政工队伍合并到行政管理的队伍中去,很明显,我是主张在管理理念上灌输素质教育的血液,使之能渗透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而不是由有限的人去做局部的事。就像人的健康是一个整体,不能只依赖于身体几个部分的健康一样。现行的素质教育并不尽如人意,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只重视了一部分人——政工队伍的功能,尽管我们一再宣传提出“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口号,作为对学校的每一个教职员工的请求,但在现实机制运转的过程中,并没有能很好地落实这样的管理理念。教学过程中“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仍然是大学教学的主旋律,一些零星教学方法的改变最多是一些伴奏和杂音,而行政管理低效率和一些不正确的管理方法经常产生与素质教育理念相左的

效应,这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素质教育变得更加尴尬。而仅仅靠政工干部的努力,在有限的教育领域中,想很有成效地扭转大学素质教育的局面是难上加难。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着力于对大学办学理念的革新,在必要的组织形式上给予合理的优化,使之更好地支撑大学素质教育的开展。

首先,应当是对教职员素质教育观念的灌输。不仅要将它融入到教师思想教育的体系中,而且在制定对教师的评价、评定、奖优罚劣等一系列政策中体现素质教育理念,政策从来是刚性的,理念是软性的,而软性的理念恰恰需要刚性政策的支撑,没有了这一条,软性的理念也就荡然无存。正像我在前面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对教师的政策指挥棒仍然是应试教育的模板,不可能孕育出素质教育的教学模式来的,不改变这样的现状,是无法再来理论对教师提出素质教育要求的。而且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力量,课堂教学是教育的主要阵地,也是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要管道,如果素质教育不能首先占领这块阵地,无疑已经失去了它主要的生存机会。管理的理念、方法、政策和规则是影响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没有一个由素质教育孵化出来的管理理念和相应的政策、措施、方法,就不会有良好的素质教育环境,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性自然不需要再用大量的笔墨进行论述了。就比如前面提到的那种排队吃饭、水龙头的问题,自然是要用智慧去改善我们的管理模式和规则的。

正像过去有位高校的领导说的那样:教师和学生是龙头和龙尾的问题。教师的模范作用和对学生的教育是影响学生成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学校对学生的教育首先应该是体现在做好教师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上。但很遗憾的是,对高校教师的教育和管理,基本上是高校管理的弱项,或者是只管理不教育,除非出现莫大的事件到了非治理不可。其实,对教师的教育关键是要建设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政策环境。民主管理是未来管理的主流,尤其在高等院校,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的大学教师无不希望能有一个宽松的教学和科研环境,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如一的良好愿望。当然,毋庸讳言,由于许多教师政策的决定权并非在高校领导层,比如职称政策、学术政策,还有关系到教师切身利益的许多政策性规定,都是由政府或其教育主管部门决定的,要改善这样的环境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应当给学校更多的自



主权,放手让高等学校自我管理。同时,我们也不能只依靠社会环境的进步来改善我们高等院校的环境,恰恰相反,社会环境的进步需要高等学校推动。大学文化的对社会文化的引导作用,高校对社会的影响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但首先是要改善自身管理环境。教师在大学教育中的“龙头”地位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因此对教师的教育和管理应该是学校领导层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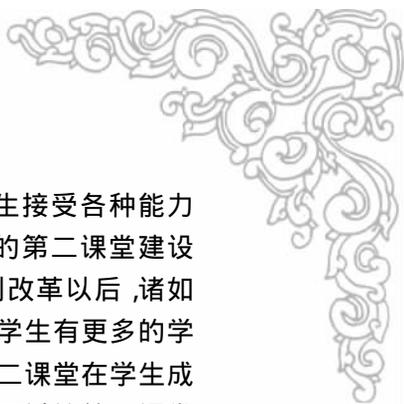
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素质教育的理念是学校对教师的基本要求。除了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外,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进行合理的矫正是必需的,应当彻底改变“满堂灌”的应试教育模式。同时,应当将一些本来就是属于教师的权利交还给教师,如教师对课堂教学的控制,对学生合理地布置必要的作业和自修要求、考试的命题和批卷的总体标准,对学生的学科结业情况的评价、对学生论文的评价和指导过程等等。对教师的聘用是由学校根据不同学科的师资队伍情况决定的,但教师取得了资格就应当拥有相应的权利,学校对教师的教学监控应当是政策性的、民主的和公开的,这需要高等学校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措施有效地实施教学监控。教师的教学应当建立在与学生的双向交流上,运用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在研究教学艺术的同时,更应当研究如何引导学生有兴趣地学。比如,怎样让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怎样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氛围中学习?怎样在各个教学环节中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的学习状况如何?最希望学校和教师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等等,要把“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统一起来,建立包含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在内的适应公民素质发展需要的课程体系;把课内外、校内外沟通起来,把学校、家庭、社会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深入学生,多做些调查研究,必然会引发出许多深化教学改革的鲜活课题,开辟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改革考试制度是教学环节中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有人认为搞素质教育,就是不要考试,这是一种误解。实施素质教育不是要废除考试制度,而是要改革和完善考试制度,要实现考试制度的科学化。目前的考试太多太滥,考试内容和方法偏离了提高学生素质的轨道,主要问题是:题量太大,试卷过长,试题深、难、偏、怪;考试方法死板、机械,引进所谓标准化的试题后,逼着学生读死书、死读书,不允许学生有理解、思考、想像的余地,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活力,有些题目故意炮制几种似是而非的答案,诱使学生上当,如此

等等,把教与学的过程引入了不断僵化的道路。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大考试科学化、合理化的研究和试验力度。试题不应引导学生死记硬背,而要考察学生的观察、理解能力,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一直主张考试的灵活性,大学的考试更加应该如此,有个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告诉我:他们上学时,有一次期末考试,老师出的考试题目很简单,就三个字“论商品”,但你知道要做好这道题是很难的。有人担心这样做,加强考试管理会是一个难点。我认为不然,素质教育的理念就是需要强调教学的多样性,管理的方法和政策也应当相应调整。而现在采取的“题库”、“考与教分开”的办法是为了加强对老师的管理,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用这种办法引导教学只会导致教条化,显然,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其次,对学校的管理部门来说,素质教育的理念应当贯穿于每一个管理环节之中,不仅是要在制定管理政策、实施管理办法的时候充分顾及到学生的利益,还要考虑怎样才能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素质的提高。学校的管理是由政策支撑的一个育人的框架,素质教育的机制只能在这个框架里运行,框架的形状和走向决定了教育的成败。我们不难想像,现在的素质教育为何很难顺利地展开,最大的原因就是管理政策和相应的素质教育要求不配套,也就是说素质教育要想在应试教育的管理框架里成长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对学校管理部门的素质教育观念的教育。事实上,许多典型的“学生闹事”事件,其产生的根源就是管理的失误,如:因学生食堂管理不善,造成学生食物中毒而引起的抗议,因宿舍熄灯时间不合理而引起的骚乱,因校内交通管理不善酿成学生伤亡而引发的罢课等等,更加严重的是一些问题处理不及时而导致学生上街游行的事件,也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这些学生的行为无非是要求一个合理和公正的管理方式,维护学生合理的利益。自然我们也应当要求政府能够正视素质教育存在的具体问题,及时解决,比如校园周边的环境,涉及到教师和学生切身利益的政策,毕业就业制度,用人制度等等,给学校的素质教育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再次,建设良好的学生素质教育的体系。学生第二课堂是高等学校开展素质教育主要阵地,第二课堂是相对于学生第一课堂教学而言的课外教育活动的统称。如果说学生第一课堂是接受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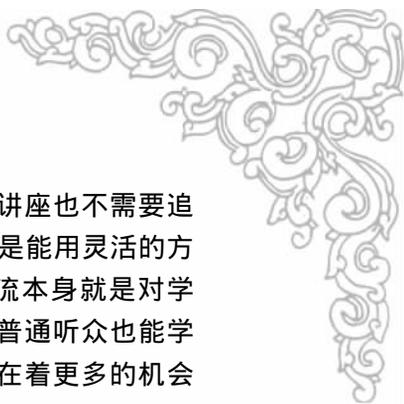


学知识教学主要途径的话,那么第二课堂则是学生接受各种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说,学生的第二课堂建设或许更加重要。特别是在高等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后,诸如学分制改革,以及实施了学科和专业的教学调整,学生有更多的学习自主权,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身素质的提高,第二课堂在学生成才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第二课堂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高校的第二课堂以其鲜明的主题、丰富多彩的形式、丰硕的成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毕业生对大学生涯的留恋,更多的是在第二课堂活动中爆发的智慧闪光、难忘的经历、激烈的竞争和成败的喜悦、辛酸,许多成功的毕业生,更多的是得益于第二课堂给他们的丰富阅历和能力的锻炼。应该说高等学校对第二课堂的建设有着成功经验和丰硕的成果。仔细研究现在的状况,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社会背景的改变、教育对象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第二课堂建设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过去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在现实中不再适用,过去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活动变得应者寥寥,第二课堂的建设需要更贴近现代学生的特征和时代的特征。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第二课堂建设有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政治教育空泛,形式主义严重。在过去“左”的思潮影响下,“政治挂帅”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经过“学潮”“风波”以后,越来越多的政治家相信加强大学生政治教育更加重要,然而,实践的结果并没有能证实他们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原因很简单,每一个大学生都经受过十几年的“政治教育”的洗礼,已经表现出有些“迟钝”了,他们更需要的是“政治教育”的结果能否解决现实思想问题,而且,相信他们也对“政治”的一些基本原理都有着比较深刻的认知,更多空泛的政治教育不再能打动他们的心,所以,在大学举办政治学习讲座时,学生捧一本小说、英语书,或杂志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一些政治性的活动除了长官意志的要求外,就不会有太多的学生自觉参与。另一方面,政治教育中也出现了许多“浮夸”的现象。在全国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时候,许多高校纷纷建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甚至有的高校宣传:班班都有“邓小平理论研究小组”,你能相信这都是学生的自觉行为吗?邓小平理论我们仍要学,这样的活动我们仍要搞,但不是流于形式,现在你还能在

大学的校园里找到那么多“研究会”、“研究小组”的影子吗？我认为重要的理论要学，重要的政策要懂，这是对大学生的基本政治要求，但要教得精、学得透，要贴近现实，决不能忘记我们的教育对象是有着深刻理解力的青年精英，不要忘记他们是已经具有基本政治素质的青年知识分子。那些“运动式”的教育形式，脱离现实的空泛教育内容不再是这个时代的需求。

二是课外活动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课外活动的知识性是大学第二课堂教育的重要特征，但在素质教育条件下对大学第二课堂的教育更多应表现出能力培养的特点。学术讲座是大学第二课堂的主要内容，也是大学学术气氛的主要表现，其内容十分广泛，各种专业、各种学科知识，包括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名人名家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讲座，有很强的知识性，也有着专业特征，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形式。但这些形式近乎于第一课堂的知识灌输，没有更多的创新。除了社会上一些“星级”人物、重量级人物以外，大多数讲座“热衷者”寥寥，而另一方面，组织者希望营造讲座活动的“气氛”和“轰动效应”，用行政手段来支撑“人气”，结果还是“一头热”的情况十分普遍。无怪乎组织者大叹“搞活动难”。我在英国约克大学专门就考察了这个问题，我发现他们每学期各个院系都安排了很多学术讲座，几乎各个学院（系）每周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安排学术讲座，绝大多数是公开的（public lecture and seminar），经常由本院的教师或邀请外来的专家和学者做主讲，大多数讲座是小型的，除非讲座的题目特别吸引人而不得不临时搬到大教室，通常很多讲座主讲者只讲45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是听众提问并与之研讨，提问和研讨的时间甚至会超过主讲的时间，这种相互间的交流常常是不同观念、不同思想碰撞，十分吸引人，而且，都能体现出主讲者和提问者的水平。在约克大学，我有幸聆听了英国的内务大臣（Home Secretary）David Blunkett作的《关于英国的移民政策和收容制度改革》的讲座，一千多人的礼堂几乎座无虚席，一小时的讲座结束后，提问的教师和学生在组织者提供的两个麦克风前早已排起了长队，一些提问者提出了十分尖锐的问题，甚至有的当场反驳大臣的观点，对英国的某些移民政策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讲座进行得十分热烈和有序，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更是观念和主张的激烈交锋。而大多数学术讲座的讨论都是听者和演讲者吸收不同理论、观念、信息的良好时机。



所以,其实讲座不需要追求成百上千的听众,其实讲座也不需要追求“轰动效应”,更不需要去强迫学生参加,重要的是能用灵活的方式吸引富有兴趣的听众。还有,讲座的提问和交流本身就是对学生演讲和表达能力、心理素质的一种锻炼,即使是普通听众也能学会用头脑来思考和辨析,更何况在其他活动中,存在着更多的机会锻炼学生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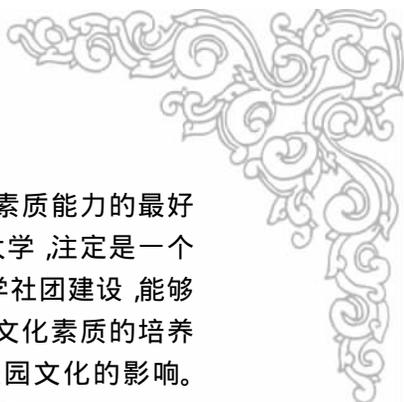
三是在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中,管理者的主观倾向严重,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大学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生长发展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学校师生在长期教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以“科学、自由、民主”为基本价值取向,是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文化,也是凝聚师生的崇高的思想观念,更是维系学校组织的一种精神力量。随着我国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大学校园文化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何加强新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已经引起众多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大学校园文化是高等教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学校师生,因此,校园文化建设是学生学习各种社会知识、科学技能,陶冶情操、提高自身素养的重要阵地。

校园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对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为他们学习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一个学校的优秀校园文化是一种历史的沉积,它需要精心的培育、长期的积累,要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发展。研究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理论知识宽厚、应用开发能力强、作风严实和协作精神良好的人才,能为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服务。

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目前而言,校园文化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必须再上一个台阶。随着大学生知识量的增加,他们对校园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校园文化要改变内容一成不变、形式呆板的状况,适应时代的变化,体现其社会的超前性特征。校园文化的结构也要走向多层次性,不能仅仅停留于娱乐层面、活动层面,也不能流于形式。应该使校园文化既有思想理论层面的,又有娱乐层面的;有集体组织的层面,也有学生自发的层面;既有规模宏大、富有感染力的,也有小范围、便于相互沟通

的,既有政治时事的,也有文化娱乐的,等等。只有使校园文化自身优化,才能对大学生产生吸引力,促进校园文化综合质量的提高,才能真正使学生得到锻炼和陶冶。而且,在校园文化活动中,不能只是突出管理者自身的主导位置,要让学生唱主角,应当让学生有更多的表现和实践机会,只有在活动的每个环节中能使学生得到充分的锻炼,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各方面素质。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片面追求活动的规模、效果,不考虑课外活动的实际效果。比如,全国的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原来是一种很好的检查学生课外活动成果的活动形式,但现在有些变味了,本来应该是学生自己的课外科技作品的展览和评比,却变成了学校间科技实力的竞争。因为一些高校不愿意看到自己在这样一个有着全国性影响的活动中没有自己的位置,就片面地追求活动的影响,也不管展示的项目究竟是学生的,还是导师的。甚至弄虚作假,部分获奖的科技成果一旦被转让,却又爆出一个学生和导师的专利权之争。不知道主办者对此有何想法。

四是学生社团发育不良。学生社团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组成的,主要是开展一些对提高学生自身素质有益的活动。社团活动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高校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学分制和后勤社会化等制度的实施,社团就成为学生文化活动不可缺少的抓手和联系学生的重要纽带。可是社团活动也困难重重,一方面由于缺乏有力的指导和帮助,目前的学生社团活动显得比较单调,活动的层次也不高;另一方面,社团活动的开展也确实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阻力,主要来自我们的学校管理层,始终不能在观念上扭转对学生社团活动的看法,总以为这样的活动不符合主流教育的需要。我们看到,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学,学生社团的繁荣和校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学校不仅将社团建设纳入学校工作的总体计划,而且提供专门的场地和经费来支持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几年前,我有机会访问了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台湾的一些高校,专门去参观了他们的学生科技中心,或社团活动中心,发现这些学校对学生的课外科研和文化活动特别重视,一个大学里有上百个学生社团是十分正常的事。学校有专职教师负责指导学生的社团活动,在台湾东吴大学,我看到一栋正在建设的大楼,同行告诉我,那是学校专门为学生社团中心建造的又一幢科技活动大楼,是学生课外活动的主要场地。我们应该看到,社团



活动的开展最能体现学生的素质,也是锻炼学生素质能力的最好机会。有专家指出:“一个没有良好社团文化的大学,注定是一个没有个性和品位的大学。”所以,我们应当加强大学社团建设,能够有效地拓展校园文化的传递渠道,增强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力度。同时,也使大学生能够以多种形式接受校园文化的影响。社会实践是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精神、磨炼意志、实现人生价值的另一个载体。要把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同学生的素质教育、综合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不断研究和规范社会实践的内容、方法和具体措施,完善管理制度,使这项常规工作不断富于新的内容,引导青年学生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坚定远大的理想,在实践中树立服务祖国人民的思想。

### 注 释

[1] 参见余丽嫦著:《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中被尊称为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第一个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人。

[2] 劳厄(Max von Laue, 1879—1960)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19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表彰他发现了晶体的X射线衍射。爱因斯坦(1879—1955)20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物理学革命的旗手。1916年写了一本通俗介绍相对论的书《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创立相对论的学说。此书到1922年已经再版了40次,还被译成了十几种文字,广为流传。

[3] “2061计划”(Project2061):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它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当年恰逢哈雷彗星临近地球,改革计划又是为了使美国当今的儿童——下世纪的主人,能适应2061年彗星再次临近地球的那个时期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以取名“2061计划”(Project2061)。

[4] 参见《关于科学素质教育的思考》,《教书育人》2001年第五期。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2004年2月版。

[7] 参照《素质教育概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 参见《中国教育科研和计算机网》和《教育先锋网》相关报道。

[9] 李心天: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著名医学心理学专家、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心理学教育分会第一任会长。

[10] 岳晓东 我国著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岳晓东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获心理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以及专业师资的培养工作,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造诣。2001年岳晓东教授荣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颁发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热心推动奖”。主要著作:《登天的感觉》(心理学科普读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7次)。《少年我心》(心理学科普读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3次)。《批评的艺术》(心理学科普读物),江苏教育出版社。《哈佛热线》(心理学科普读物),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3次)。《哈佛读书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谈话内容参考2003年11月17日报道。

参见2003年12月《新华网》、《千龙网》等相关报道内容。

[11] 《罗马俱乐部决断力》,高健等编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罗马俱乐部,英文名称为The Club of Rome,因总部位于(ROME)而得名。它自1968年成立以来,一直紧紧关注着世界体系的变化发展。它所发表的报告,时时震撼着整个西方世界,因此罗马俱乐部有着人类全球问题研究“超一流思想库”的美誉。

[12] 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是香港风云人物。

[13] 参考别敦荣:《美国大学教育观察》,原载于《中国大学教育》。

[14] 思文凯:1952年出生于瑞典,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毕业,现任爱立信公司总裁兼CEO,曾4次到访中国。

[15] 霍金: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家和宇宙论家。70年代他和彭罗斯一起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他们共同获得了1988年的沃尔夫物理奖。1980年以后,他的兴趣转向量子宇宙论。他在1982年开始写《时间简史》。从1988年4月首版以来,此书已被翻译成30种文字,并出售了大约550万册。



## 第七章

### 毕业与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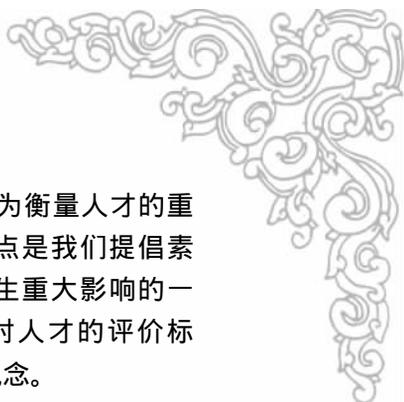
我国的教育方针是“要培养有文化、有知识、有道德、守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学校培养的所有人才都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学校,遵循教育规律,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是高校的首要目标。按照这个逻辑,从理论上来说,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应当紧扣培养人才的主题,我们经常说的一句口号“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正是应这样的办学宗旨而提出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学生的毕业就意味着走上工作岗位,政府对高校毕业生提供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岗位,学校从来不需要为学生的就业操劳,也从来不需要在教学和培养环节中考虑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相关技能的问题,在人才供不应求的“精英教育”时代,高校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和“拥有”。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种局面得到了彻底的改变。随着高等教育一步一步地走向“大众化”,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随着高等学校的大规模扩招,毕业生成倍增加,已经导致了大学毕业生失业、待业现象。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增加毕业生的创业机会,已经成为大学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大学教育进入“收费时代”以后,社会和家庭对大学教育的投资成为热点,这种投资成本的支出伴随着对高等教育未来回报的预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越来越希望高等教育能在给予高级专门知识的同时,能提高学生就业和创业的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

#### 大学生的毕业评价

不同程度的大学生经过两至五年不等的高等教育,能够完成

专科或本科的学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要走上工作岗位。面对社会的选择,他们真的完全准备好了吗?根据我们的教育制度,学生完成一定量的学业,取得了所学专业必要的学分,就能取得国家统一颁发的毕业文凭和学位文凭,文凭的基本含义,就是对学生的所学专业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的基本衡量标准。但仔细地研究我们的文凭实际所包含的内容,特别是学校提供的学生毕业评价,基本只是学生所学课程的考试成绩单,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资讯信息。且不说这种考试的成绩仅仅是学生课堂学习的知识考核,也不再研究现在的大学考试的方法和内容,在这里需要考察的是,文凭的含义是否应当包含对学生素质的考核和评价。当然,对课堂教学的知识评价是素质要求的一部分,也是十分重要的部分,但是否是学生毕业文凭的全部含义,值得商榷。我们现在对学生毕业的评价是不完备的,学习成绩评价仅仅是对每一个学生所学课程的知识水平评价,这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学生无须担心文凭的失真,用人单位也不在乎这个评价的不完备,而现在,面对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如何使毕业评价能体现学生的真实水平,这对于用人单位和毕业生都显得十分重要,也是高等学校应当重视的教育环节。

我们在现阶段提出建立现代人才观念应该符合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能在一个社会大系统中实现人才优化配置,并使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最大潜能。一些专家认为,它的基本特征应该是:(1)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人才观念,即吸引和重用人才,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不断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2)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即人才是以知识科技型为主体的;(3)对待人才要有利于其才能最大可能地发挥,以带动社会或群体的整体发展。同时人才的形成、发展和作用的发挥与社会、领导和自身的努力有着密切关系。所以,现代人才观念应该包括社会人才观念、领导人才观念和人才自我发展观念。从这个基本的观念出发,我们现在提出人才观念的确立必须强调知识和能力的并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力素质更加重于知识水平,这也是“能力主义”理论正逐渐从理论走向现实的表现。这个由哈佛大学马克雷朗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理论,认为能力是“与创造高效业绩挂钩的职务行动特性”,提倡基于能力评价业绩。首先重视技能,加大人才的培养力度,无疑将促进人才的充分使用。其次,也更加强调了人才观念



的人文色彩。人文理念和思想品德的要求也会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指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能力主义”的观点是我们提倡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也是人才观念对教育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表现。所以,谈教育的创新,必然要改变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要按照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来调整教育的观念。

从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上来说,素质教育的理念已经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得到确认,并应当完全地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含义就是反对将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质量的惟一标准,应该有更多的能反映学生素质水平的衡量标准结合到学生的毕业文凭的含量中去,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制定出符合素质教育理念的综合评价体系,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指导原则;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从来主张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能够得到公正而全面的评价,从毕业生的角度,希望学校提供的毕业评价能够全面展示他们的基本面貌;从用人单位的选才角度,也需要大学的毕业文凭对学生的评价能比较全面和符合实际,尤其在突出能力素质的重要性的今天,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更需要考查学生学业成绩以外的能力素质状况。“高分低能”现象的出现,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对大学提供的学生毕业评价产生了怀疑。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我认为一是要建立比较完备的毕业评价体系,主要是要注入能力素质的评价因素。建立对大学毕业生的科学评价体系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犹如产品质量的检测对消费者的重要性一样,不仅是要对每个学生进行科学的评估,有个较为透明真实的而且比较详实的阶段性评价,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的过程中,而且使每个学生能及时了解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在大学期间能有针对性地“补课”,也能够给予用人单位一个比较明了的选择依据。我们现在能给社会用人单位的,只有大学的各科成绩和泛泛的评语,上百字的篇幅,再高明的班主任也没有办法来准确地概括学生的基本情况,所以出现了不同学生有完全相同的评语的现象。而学生的自我推荐信倒是做足了文章,厚厚的自荐材料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有的学生不惜工本,推出了“就业VCD”,倒也成为一绝。

二是要加强对学生素质教育的考核。我在许多章节中都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高校应当加强对学生的素质考核,尤其是需要摒弃应试教育的模式,考核要符合素质教育理念。即使是设计

大学考试改革的时候,作为课堂教学的考试,也要着眼于考核的全过程,着重于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考试的评价应当有利于这样一个目的,通过灵活的考试方式来引导学生对学科知识的兴趣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在课堂以外的有关素质教育的内容,诸如德育水准、动手能力、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等等如何来考核,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既要反对搞烦琐哲学,又要行之有效。为此,许多专家已经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和主张,值得我们高等学校和人事部门积极研究。我以为,大学校园的舞台并不很大,学生的表现应当有一个总体的框架,综合能力和个人表现的评价不能仅仅用毕业评语那上百个字来解决问题。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的各种活动,获得的各种证书,以及得到的各种奖励都应该是现成的考核内容,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它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设计成一个有效的评价体系,这样的考核应当是我们素质教育理念所要追求的目标。

三是要突出学生专业素质能力的考核内容。学科成绩的记载是一个学生学习的真实写照,但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在考试分数上是得不到反映的。学习的考核只通过试卷来评定,显然也是不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的。如果您认真考察一些被称为是“学习尖子”的“优秀学生”的话,或许你会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仅仅只是“成绩”的尖子,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生。我在大学的工作经历告诉我,在目前的大学教育体制下,许多被评为“优秀学生”的学习尖子生,除了成绩的优异外,其能力和素质大多不能与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生”相称,有的甚至比一般的学生都不如,但按目前的政策,他(她)可以保送研究生,可以获奖学金,甚至有更多的机会。但是,一旦走出校园,毕业后,有的居然会找不到工作。而用人单位的理由很简单,毕业生缺乏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即使一些单位考虑到其高学历而予以照顾录取,实际上,也只能让其做一些与其学历极不相称的一般性工作,也就导致了人才“浪费”现象。所谓“高分低能”就是这样诞生的。也许,这就是有关专家研究得出的“前十名现象”<sup>[1]</sup>,即:真正能够成才的可能是那些学习成绩不在班级前十名的、但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的学生。尽管这个结论不太绝对,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现行的学校评价有失真之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学业考核中,没有渗透知识素质和相应能力的评价内容。这或许也是我们看到的“优



生不能优配”的“不合理”现象的产生根源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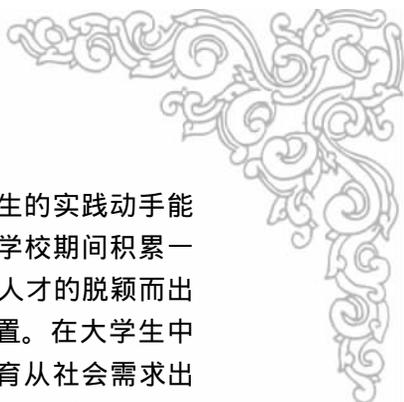
## 人才市场

在我们国家有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往往在没有很成熟的理论指导和可行的方案时就被匆匆推向社会,有人将它比喻为一场足球赛:队员先开始比赛,然后由组织者来制定规则,规则出台了,再来寻找裁判,等到裁判入场执法时双方队员已经伤痕累累,比赛也已经形成许多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如果遇到一个素质不高的裁判的话,比赛会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假如遇上“黑哨”,那么,比赛的结果就不堪设想。也许这就是改革的复杂性,我们不能期望有人能设计出一套万全的方案,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难题,改革需要探索。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改革的艰难而忽略对改革方案的科学性研究,导致决策的随意性。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改革实践的原因所在。人才市场的建设也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是相关各方关注的焦点。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人才市场至今仍然不能形成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从理论上来说,自从政府改变了对大学生计划分配的政策以后,实行“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的措施,就需要一个中介——“市场”,这自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市场的举办者希望能以这样的形式,促进人才合理流动、优化配置,而且做到人才录用的公正、公平、公开,用市场规则和竞争原则配置人才,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然而,人才决不像商品那么容易识别,用人单位也不是“顾客”,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决定其“购买”行为。于是目前这种缺乏“成交率”的市场慢慢地也就失去了它的魅力,每年像北方的乡亲新年赶大集一般的轰轰烈烈的人才市场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的质疑。

何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原因在于这样的模式和运行规则并不符合人才双向选择的规律。理性的人们都了解,毕业生对工作机会的选择是十分用心的,需要充足的时间来加以比较和甄别,总是希望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任何轻率的决定都有可能导致违约而受到处罚。而用人单位录用人才,一般也要经过反复的比较和一定的组织程序决定,也很少不经程序在市场上当场签约。公

务员录用制度的推出,带动了一种全新的招聘录用制度的形成。许多用人单位为了在人才录用过程中能更好做到“公平公正”,都效仿这样的方法来招聘人才。而学生对人才录用信息的经常性需要,也促使人才市场向经常性方向发展。社会上一些不正常因素对市场的干扰,也使得人才市场出现了变质,一些不合程序的地下交易,通过市场变得完全合法;一些不合理的签约行为在市场上会变得十分合情合理,还有信息的不对称,更让一些投机者得到了实质性的利益。主办单位对举办大型人才市场的推动,自然有着自身的实际利益。如此这般,使得本来就缺乏公正和效率的市场规则的人才市场出现了变形。

旨在用“市场手段”为人才合理流动和配置服务的人才市场是有必要的,而且符合改革的必然趋势。对大多数毕业生来说,人才市场的信息功能、中介功能也是许多毕业生就业所依赖的。但目前的人才市场确实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特别是要改善有关供需双方的市场运行规则。在人才市场的供求活动中,对于供需双方的规则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对毕业生来说,市场应当建立严格的机制,要求应聘者提供真实的材料,能够反映其基本的状况、知识水平、能力素质等等情况,以及相应的证书和资讯证明。上海的一些专家呼吁实行《大学生职业资格准入制》<sup>[2]</sup>,他们认为,我国从1993年起开始推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制度。但在实际运用中,只偏重于学历,忽视职业资格,现在的趋势是应当将学历与职业资格并重,因此,呼吁建立人力资源和人才市场的准入机制。这几年,我国的职业资格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已经有了多项职业资格。做律师要有律师资格证,为人师要有教师资格,当医生必须有医师资格,跑保险要有保险经纪人资格,文秘人员也要有秘书资格,甚至做推销员、当公关小姐都要求有推销员资格、公关员资格。许多大学生认为,在学历教育+职业资格教育的发展趋势下,越来越多的行业要求从业者必须具备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将成为就业市场上的准入证。现在的大学生只有毕业证书,而没有从事相关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是不适应现在一些行业的用人需求的,尤其是对一些高职学校和行业色彩十分明显的专业学生来说,尤其如此。即使是一些研究性大学的专家也认为,实行大学生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制度,将能使大学生在学校及时学习和掌握与所学专业相关的技术,提前了解和掌握该专业在当



前生产中的技术要求。这种结合不但能培养大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能在学校期间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缩短就业后的适应期,也为复合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才市场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在大学生中推行学历和国家职业资格“双证”制度,对高等教育从社会需求出发,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适应市场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对在高校中推行职业资格鉴定考试,教育、行业、劳动等部门都是欢迎的,同时也指出,由于这项考试是社会性的、高标准的,而目前学校的教学还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原因之一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是封闭的,这就要求高等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更需要企业和行业的支撑。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行业特色会越来越明显,对大学毕业生实行“准入制”是否成为趋势还有待观察。但这些专家的建议可以提醒高校毕业生,行业资格要求会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我以为,或许应当分一定的学科和专业来实行更合适,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专业就很难用职业资格来要求,而且我国的许多行业还没有完全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于一些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和有鲜明行业色彩的专业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另一方面也应当对用人单位的考核行为做出相应的规范。用人单位在选择人才的时候,针对工作岗位和行业需求,提出对毕业生进行必要的面试、笔试或者其他一些必要的考察,都是合理的。在这里我介绍欧莱雅公司如何与高校合作,采取一些科学的办法招聘人才。

欧莱雅最著名的择才标准是“诗人+农民”的完美结合。他们认为“诗人+农民”的禀赋,是创新与执行的结合,是智慧与技能的结合,想法与行动的结合。一方面,作为百分之百的化妆品公司,他们强调创造性和前瞻性。要求员工对美、对人文有深刻的理解,要有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挑战现有的观念。这并不仅仅是在营销上,还包括产品的研发上,想像力与创造力以及对艺术本身的爱好会转化为对产品创新的一种驱动。所以这一素质是他们必须有的。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诗人”素质。另一方面,化妆品市场竞争激烈,不仅需要想像力还要脚踏实地,就是能够接近客户,非常谦虚地倾听客户的需求,发现他们的需求,理解他们的需求,要能够非常勤劳地工作。这个行业跟零售业息息相关,有时要求员工周

未去站柜台,这是很辛苦的。这种勤奋、能够解决问题和接近客户的素质,这就是“农民”素质。每年,欧莱雅都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诗人+农民”相结合的杰出人才,而寻找的两项主要途径便是“欧莱雅校园企划大赛——L'Oreal Marketing Award”和“欧莱雅全球在线商业策略竞赛——L'Oreale-Strat Challenge”。欧莱雅校园企划大赛1993年首创于法国,每年举行一次,主要针对大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中国大学生于2000年首度参加此项赛事。目前,欧莱雅(中国)公司已经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成功开展过校园企划大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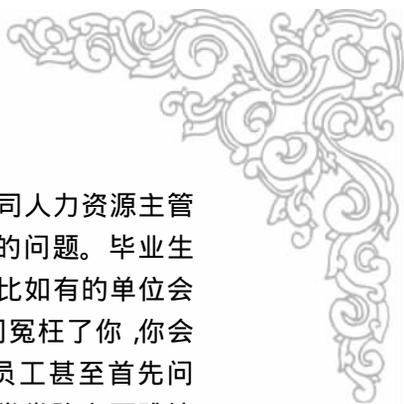
而“欧莱雅全球在线商业策略竞赛”则是一项能综合体现MBA教学水平和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比赛。它通过模拟新经济环境下国际化妆品市场的真实情况与各类商业竞争要素,让未来的管理者通过网络运行一个虚拟的公司,“这项赛事侧重于非确定情况下领导决策能力的锻炼”。

校园招聘是欧莱雅公司全球招募策略的重要方面。主要步骤如下:

- A. 简历:只是初步的筛选过程
- B. 专业:看重基本素质,淡化专业色彩
- C. 性别:没有任何性别限制
- D. 外语:因部门和岗位而有所区别
- E. 面试:看重对时尚、人文和美具有感知、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人才
- F. 标准:诚信+潜力+兴趣

可以说比起员工的资历和工作年限,欧莱雅更看重员工的能力与成绩。欧莱雅集团的现任总裁欧文中先生,当年接手担任这一职务时,年仅42岁,但欧莱雅给年轻人相当多的发展锻炼和学习的机会,并给予充分的信任。<sup>[3]</sup>这样一种选才的方式,尽管比较复杂,而且要有相当的创意,经过一定的程序来完成,但可以说,对遴选出优秀的人才是极其有益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荒唐的考核,《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12月13日报道《老板叫你跳楼,你跳吗——大学生面试遭遇怪题》:“老板叫你去跳楼,你跳不跳?”——日前,在南京一所著名高校举办的招聘会上,一位大四毕业生在接受深圳一家电子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面试时,竟然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据这位毕业生透



露,被问到相同问题的还有好几个同学,当时该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向他们提问了一些专业知识之后,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毕业生求职过程中碰到这类千奇百怪的问题并不少见。比如有的单位会问求职女性“你准备何时结婚”,有的会问“当上司冤枉了你,你会不会当众反驳”,而前一段时间南京一单位招聘员工甚至首先问毕业生“能喝多少酒”。面对这类“怪题”,求职者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从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出我国人力资源管理队伍建设的健全、不完善。目前国内许多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招聘员工时,根本不清楚所需人才的岗位描述、职责和工作目标,根本不知道要聘任的员工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能力,他们评价人才只是通过简历和自我介绍,一味地看学历、看分数,这样就难免会出一些“怪题”,闹一些笑话。而2004年初关于公务员是否一定要“乳房对称”的争论实在也使人啼笑皆非。如果要避免这样的现象的出现,就应当对进入人才市场的人力资源管理干部有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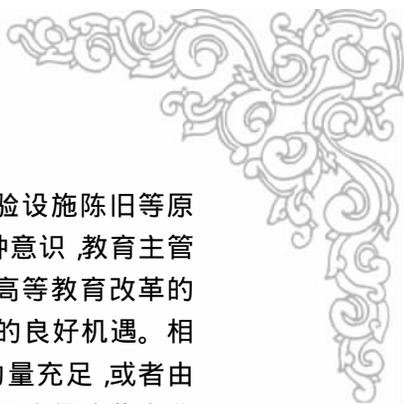
除了要加强人力资源队伍的自身建设外,还要制定严格的运行程序和相关规则。在人才招聘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反复的情况,比如违约的处理、对用人单位选择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监督以及相关的细节等等,都应当有详细的规定,不能随心所欲。现实的情况是:供需双方在招聘过程中出现的“诚信”问题令人担忧,双方都抱怨,相互指责,甚至引起法律诉讼,而市场所有的相关规则和合理的制约机制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这也是造成了人才市场运行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大多数人才市场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轰轰烈烈的做法,向经常化、小型化、信息化、网络化方向发展,开始运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网上考核、网上面试、网上录用等方式,更加受到大学毕业生的欢迎。2004年初,人事部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人才市场的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我国人才市场的十三条政策和措施。纵观这些政策,其主要宗旨是要规范人才市场,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这种积极的探索会更有利于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 就业指导

面对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人才市场,许多毕业生感到茫然,怀里揣着毕业文凭,手里拿着厚厚的推荐材料,茫然地闯进人才市场,而面对如此多的就业信息,又不知道如何选择,面对面试考官尖锐的提问,不知如何作答,看着就业协议又不懂如何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种种问题都困扰着如今的大学毕业生。随着就业竞争的越来越激烈,进入人才市场的就业队伍不断膨胀,高校毕业生感到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就业困难状况对社会所形成的冲击,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重视。针对这样的情况,从1999年起,教育部采取公布部属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的方法,迫使学校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目的也是为了促使各个高校重视学生的就业工作。国家有关部门一再召开会议采取措施,试图缓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难状况。应当说政府的重视解决了毕业生就业的宏观环境,形成全社会关心毕业生就业的气氛,对学生的就业是有好处的。那么,高等学校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就高校自身来说,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使学校培养的学生更能切合社会的需求,特别是对毕业生的就业知识教育和就业能力的培训,应当成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内容。一些专家指出,之所以目前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严重状况,固然和前几年的大规模扩招,引起短期内毕业生总量的急增有关,但与学校自身的原因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不能跟上社会产业结构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从理论上来说,专业的调整或许总是落后于社会需求的,对专业的前瞻性调整,即使能被我们在第一线的高校想到,按目前的专业设置管理体系也很难做到,何况专业从设置到培养出毕业生还有相当一段运行时间,这是教育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现在高校专业结构的基本框架仍然有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从师资到教材、实验室等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绝大多数高校没有专业设置的自主权,新专业的申报仍然要逐级申报,层层把关,有着十分烦琐的程序。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很大,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兴产业,由此而孕育出对相关人才的需求量



也不断扩大。但是,高校往往由于师资不足或实验设施陈旧等原因,难以很快适应这种要求。即使是学校有了这种意识,教育主管部门也不一定有这样的灵犀,臃肿的管理也会使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大大减缓,学校更是会因此而丧失许多发展的良好机遇。相反,一些社会需求量缩减的传统专业,由于师资力量充足,或者由于这些专业可能是学校的学术强项,学校往往为了确保这些专业的生存,而不愿意减少招生量。这样供非所需的局面就出现了,专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我并非主张将高等学校办成纯粹的社会“服务站”,我也主张应当按照教育客观规律办事,但我们在讨论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时,应当充分考虑学生就业,特别是专业设置关系到人才供求结构,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即使是研究性大学,重在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也应当兼顾社会的需求。不然人才的结构性矛盾就很难解决。

二是高校毕业生素质与用人单位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高素质人才是每个单位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最重要的资本。因此,各单位在人才市场对毕业生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高等学校教育改革滞后,缺乏对人才素质的重视和培养体制,导致毕业生的素质不能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从用人单位在人才市场的“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会上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反馈意见看,主要因素是学生的动手能力、专业技能、处理问题的经验和基本方法,以及对问题的分析能力等等没有达到一定的要求,还有一些学生因重修课程率高,知识水平也存在一定差距,甚至有的毕业生拿不到学位证书;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学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和社会用人单位在普遍意义上的对毕业生的评价体系不能对接,而且有不小的反差,出现了“优生不优,差生不差”的尴尬局面。很难在学校培养和社会就业之间建立起人才就业的“绿色通道”。这值得高等学校反思,如何来根据一般意义上人才评价标准来调整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才能给予在校学生一个明白的成才指针和努力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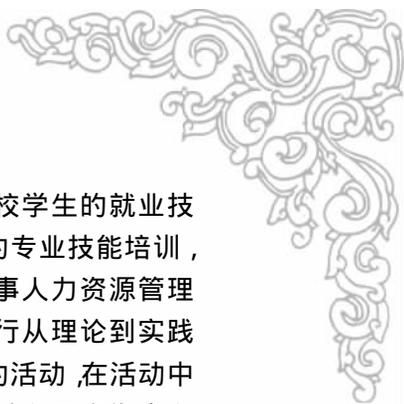
三是高校管理层和教师对毕业生就业工作重视不够。从观念的角度来说,学校一直把教学和科研视为学校的根本工作,学生的就业一直被认为是家长和学生本人的事,社会和政府的事,学生就业工作很容易被忽视。然而在实行教育收费制度的今天,社会、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都需要高校能重视学生的毕业就业工作。问题的根本解决恐怕只有到实行高等教育体制彻底转变的时候。

因为,现在的办学体制,是没有办法把毕业生的就业和学校发展的实质性利益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四是毕业生的择业观念和择业态度有待调整。部分学生的择业观不正确,择业态度不切实际,往往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就业机会。例如,一些学生对就业的待遇、工作环境、薪水等期望值过高,更多地希望在一个环境优越的大城市就业,而不愿到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或行业工作;有的狭隘地理解专业对口、学以致用;有的不愿到远离父母的地方工作等等。事实上,就人事制度而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允许人才流动。大学毕业生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一次分配定终身,应当着眼于长远,尽可能争取更多的机会,在全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合理流动,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佳配置,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益。

高等学校对学生开展就业指导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从高校的领导层到普通的教师首先应当在观念上确立就业指导的重要性。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成千上万毕业生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事关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事关社会的稳定,也事关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从根本上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有赖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有赖于政府人事制度的改革和相关政策的调整,有赖于社会各用人单位的共同支持以及高校自身的努力。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首先要承担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调整专业设置时要考虑社会的需求和学生的就业前景,使其能更符合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求;办出一些有特色、有质量的名牌专业,一些高等学校重视特色专业的建设,不仅能创出自身的办学优势,而且能够提高学校的竞争能力;重视对全校教职员工的教育,增强他们为学生就业服务的意识,重视学生的就业技能培训工作,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好的基础。

我在前面提到过,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将现在的政工管理队伍和行政管理系统合并,学生工作处的管理职能应该得到加强,行政管理的各个职能部门在学生培养的整个流程中,都应当围绕学生的成才和就业这个中心来运转,合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目前这种学生工作单打一的局面。学生工作处统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行政管理,它的职能延伸到院系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这样才能真正把“一切为了学生”的理念落实到实处。在国外的许多大学里,都有一个学生的择业培训中心,是个常设机构,它从属于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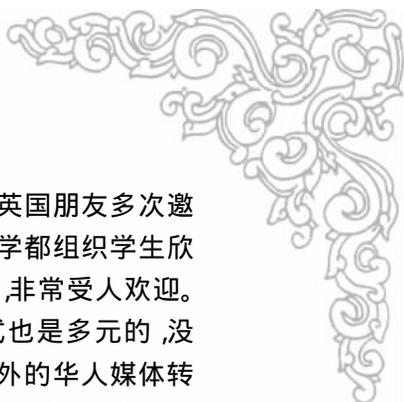
事务处的管理,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常年坚持对本校学生的就业技能培训和咨询,很受学生的欢迎。要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技能培训,一是以开设选修课、公共课的形式聘请专家和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业务干部,对学生就业基本知识和相关政策进行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和培训;二是利用第二课堂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活动中提高学生的面试技能等就业必需的素质;三是通过心理咨询中心给予学生良好的就业心理咨询服务。

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如何调整学生的就业心理,就业心理在学生就业困难的许多因素中显得尤为重要。在国人传统的观念里,大学毕业生是刚刚走出高等学府这个“象牙塔”的国家栋梁,自然是优秀的人才,应当从事与其身份相对称的“崇高”职业,这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时代的观念。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走上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人们的观念仍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变;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学生本人还是学生的家庭,从上大学的那天起就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期待,这种期待的最终目标就是能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从教育的投资和回报理论来说,每个毕业生及其家庭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收入回报;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心理问题。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已经彻底打破了精英教育时代对毕业生的传统定位,已经将大学毕业生从就业的保险箱中请了出来,大学生的优越地位,从他走出象牙塔的那天起就不复存在了。素质教育的理念给予学生的是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能力的增强,从来就没有赋予就业的优越感。而在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的社会发展趋势中,各种社会劳动对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高等教育已经开始变成从事社会劳动的基本需要,而不再是从事更“崇高”职业的资本;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以及科技在社会各个领域的运用,已经抹平了社会不同行业和工种之间的差异,各种社会劳动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已经很难有“贵”“贱”之分,而只有收入的“多”“寡”之分;曾几何时,社会上出现“个体户”的时候,有很多人抱以“鄙夷”的眼光,而当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摇身一变为富裕的“私营企业家”的时候,不禁着实令一些人大跌眼镜。在多元经济社会里,人们的就业观念也必然会呈现多元演变。

而我们的一些毕业生要么心比天高,眼睛盯着理想中的职业需求,不肯放弃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就业意愿,要么焦虑不安,不敢

面对社会的挑战,要么听之任之,消极对待。这些都不是良好的就业心理。在一些发达国家,大多数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愿意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收入,以解决生活的必需,然后再发展自己,或者寻找更好的职业,或者选择自己创业。一些低收入者,可以选择兼职来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在一些极其普通的行业里都能看到大学生的影子。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而在我国,似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观念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最近读到两则报道,一则是2003年7月26日,陕西媒体以“北大才子长安街头卖肉”为题的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报道称:“1985年以陕西省长安县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大中文系的陆步轩毕业后,在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等企业工作,企业倒闭后,他先后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2000年,又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附近开起了肉店。”有人抱怨这是严重的人才浪费,也有人指责人才的使用不公等等。另一则是《中国青年报》2003年12月30日《12名大学生春节后到沪当高级保姆》:“12个来自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驾驶证、秘书证、证书不少,讲英语、用电脑,样样都会,明年春节后将加入上海家政服务市场,成为涉外客户和高收入家庭的家政服务员。”从这两种状况的出现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环境已经在悄悄地变化。卖肉也好,做保姆也好,都是社会需求的正当职业,而且都有稳定的收入。尽管一个是有点“被迫”,另一些则是“主动”,似乎有点区别,但实质是一样的,而且我相信,“被迫”的不一定一直被迫,而“主动”的或许也会改变自己的选择,在现代多元社会里,我们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舆论的引导更多的应该有利于毕业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创造一个有利的就业环境。

一些舆论担心大学生的择业困难会造成严重的人才浪费,甚至有的怀疑高校的“扩招”是不是有必要,高等教育走大众化道路是否正确。我们强调素质教育的理念,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为提高全社会公民的基本素质,这种基本素质并非仅仅是工作和择业的需要,也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需要。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不懂计算机的人能够享受因特网高级的信息服务,一个没有读过英国文学作品的人能懂得莎士比亚,人的生活质量也是与其自身素质密切相关的,即使是在“爵士乐”、“披头士”、“脱衣舞”充斥的西方文化里,严肃音乐和正剧也同是一种时尚,在英国,能欣赏到许多充满现代时尚的文化,流行的、前卫的,甚至是荒诞的,但也能欣



赏到他们的国粹——莎士比亚的艺术传统。我的英国朋友多次邀请我去剧院欣赏话剧,而且,我发现许多中学和小学都组织学生欣赏,小小的 LEEDS 剧院每周几乎排满了各种剧目,非常受人欢迎。我们应当理解在多元经济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多元的,没有素质的提高就不会有高质量的生活。我看到海外的华人媒体转载了《南京晨报》<sup>[4]</sup>的一则消息称“大陆新现象:高学历助理太太甘做家庭秘书”:

现在有的女士虽有高学历,却没有固定职业,她们在家协助先生处理工作上的事务,并自称“助理太太”。近日,据了解,一些“助理太太”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助理太太”和“全职太太”相似,不需要外出工作,但是她们却通过改变生活、工作方式,而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陈陈几年前毕业于南京某名牌大学计算机系,曾在某外企任技术总监。婚后,她辞职在家帮助先生料理工作上的事务。陈陈的先生是广州某公司驻南京的推广部经理,工作除了拓展市场外,还需做企划、报表等。对于此类工作,计算机专业出身的陈陈可谓驾轻就熟,她与先生默契地配合,使先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市场的开拓中。经过共同的努力,他们的月收入由 5000 元上升到万元左右。陈陈说,她现在的生活很自由,除了帮先生处理工作外,自己每天看看书、上上网,或做顿可口的饭菜,增添家庭生活的情趣。而且他们家庭的收入在南京也算不错,她很满意目前的生活状态。

在南京,像陈陈这样的“助理太太”并不鲜见。她们的先生多半是某公司负责人或做设计的 SOHO 族,拥有较高收入,而她们则在家一边享受家庭生活,一边兼顾先生的工作,在她们看来,当“助理太太”就像做丈夫的家庭秘书,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

文章虽然没有说明这位“助理太太”到底是什么学历,但我想至少是本科毕业,也许在常人的眼里她是失业了,但我觉得她的选择也无可厚非,你能说这是人才浪费吗?最起码,她的家庭生活质量依赖于她的受教育程度。相反,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的“有闲阶层”中,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生活情趣呢?你单从国人的“麻将文化”的发达,就能体会到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紧迫性。

而目前的就业难问题,症结在于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结构性矛盾,人才培养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我们的“教”与“用”之间的不相

对称。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以“白领”教育为主流,而据《中国青年报》<sup>[5]</sup>文章《寻高级技师难,灰领人才危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报道:今年毕业大学生270万,而高级技师存量只有28.7万,我国已经出现“灰领人才”危机,供求严重失衡。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教授在上海召开的首届职业培训国际论坛上表示,必须加快我国“灰领人才”的培养,否则将影响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深圳一家企业开出6000元的月薪仍未能如愿找到高级钳工,浙江一家企业用年薪70万元从日本请来一名高级技工,而2002年上海市需求高级职业技能人员1.38万人,但供给却只有3800人。杨河清用几个令人惊讶不已的例子来说明目前我国“灰领人才”的短缺。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求大学生、硕士生易,寻高级技师难。今年我国毕业大学生270万人,硕士生27万人,而高级技师的总体存量却只有28.7万人。据悉,目前全国城镇企业共有职工1.4亿人,其中技术工人7000万人,高级技师只占0.41%,技师也只占3.1%。另据一项对全国30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58.5%的企业管理人员短缺,但与此相对应的是,近80%的企业缺乏技术人员,尤其是高级技术人员。

这种人才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型亟须改变,有专家提出在大学期间引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对“白领”学生实行低成本的改造的途径。同时,必须尽快将通识教育引入大学教育。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尝试大学“2+2”的培养模式<sup>[6]</sup>,致力于对学生宽口径的培养。相信通过高等学校的努力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能达到完美的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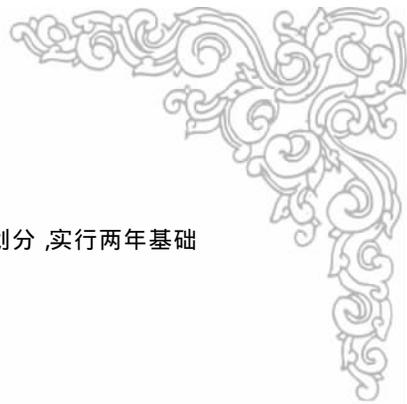
## 注 释

[1] 杭州市天长小学周武老师是天长小学多年的班主任,1989年,他开始了一项关于该校小学毕业生成长经历的跟踪调查,在十年的调查中他发现了这样的规律:在实行百分制的情况下,在小学期间前几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学(乃至工作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会“淡出”优秀行列,而许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学生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现出色。周武将这一现象称为“第十名现象”。

[2] 见《中国教育报》2002年2月24日第一版。

[3] 详见《青年参考》2003年12月15日。

[4] 详见2003年12月27日《南京晨报》报道。



[5] 详见《中国青年报》2003年12月6日报道。

[6] 所谓“2+2”的培养模式,就是将大学四年进行划分,实行两年基础教育,两年的专业教育。

## 第八章

### 高等教育投资和收费制度

2003年中央政府接连召开了两次重要的关于人才建设的相关会议,一次是海外归国留学人员会议。还有一次是12月召开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人才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出席了这两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由此可见,中央和国务院对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提到了最高层次,这是值得欣慰的。重视人才,势必要重视教育,尤其是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正像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的,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党同志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要树立大教育、大培训观念,在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基础上,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着力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加大对人才资源能力建设的投入,优先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促进人才总量同国家发展的目标相适应,人才结构同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人才培养机制同各类人才成长的特点相适应,人才素质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适应。要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各类人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在实践中完善自己、在竞争中提高自己、在奋斗中充实自己。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政府会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在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中教育必然也会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sup>[1]</sup>



## 留学热的背后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形成了一股很强的改革势力,这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海归派”,他们中的大多数多年在海外留学,学成归来以后,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在发达国家学到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观念,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骨干。这说明我国的留学政策对培养优秀的人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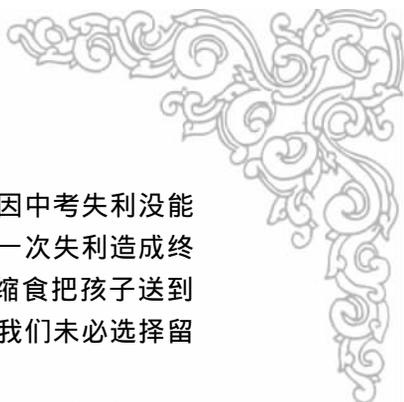
据统计,教育部直属高校目前在岗校长中,有 77.61% 的人有过留学经历。62.31% 的博士生导师是留学回国人员。此外,81% 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72% 的“九五”期间国家 863 计划首席科学家是留学回国人员。留学工作对我国教育、科研、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培育了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新一代学术领导群体;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经验的管理骨干;创设了大批新学科,引进了大批新的教材和教学方法;缩短了我国科研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一些学科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为西部边远地区、艰苦地区和基层部门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也为我国在海外储备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

据人事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先后有 2500 多名留学生和学者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其中有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吴文俊等。党和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派出 18000 多名留学生。他们学成后全部如期回国。在 1955 年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中,留学归国学者占到 92%,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 23 人中,留学归国学者有 21 人。

长期坚持选派留学生的政策,是我们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个基本的国策。据教育部《2002 年留学年鉴》统计,2002 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 12.5 万人,其中国家公派 0.35 万人,单位公派 0.45 万人,自费留学 11.7 万人,与上年度数据比较,2002 年度出国留学人数增加了 49%,主要体现在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占全部出国留学总人数的 94%。2002 年度留学回国人员总数 1.8 万人,比 2001 年

度增加了47%。自1978年至2002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58.3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15.3万。目前仍在国外的43万留学人员中,有27万人尚在国外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出国留学人员学成者中,已有近一半人员回国工作。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已经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到2000年底,全球留学生总数达到16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108个国家,而中国就有38万留学生在世界103个国家求学。

特别是在我国放宽了自费留学的限制后,有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加入留学大军。中国最大的民间英语培训机构新东方英语学校仅2001年在上海的学员人数就达到4万人,其中60%以上是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可见留学的后备资源也正在不断地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留学热”在中国持续升温,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加速了中国的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融合,使出国留学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波”热潮。形成这样的局面的原因是很多的,一方面确实有许多青年学生渴望能有机会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求学,能接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技术和理论,了解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否则无论在国外、国内,要在某个科研领域发展很难,正像一位留学中介公司的总经理所说:“与老一代留学生相比,现今留学生的目的性很强,都是为了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另一方面,开放的中国社会,许多外资企业的用人政策对拥有外国教育学历的求职者格外青睐,以及国内企业在加入WTO后,录用人才也更看重拥有外国教育学历的毕业生,这种政策的倾向客观上也拉动了留学的增长。从以上教育部的统计可以看出,自费留学占到总数的94%,其中政府鼓励政策的推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放宽留学政策,使得有经济条件的学生纷纷加入了留学大军。政府的推动是有理由的:可以减轻国内高校的资源紧缺压力,可以舒缓就业的压力。但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中国新闻网2003年9月3日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媒体分析:中国人为何会热衷送“小皇帝”出国》,其中写道:“在美国签证官看来,未成年的孩子的移民倾向最明显,而且他们的学习目的也不纯。因为中国有最严格完善的基础教育,花这么多钱出国仅仅是为了学语言,美国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不少家长送孩子出去完全是被逼无奈。很多留学生家长在谈到留学垃圾时都涉及到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一位小留学生家长道出了自



己的苦衷。我的孩子出生在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因中考失利没能上高中,这等于孩子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一次失利造成终生遗憾。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正规教育,我们节衣缩食把孩子送到国外。这位家长说,如果我的孩子当时能上高中,我们未必选择留学这条路,这是中国教育体制造成的。

显然,我们可以从以上的报道中看出,“留学热”的背后,存在着学生家长对现在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满。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留学对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对更好地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是十分有益的。但“留学热”也带来了不少副作用,一是留学事实上也成为人才流失的一个途径。从以上《年鉴》的统计我们发现,只有“近一半”的人员学成归来,那么,还有多于“一半”的人员留在了国外,且不再去分析比较那些回国的和留在国外的人员的素质,而来看一些国家是如何在全球网罗人才的。美国麦肯锡公司<sup>[2]</sup>曾把现代世界各国对各类专门人才的争夺称之为“人才大战”,在这场战争中,发达国家各使绝招,把眼光牢牢盯住了发展中国家。据国内人才研究专家估计,目前,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0万专门人才流向发达国家。人才究竟是怎么被“抢”走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事与人才科学研究所所长王通讯近来潜心做了番研究,总结出了全球“人才大战”的10种形式<sup>[3]</sup>。其第一招就是:吸引留学人员,收割人才。为了争夺留学生,英国宣布到2005年,要使外国留学生占到本国学生的25%,德国计划也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0%。近年来,外国大学把各种教育会展和留学咨询办到了中国人的家门口。而一些外国院校、公司企业还和中国学校挂钩,到中国的大学甚至中学挖尖子人才。一些地方学生留学年龄一降再降,著名的美国微软公司就有一项在全球争夺人才幼苗的计划;新加坡学校用提供奖学金的办法到中国招收中学尖子生。

二是“留学热”也导致了“留学垃圾”现象。《中国青年报》2003年1月4日载文,以尖锐口吻揭露了“留学垃圾”事实,并批评这种现象已经出现在加拿大、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中,必须加以正视。这些被称为“垃圾”的人,是一大批,并非少数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的大群体中,足见问题不容回避。报道指出,有些大陆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情形令人难以认同,包括卖淫、拉皮条、吸毒、非法移

民等,不一而足,用“留学垃圾”来形容这些学生十分形象。报道称,中国不必要有统一的出国留学标准,但从目前大陆学生出国留学的总体效果看,负面效果远远大于正面效果。“留学垃圾”现象已经导致了一些国家如日本、美国等宣布紧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政策。

三是丧失了我国的教育市场。如此庞大的留学生潮每年流失了多少外汇?据统计,一些中国学生的主要留学去向国的留学费用大致如下:

英国:12~20万人民币/年,其中生活费大约六七万人民币。

澳大利亚:10~18万人民币/年,其中生活费用约五六万人民币。

加拿大:8~14万元人民币/年。

新西兰/爱尔兰:7~14万元人民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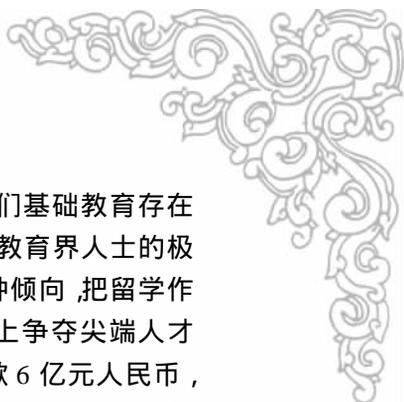
美国留学的费用最高,一年的费用平均在20000美金到25000美金之间,折合成人民币,一年的开销大约为16~20万元。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收费最便宜,每年需4~5万人民币。

德国、荷兰提供公费教育的国家里,学生可以享受到减免学费的优厚待遇,只要负担每年5万元人民币左右的生活费就可以了。<sup>[4]</sup>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同时也是美国和日本最大的生源国。在英国,中国留学生在最近4年内增长了近4倍。今年初我国简化了出国人员的手续,又放宽政策,允许在校生因私短期出国。随着出国人员的条件不断放宽和入世后我国教育市场的开放,出国留学的人员必然会越来越多。我国每年有2.5万多人出国留学,如果每人每年以消费10万元计算,则高达25亿人民币。这还没有算前几年出国没有回国的留学生,只是当年的出国人员。这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留学市场的火爆,一方面说明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国内教育市场的巨大冲击。我们看到留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对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失去了信心。有许多家长也是因为对国内的教育失望而寻求国外的受教育机会。特别是有些中学生出国的情况更令人忧虑。许多学生和家長是没有办法承受中学的教育体制和我国的高考选拔制度,而不惜重金送小孩出



国。而“留学垃圾”现象的形成,不能不说又和我们基础教育存在的弊端有着密切关系。这样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教育界人士的极大关注。我一直在怀疑,我们的决策层是否有一种倾向,把留学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也作为在世界人才市场上争夺尖端人才的途径。据有关报道指出,我国政府已经决定拨款6亿元人民币,在今后几年为中国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聘请300名海外优秀中青年科学家。据了解,这是迄今政府为吸引海外人才而拨出的最大一笔款项。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说,每位受聘科学家将获得200万元左右的科研经费资助。他们将参加以中科院为主体的国家创新工程的课题研究。他介绍说,创新工程重点研究领域包括农业高新技术、人口与健康、信息科学与技术、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资源与环境、空间科学与技术、基础和重大交叉科学等八大领域。此次招聘重点是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具有博士学位的海外专家学者,同时中科院也将引进一些国内的优秀人才。白春礼说,中科院将争取更多资金为引进的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优惠待遇。对特别杰出的科学家,中科院还将设立相应的岗位津贴和绩效津贴。科技部一位高级官员在谈到杰出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时指出,经济、高科技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他建议制定一套与国际接轨的人才管理条例,给予“尖子”人才特殊的待遇。<sup>[5]</sup>

可见,政府的意图是要参与到全球的人才竞争大战,能够从国际的人才市场上“猎取”更多的优质人才。但是,我以为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国内高校的投资和对高教体制改革的推动。或许,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因素,不然,为何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里,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会出现严重不足的状况呢?为什么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动和突破呢?

## 我国高等教育的投资现状

研究我国的教育投资现状,有必要先回顾我国过去的高等教育投资概况。据一些专家分析,建国以来我国的教育投资体制的变革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79):单一依靠财政拨款。

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的近30年间,政府投资一直是高等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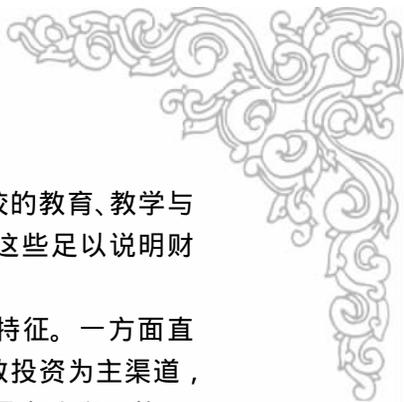
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其他渠道来源的经费很少。政府拨款主要包括财政预算内的教育事业费拨款、教育基本建设费拨款、各种专项资金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其他预算内资金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等。高等院校纯属政府的附属,很多财政经费是戴帽下达,专款专用,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极其有限。这样的管理体制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使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而且根本无法使教育规模与质量达到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阶段(1980—1998):以财政拨款为主,社会筹资和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自筹为辅。

1979年恢复高考后,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80年6月国家发出的《高等学校建立学校基金和奖励制度试行办法》通知,批准高等学校建立学校基金制度,学校对基金具有自主支配权。1989年8月国家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对新入学的学生(包括干部专修和第二学位),除特殊专业外,均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学杂费及住宿费作为财政性资金交纳财政专户后转拨入学校作为基金,原则上财政不截留、不调剂。这就使学校有了更大的资金自主权。1992年以来,国家通过对校办产业实行税收减免和建立校办企业周转金制度,进一步促进了校办产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全国校办产业、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支出的达到99亿元。学费及其他基金收入已经成为高等教育资金来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为引进市场机制,转换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职能创造了条件。

第三阶段(1999—当前):以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自筹和社会筹资为主,财政拨款为辅。

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实施“扩招”政策,同时高等教育投资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高等学校的自筹资金(含学杂费收入)与社会筹资已经超过了国家财政拨款部分。另外,由于独立法人实体地位的确立,使高校有了一定的筹资功能,除按国家规定标准收取约1/4的经常性培养成本及住宿费之外,高等学校还纷纷到金融机构和社会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融资。近年来,在社会渠道资金的投入中出现了校校联合、校企联合、银校联合等多主体联合投资办学形式,社会(民间)资本通过借贷、股份制、托管制、合作制及BOT、TOT等资本组合模式进入高等教育,不仅参与了学校基



基础设施建设与后勤的经营管理,而且渗透到了学校的教育、教学与科研等领域,甚至还有社会资本投资办新校区。这些足以说明财政已从过去的主角变成了配角。

研究我们过去的高等教育投资,明显有两大特征。一方面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教育投资体制仍然以国家财政投资为主渠道,并且政府对教育投资不足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主要负担的情况逐渐发生改变,学校自筹经费在高校经费投入结构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据世界银行调查,1990年代初,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学校创收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开始呈上升趋势,1990年为12.3%,1991年为13.1%,1992年为18.2%。这些创收收入来源包括:校办企业收入、委托培养收入、教育服务收入、研究及咨询收入、后勤服务收入以及学生缴纳的学费和社会捐赠。而政府财政拨款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1990年为87.7%,1991年为86.9%,1992年为81.8%。到90年代末,学校创收的比例有了进一步的增长。1997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支出中,来自学杂费、校办企业与社会服务、捐赠与集资等来源的经费占到了22.04%,成人高等教育来自这些来源的经费支出占到了30.93%;而政府拨款比例进一步下降,普通高等教育为72.81%,成人高等教育为48.91%。<sup>[6]</sup>

1990~2001年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财政性拨款与财政外资金统计情况表<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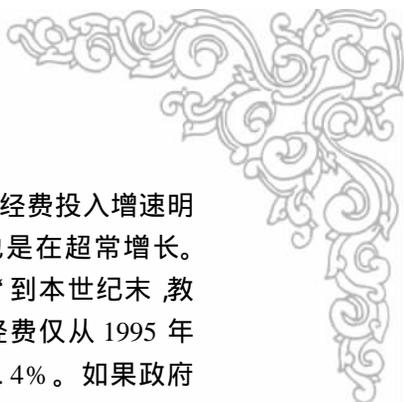
指标年份	高等教育经费(仟元)	财政性拨款部分比例(%)	财政外经费部分比例(%)	高等教育学杂费、杂费(仟元)	学费、杂费占高等教育经费比例%
1990	10930607	87.70	12.30	51934	0.48
1991	12528227	86.90	13.10	191522	1.53
1992	12533628	81.80	18.20	458167	3.66
1993	18352446	82.18	17.82	1348532	7.35
1994	24754446	72.32	27.68	3291261	13.30
1995	29219792	69.51	30.49	4451919	15.24
1996	34555255	68.22	31.78	5636530	16.31
1997	41509810	66.12	33.88	7238858	17.44
1998	58703842	61.88	38.12	8943189	18.24
1999	75330600	60.03	39.97	14463023	19.20
2000	84679760	54.19	45.81	23430097	27.67
2001	102028520	47.56	52.44	37956758	37.20

从以上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财政拨款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在逐年减少,说明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于其他渠道的越来越多。(2)财政拨款减少的趋势随着扩招在校生的增长更加明显,说明财政拨款并没有随“扩招”比例相应增加,而是在减少。(3)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的财政性拨款部分所占比例在“扩招”后迅速降至50%以下,且年降幅度也越来越大,表明“扩招”是高等教育投资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标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所占比重逐年减少,收取部分培养费、学校的服务收入等财政外资金收入逐年增加,并有取代财政投资的趋势。高等院校作为独立法人的办学实体,自身筹资功能不断增强,高等教育办学经费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随着高等教育成本核算体系的健全,人们将会逐步接受付费享受高等教育服务的商业化消费观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sup>[8]</sup>在研究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数据后发现:1995年,中国各级政府投资于教育的资金大约占GDP的2.5%,物质资本的投资大约占GDP的30%。在美国,相对应的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是3.7%和30%。中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尽管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是,投资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无独有偶,新加坡的《联合早报》2003年12月3日也发表了一则消息称:如果在教育问题上受到人权指责,中国将无话可说。文章援引外电报道说,负责人权事务中“受教育权利”的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斯夫斯基女士在对中国进行了两周的访问后,就中国的教育现状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她指出,中国政府虽然称超过90%的中国人至少接受了9年的教育,而且文盲率至少下降了5%,但托马斯夫斯基女士指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的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她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这个数字仅仅是联合国所建议的1/3,而且政府公共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据了解,这是联合国人权调查员9年来对中国的首次调查。

而按照我国官方的统计,早在1987年中国就制订了9年义务教育法,在1995年又出台《教育法》,建国以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1985年达到最高,也仅为GDP的3.54%,目前大致徘徊在GDP



的 2.5% ~ 2.7% 之间。在 1999 年以后,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增速明显加快,但同时更应该看到我国财政收入实际也是在超常增长。1993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到本世纪末,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应达到 4%。”结果教育经费仅从 1995 年的 2.41% 增至 2000 年的 2.87%,今年也只增至 3.4%。如果政府努力使教育投入达到 GDP 的 4%,以及我国目前 GDP 增长已经超过 8 万亿来看,我国教育投入的资金缺口至少在 GDP 的 1% ~ 1.3%,即约 1000 亿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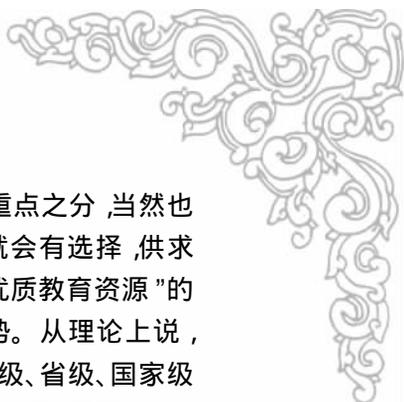
这样的教育投入和国际横向比较起来如何?根据 IMF《政府财政统计年鉴》1998 年版和 UNESCO《统计年鉴》1998 年版的数据,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 的平均水平在 1994 年为 4.9%,在 1995 年为 5.2%。具体来说,政府教育投入占 GDP 的比重,在英国为 5.4%,在巴西为 5.2%,在泰国为 4.1%,印度、韩国、新加坡等国则均在 3.0% 以上。而俄罗斯目前教育经费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军费!因此,无论从我国已有的法律来看,还是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教育投入似乎仍嫌不足。

另一方面,投资经费的使用效率不高。由于高等学校的体制改革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突破,长期以来,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没有得到有效的认可,高等教育对国家财政拨款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国家财政拨款的不足严重影响了高校运转,使得高等学校不得不首先保证“吃饭”的要求,即所谓的“吃饭财政”。高等院校的行政系统和后勤系统一直是高校运转的沉重负担,“学校办社会”的特征也得不到有效的改变。所以,高校又不得不将有限的资金投入 to 基本的“衣食住行”上,无法用更多的资金来改善教学条件和科研设备。如果你去参观一些高校的教室和实验室,发现一些五六十年代的仪器和设备仍在使用,用不着惊奇,因为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而且,目前高校教师的收入仍然处于社会的中低水平,还达不到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的收入水平。教师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作为重要科研力量的研究生的津贴也长期处在较低水平。在高校内部,一线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与行政后勤人员没有明显的差距,甚至出现倒挂。这种情况与迅速发展的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造成教师或学生人力资本的贬值浪费,也加剧了高等学校的人才和时间资源的流失。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校将具有额外经济效益的成人教育放到重要的位置,试

图用来缓解资金的紧张状况,甚至有的不惜影响全日制学生的正常教学。许多教师和学生还为了弥补因教书和上学付出的机会成本而大量地兼职,把宝贵时间花在本职学习、教学和科研以外,也降低了教育投资的效益。

再者,高等教育收费政策有待完善。除了政府拨款以外,高校经费的最大的来源就是学费收入,2001年已经达到了高校总经费的37.2%,由于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将高等教育放在义务教育之外,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正式向高校学生收取学费。应该说,实行高等学校的教育收费符合我国国情,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问题是我们的收费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执行办法和规则,也就是说政府给了政策,但没有给一个很好的规则,没有很好规则的制度自然会出现犯规的行为。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完善的收费规则,乱收费的现象越演越烈,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使得收费问题逐渐演变成社会的焦点。老百姓的基本观点是:收费能接受,问题是收费要符合社会实际情况,并且要公正、公平、公开,更需要有能解决社会底层人员、困难学生上学问题的办法,以维护教育的公平原则。而学校则有自己的难处,一个原因,政府部门的拨款比例下降,学校必须要靠自己来开源节流,高等院校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得一些普通高校的财政困难情况加剧,出现了更多的不平衡现象。在市场经济规则下,从理论上来说,没有被禁止的行为都合法,从学校本身的经济运行角度去寻找合理的规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于是,形成了在收费问题上一度混乱的局面。另一个原因是,我国高等院校由于各自的地位不同,政府对各个学校的拨款政策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倾斜政策导致了高校间的竞争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尤其是政府实行了一些教育工程项目,突出所谓的“重中之重”学校的建设,使得本来就财政“分灶”不均的局面进一步加剧。得到政府支持的名牌学校自然是高枕无忧,而其他的高校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在教育还属于紧缺资源和垄断经营的情况下,出现“乱收费”加剧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在前面提到过,我是反对人为地将学校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来管理的。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基础教育,许多“乱象”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基础教育有多少重点中学、小学、幼儿园,评价重点与非重点的重要因素就是“升学率”及其相关因素。这本身就是



对“素质教育”的一种“背离”，既然有了重点和非重点之分，当然也就会有收费政策的区别，人们对上什么学校当然就会有选择，供求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重点中学”——“优质教育资源”的供不应求，会导致社会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趋势。从理论上说，“优质教育”始终是稀缺资源，比如中学有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重点中学，现在又有所谓的星级中学，三星、四星、五星，层层递进，花样百出。相对于“权力”和“金钱”来说，用分数来评定入学的资格可能相对公平一点，如此这般，应试教育模式如何能改变？有些地方采取划地段上学的办法，试图用行政手段缓解这种矛盾，可是学生的户口是可以流动的，这里的“窍门”你是没有办法来弄清的。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就成了乱收费的温床。一些地方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开始酝酿中学的兼并，教师的合理流动，目的是为了打破这种分等级的局面，但成效如何，有待观察。高等学校本身就应该是各具特色的，不能重蹈覆辙。就目前而言，学校之间的专业特长和学科特色是不能用简单的等级来划分的。应该承认对学校的评价和对学科的评价是可以分离的，一流的大学并不意味着它所有的学科和专业均是“一流”，同样一些“三流”的高校也会有“一流”的学科和专业。大学的办学传统是由每一个大学的历史渊源和自身的大学精神逐渐形成的，各个大学的发展应该不断地发挥这种历史的传统，如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代表着一种崇高的大学精神，不能被人为地扭曲。政府对于大学的投资政策，不能让这种人为的因素左右大学的发展，要知道哈佛大学也绝不是靠美国政府用金钱堆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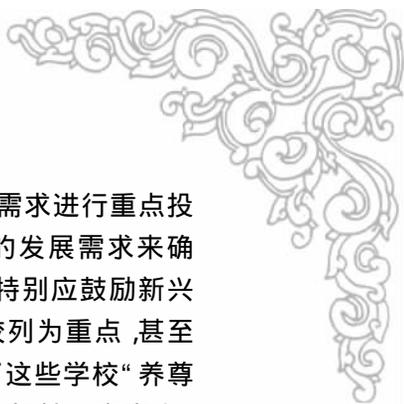
## 高校的投资和收费改革

对高校的投资和收费制度的改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许多研究者都提出了一些良好的观点，而政府的决策是基于国家意志考量，老百姓的建议当然只能是“窥见一斑”，但至少可以表达一些基本的思想和意志。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系统，我们都有着深深的忧虑。随着国民经济的日益增长，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一直处于低水平运行，和整个国家的发展十分不协调。政府推行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是必然的，但应该从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

的原则出发制定高等教育的投资和收费政策,不能成为政府减少教育投入的理由。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教育投资水平是和我国在世界上经济发展的地位极不相称的。所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和收费制度的改革,首先应当明确其立论的基点:政府应当进一步提高教育投资水平。如果这个基本前提不能得到确认的话,就无从谈起。因为,教育首先是国家的教育,教育的责任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正像朱镕基总理说的“义务教育首先是国家的义务”,投资教育是每一个政府的必然使命。何况教育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是关系到国家富强和生死存亡的千秋大业,又是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亲民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更应当切实解决国家和百姓的百年大计。

投资体制改革是整个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所以,讨论投资体制必然需要和高等教育整个体制的改革结合在一起。就拿全国普通高校为例,按照《2003年教育事业统计公告》所示,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系统包含普通高等学校1552所,比上年增加156所。从投资体制的角度考察,这1552所高等院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由教育部领导的重点院校。这类院校在经费来源和财务管理方面都直接隶属于教育部。第二类是由中央各部委所属“部属院校”111所,这类院校在经费来源和财务管理方面都隶属于中央的有关部门。第三类是由各个省、市、自治区领导的地方院校。这些地方院校主要是由省一级教育管理部门领导的,其中也包括少数的由地区一级或县一级教育主管部门领导的院校,这类院校在经费来源和管理方面都隶属于省或省以下的地方政府。<sup>[9]</sup>当然,除了普通高校以外,还有大量的大中专院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由地方投资。第四类是民办高校,由投资者自己投资和经营的,目前,尚属少数。这种分类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主要是过去我们的办学理念突出“专业和精英教育”的成分,允许部委和行业系统兴办大量的专业性学校,经过1992年以来的大规模并校,和下放一些部属院校与地方共建,这种状况才有所打破,并逐步扩大综合性大学的比例。

第一,我主张政府应当淡化高等学校“重点与非重点”的分类观念,制定公平的教育拨款制度,让高等学校在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公平竞争。大学的办学要体现各自的特色和传统,这是重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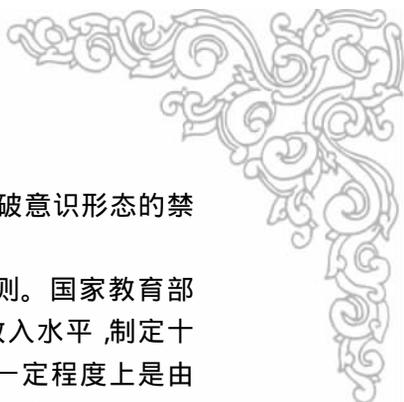
大学精神的基础。学科和专业是可以按照国家的需求进行重点投资和支持的。这应当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需求来确定,并且不断地进行调整,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应鼓励新兴学科和专业的创新和发展。我们现在把一些高校列为重点,甚至是“重中之重”,是没有好处的。一方面,这养成了这些学校“养尊处优”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打击了其他高校的积极性。事实上,各个高校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甚至有的非重点学校的一些专业和学科,也是在全国堪称一流的,由于这些专业所在的学校没有能进入“重点”之列而得不到发展,甚至有的会慢慢消亡。

第二,探索高等学校股份制改革。学校不是企业,但绝对可以借鉴企业的经营理念来拓宽学校的投资渠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两分天下的格局是有利于社会资本流入教育系统的,甚至可以将现有的一部分公办学校改制为民办大学,实行董事会领导制度。这一点完全可以学习发达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私立学校的重点学科和特色专业照样可以获得国家的支持和投资,这才是教育投资公平性原则的体现。基于这种理念,我觉得,政府可以将现在的高等学校进行重新的考量,可以用“抓大放小”的办法,在一些小型的高校先行实行试点,股份制的形式是可以多样化的,管理的体制更是可以探索,并按照中国社会特点来加以改造。探索高等学校建立新型的投融资机制,盘活学校的经营性资产,为学校的发展注入更多的资金。目前一些高等学校的做法值得肯定,也诞生了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天大天财等高校上市公司,还有一些高校开展与优质企业的合作,共同经营校办企业和民办学院。总之,政府应当鼓励高等学校做有益的尝试,有利于形成多元办学体制。甚至,可以打破多少年来国家垄断的文凭和学历制度。国家教育部属下应当有许多专业委员会负责制定相关的政策和规则,指导和监督高等学校的发展和运行。高等教育投资除了基本的经常性经费以外,可以根据学校事业的发展 and 学科、专业的成就决定投入的增量。

第三,政府应不断拓宽教育经费的筹资渠道。必须按照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在未来的3到5年里,探索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在规范政府、办学者、管理者、经营者、甚至社会各方面(包括学生及其家长)教育行为的基本前提下,打破教育内部

各级各类之间的“围墙”，而且也要充分利用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有利时机，利用其他产业部门的资源发展教育。首先要确保将国家教育附加全部用于发展教育，坚决制止挪用教育经费的现象，进一步加大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必须保证“三个增长”的实现，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例；运用市场机制筹措教育经费，按照高等教育适度超前的总体发展目标，通过引进社会投资、融资、教育彩票、教育国债等市场手段，甚至可以针对一些高消费行业开征教育税，集聚教育资金；在我国的税收政策中，应当尽快建立对教育捐赠部分抵税的制度，鼓励社会企业和人士捐资教育的积极性，进一步推行教育费用的成本分担，逐步形成适应不同办学体制、不同科类专业的成本核算方法，并按经济发展、财政能力的变化而自动调整收费制度。

第四，学费收入制度应该体现公平与效率并举的原则。由于高校收费涉及到每个百姓家庭，也已经成为社会焦点问题。学费的收入有国家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而且应当成为一条法律，体现教育的公平原则，任何学校和部门都无权决定学费的收入标准。英国的大学收费制度是必须得到议院的通过和政府的批准才能执行的。但也应当允许以优质优价的原则对学生的志愿选择实行调控。重要的是，国家应当建立一部分完全公费或者是低费率的学校来帮助贫困学生求学。而且，对于一些出类拔萃的贫困学生应该提供全额奖学金，确保他们有可靠的生活和学习保障。北京一些高校尝试按学分收费的方法来改革大学的收费制度，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有一点必须强调，高等教育非义务性质，是允许高等学校收取学费的依据，学费的标准也应当和大学的教育质量挂钩，允许一些优质的高校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提高收费的标准，这也是用经济手段对学生求学志愿的调剂。社会经济收入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允许高等学校在国家招生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扩大招生的自主权，以“宽进严出”的方法吸收一部分“高收费”学生。这并非不顾教育的公平原则，一则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客观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的特色和基本国情，大锅饭、绝对的公平是没有出路的；二则，我们有理由相信，应当采取措施减少我国教育市场的流失。适度控制留学和鼓励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优质的国外教育资源，共同分享教育市场的份额，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经济领域里实行中外合资的办法，引进先进技术是一



种很好的经验。在这方面,应当彻底解放思想,打破意识形态的禁锢,推动中国的高等教育走向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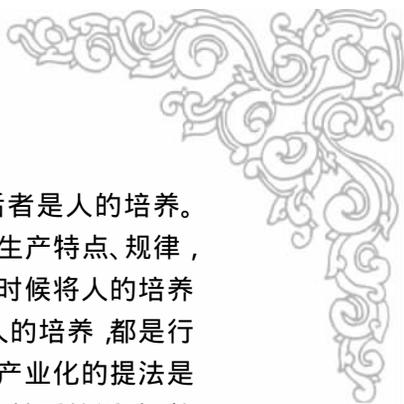
第五,收费政策必须要有非常具体的执行规则。国家教育部和下属的教育厅、局,应当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制定十分具体的收费规则。教育收费混乱局面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规则的不明确和执行的不规范造成的。同时,应当有公开的检查督促制度和体系,应用现代化手段监督学校的收费政策执行情况,不能对违反纪律的学校和部门姑息养奸,这样才能彻底解决乱收费的问题。

## 关于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出现以来,“教育产业”几乎成了人所共知的名词,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为我国高等教育产业进入大发展阶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文规定,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对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但是,这个概念提出以后,也引起了许多强烈的反对意见,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一直争论不休,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角度。赞成的观点主要来自于经济学界,以厉以宁教授<sup>[10]</sup>为代表。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产业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应该主要由国家办,但也要引入竞争机制,在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下,动员地方、部门和集体经济力量兴办,优化国民经济结构,缓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高等教育产业化,是为了解决日益扩张的高等教育需求与严重不足的高等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提高高等学校管理效率,促进教育市场充分发育。把教育产业化理解为建立一种合理的个人成本补偿制度,即接受教育的个人应缴纳一定比例的学费以保证教育经费的来源。教育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本身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渐成为利国利民的有效投资和消费重点,开发教育产业势在必行。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教育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与经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今社会经济竞争日益激烈,逐渐从产品与技术的竞争深化到人力资本的竞争,谁掌握了教育优势,谁就控制了主动权。

教育的出路,乃至于中国经济的出路之一,就是要将教育,甚至包括义务教育,全面推向市场,借用市场经济的杠杆,把教育抬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上。理由有如下几点:(1)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最大的教育市场,但并不是一个教育强国,发展不足和质量不高并存仍然是当前最大问题,教育市场长期供不应求,反映了教育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仍然存在把教育当作消费性投资、教育行业依赖国家“输血”、不计成本产出等痼疾,也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必须尽快改革。(2)随着教育政策的开放,国内外教育机构纷纷涉足教育市场,留学宣传活动铺天盖地,甚至瞄准了中小学生和高考“落榜生”。民办教育方兴未艾,从1992年起步,到1997年底已发展到5万多所,在校生总数约为1600万人,从业人员达52万多人,资产达到上千亿元,这与其他行业减员转岗形成对照,与公办学校经费困难形成对比。(3)教育发展有长效性,而且回报率高、风险小、无污染、市场广大,有利于减缓就业压力,促进再就业,应当是人口众多且独生子女普遍、资源短缺、环境基础薄弱的我国首选的发展行业,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行业。在经济条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办大教育是我国长期的国情特点,国家应当酌情考虑调整教育发展政策,以富国利民为出发点,鼓励社会资源办学,适当引进产业管理经验,允许适度的利润存在,求大利,存小弊,充分利用多年来积聚的教育优势和闲置资源,打破地区和部门的人为限制,扩大社会服务,使教育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

反对的观点也十分尖锐,他们认为,教育产业化是以狭义的产业概念为论述出发点的。狭义的产业是“从自然界取得物质资源和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再加工的社会物质生产部门”。教育产业化意味着教育转变为一种具有产业性质的活动,成为一种产业。教育(狭义的)是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受教育者(儿童、青少年)传授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品质、发展他们的智力和体力的活动。教育的基本性质主要在于它的精神性,即教育活动的对象是具有思想、个性的人,教育活动的过程是将前人积累下来的、经过加工整理的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受教育者,使他们的身心发生教育者所预期的变化,教育活动的结果是受教育者的心身得到应有的发展,成长为一个“社会人”。比较上述教育与产业的概念及其基本性质,不难看出,两者有着许多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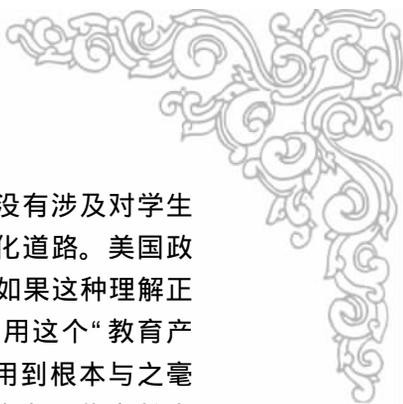
本的区别。虽同为人类活动,前者是物的生产,后者是人的培养。人的培养有人的培养特点、规律,物的生产有物的生产特点、规律,或许两者之间有兼容、相通之处,但恐怕无论什么时候将人的培养规律用之于物的生产,或将物的生产规律用之于人的培养,都是行不通的。因此,从概念的逻辑分析出发,认为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教育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产业性质的活动,教育成不了产业。<sup>[11]</sup>因此,教育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殊含义,不能将市场机制生硬地套用到教育上面,反对大张旗鼓地倡导教育产业化。

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另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持反对意见。据《科技日报》2002年4月9日报道:4月初,吴敬琏在纪念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时说:“要把所有的教育活动一概变成赢利性活动的主张,我认为是不妥当的。”<sup>[12]</sup>他认为,近几年来,政府提倡教育改革,打破了学校一律官办的老规矩,各地涌现了一批民办学校,与官办学校相竞争,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在民间兴学的潮流中提出的一些口号和出现的一些现象却使人不无隐忧。比如,有些地方办起一种名为“贵族学校”的中等、初等乃至学前教育机构。这种学校往往以堂皇的建筑、豪华的设施、安逸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预期升学率为号召,吸引望子成龙的家长斥巨资送子弟入学。从这个角度看,“实现教育产业化”是有问题的。吴敬琏说: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实行“教育产业化”,无非是要把教育机构办成赢利性的事业单位。教育分为许多不同的门类,其中一部分提供一般的技能训练,是可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例如基础教育,具有经济学所谓“外部性”,就是说它提供给行为者本身的效益远远小于提供给社会的效益,这类教育活动就不应当由市场导向。吴敬琏指出,如果不区分情况一概提倡市场导向,将会使整个社会文化沦落,而如果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重技术而不讲操守,不讲道德,以粗鲁为荣,以升官发财为务,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常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系。不少人指出,目前不少学生过于急功近利,过于浮躁,放松了对基本素养的提高,这在专业选择和学习重点上都有表现。他认为,这些都与上述错误认识和错误导向有关。

可见两种观点如何针锋相对。我们不妨再来考察一下“教育产业化”的来历。20世纪50年代前后,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教

授弗雷德里克·特曼谋求在斯坦福大学周围地带建立“科技人才区”，以强化这所大学支持科技产业的角色，他还把最大的努力用于建立斯坦福大学同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纽带。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了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专门开辟了一个以斯坦福大学和附近的伯克利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为核心的斯坦福工业园，使自己的教学、科研成就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经过几十年的精心打造，逐渐建成了一个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圣克拉拉谷——硅谷。目前的硅谷，分布着 3000 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机构，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还因其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全美尖端技术人员的五分之一。同时，也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提供了充足的就业机会，更解决了教育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斯坦福大学的成功实践，被誉为“硅谷奇迹”，促进了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硅谷也被誉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sup>[13]</sup>除去斯坦福大学以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也从把教育转化为生产力这一目标出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新型材料的作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研究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还分别建立起许多跨学科、跨院校的综合性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取长补短、互相协作，建立起了集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知识创新、科技发明、高技术成果迅速转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具有雄厚科技实力和巨大潜力的经济中心。

如果这种“教育产业化的由来说”得到认可的话，“教育产业化”本身的基本涵义应该十分明了，我们是否可以先理解什么是教育产业：在这里，“教育产业”的概念显然是指高等学校的“教育衍生品”——教育科技成果，将科技成果不是单纯地推向社会或整个转让，而是由大学自己来经营，将它转化为既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产业，尤其是有大学高科技特色的产业，又能服务于大学的教学和实验，特别是为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提供服务的“校办产业”。我想这对社会和对大学自身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好处。除了校办产业，我们也可以探索高等学校如何盘活现有的可经营性资产，在保全国有资产的前提下，利用资本市场的运作拓宽高校融



资的途径。而美国大学的“教育产业化”过程,并没有涉及对学生的收费,更没有将大学办学的整个过程推向产业化道路。美国政府也没有将整个教育体系纳入教育产业化道路。如果这种理解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提教育产业化就应该准确地引用这个“教育产业化”概念,不能将它任意地扩大,更不能将它运用到根本与之毫不相干的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体系上,更不能像有一位市长大人表示的那样:对高中阶段教育,今后政府不仅要“断奶”,而且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上交。应该说这完全是对“教育产业化”的一种误解和歪曲。像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走的“教育产业化”道路,不仅创造了科技成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为大学的发展补充了雄厚的资金,是十分可取的。这种“教育产业化”是要把大学的研究发展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以知识促进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提高研发能力。因此,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样的“教育产业化”,这样的“教育产业化”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教授在谈到斯坦福大学和“硅谷”成功的事例时指出:“科研、教学与工业的结合,不仅可以促进教学内容的迅速更新,培养年轻一代学生的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科研工作本身的发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罗姆·威斯纳在就职演说中,解释了他们进行教育产业化时必须坚持的宗旨:“我们走到一起,是为了扩展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主义、任何正统观念、任何清规戒律和政治狂热使我们离开这个目标。”<sup>[14]</sup>我国不少大学的实践经验也有力地说明了一点,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产业集团就创造了许多“清华”和“北大”系列的产业集团和产品,为学校的发展积聚了雄厚的资金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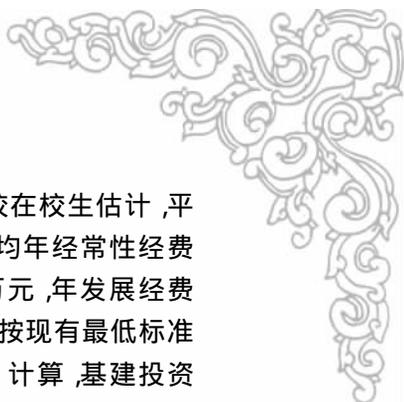
如果把整个教育过程都用“产业化”的理念来运作,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都是不可取的。反对派的意见就是集中在这一点,原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院士最近对国内硕士博士的培养方式提出质疑,认为目前高校以“批量生产”的规模招收硕士博士,肯定难以保证教育质量。其实,现在的问题何止是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也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几年的大规模“扩招”是否有这种“产业化”的嫌疑,这确实值得我们警惕。而2004年初,教育部部长周济已经公开地否定了教育产业化的观点,似乎这样的争论可以划上一个句号。目前,有人批评一

些地方政府大规模兴建“大学城计划”是在建造“教育产业化”的“车间”，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全国范围内不知何时开始，大规模地兴建“大学城”，政府是这项工程的推动者，也显示出政府对教育的支持，但是否是一种科学合理的、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行为，值得商榷。而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建设存在资金黑洞<sup>[15]</sup>问题被披露，说明这种盲目投资教育的政府行为也确实令人置疑。有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大学城”，有的称为“研究生城”，无论从建筑的设计还是从占地规模来说，都不符合大学的特征。我看这也不要太偏激，但是不是要以如此大规模地兴建“大学城”来重视教育和投资教育？确实是值得反思的又一个现实问题。

## 民办高等教育

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是人们教育需求不断增长的结果。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各个国家都需要更多具有现代科技知识，能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高素质劳动者。更何况世界科技的竞争实际上取决于科技人才和教育的竞争。这种需求促使了各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统计资料，世界范围内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1960年为1300万人，1970年增到2800万人，1980年增至4600万人，1991年又增至6500万人，而2000年的高校在校学生已达7900万人。2003年7月来自大约120个国家的400多名专家和政府官员，在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了国际高等教育。据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高级官员唐虔透露，2003年已首次达1亿人<sup>[16]</sup>。受教育者需求的快速增长，促使了高等学校数量的迅速增加，数量上的增长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这种增长的趋势是共同的。

高等教育的发展，不管是学校数量的增加，还是教育品质的提升，都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种投资是巨大的、长期的，又很难在短期得到实质性的经济回报。所以，政府财政很难满足快速增长的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以我国为例，若按未来1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15%计算，2010年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将达到1700万人，10年间将净增规模700万人，按现有在校生规模，以及普通与成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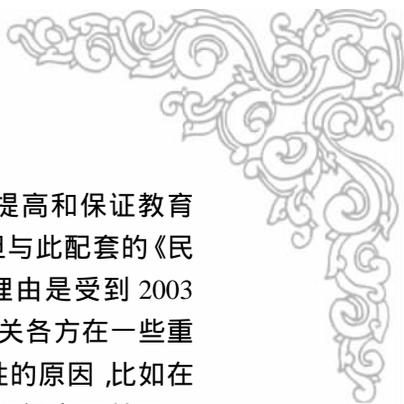


等教育构成推算,并按三分之二为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估计,平均每年至少需净增招生数 50~70 万人。若按生均年经常性经费(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和学校日常运用经费)0.8 万元,年发展经费(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和基础设施与设备投入)按现有最低标准(生均 15 m<sup>2</sup> 建筑面积,基建投入价以 1500 元/m<sup>2</sup> 计算,基建投资为生均 2.25 万元,加上生均图书、设备投入 7500 元)3.0 万元估算,每年新增规模所需增加的高等教育投资额将达 190~266 亿元,而政府财政投入中,每年新增投资额据合理预期估算也只 38 亿元。即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能力再有增加,与需求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更何况不同省区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因而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缺口是巨大的。高等教育数量上的增长要求扩大高等学校的规模,增加供给。但是,高等教育的巨大投资仅仅依靠政府单一的财政拨款是不能有效解决的,必须广开投资渠道。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依靠国家投资来支撑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运转的。这不仅在民办高等教育占很大比例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如此,而且在一向以高福利著称的瑞典也同样如此。据资料载,美国各级政府(指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资助,从 1990 年的 54.3%,已下降为 1993~1994 年的 50.9%。近几年仍呈下降趋势;另据 1997 年的资料介绍,瑞典的全部(70 余所)高校中,民办(私立)高校也有 13 所,占到 18.57%。<sup>[17]</sup>发展中国家则更是依靠非财政投入来支撑高等教育发展。因此,通过收缴和增加学费来达成高等教育经费分摊,或者通过其他投资主体如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个人等参与,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现实需要。

我国最早的民办学校创办于 1984 年,从此以后,民办教育一直在一个比较艰难的环境里逐渐成长,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民办教育发展迅速,但社会各界对此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实质上在于民办高校的定位和功能。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引进民间资本发展教育,是一个积极的办法,也势在必行,况且外国的教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鼓励民办学校发展壮大,形成与公办学校的竞争可以克服公办教育效率不高、管理混乱、人浮于事的现象;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说,有限的教育资源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在国家没有足够财力继续有效地增

加投入的前提下,发展民办教育是有积极的补充意义的,而民办学校创造的教育机会及其灵活的服务,可以满足一部分家庭的社会需求;但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绝大部分都希望将民办教育推上“产业化”道路,使其投资有一个良好的回报。正是有着这样不同的认识,从民办教育诞生那天起,社会对民办高校的发展就充满着矛盾心理。

为了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规定,如《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关于加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工作的通知》、《非学历高等学校的机构名称问题》、《关于社会办学经费问题的意见》、《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草案)》、《关于实行许可证制度的通知》以及有关广告、印章、教学等方面的规定等等。尽管这些法规对民办学校的机构设置、教学和行政管理、财产及财务管理、变更与解散、保障与扶持、监督与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规定,但其条款较为笼统,若要落实到实际操作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另外,这些法规对民办学校在办学中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如:学校的创办标准及审批权限,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成本的测算,投资者和办学者的权限,董事会和校委会的关系,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关系,民办学校的运行机制,教师的来源,教师的医疗和养老问题,学生发生意外由谁来承担风险等,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致使民办学校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出现了诸如高额收费,以豪华为特色,招生和管理贵族化的倾向,还有“公校”办“民校”,搞“校中校”,以营利为目的,办学方向不明,不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自2003年9月1日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走上法制化轨道。一方面,自《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颁布以来,我国社会力量办学的实践不断提出一些新问题,需要用立法加以解决。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高等教育面临体制改革、内容创新的迫切任务。《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制定是我国教育应对国际化、现代化的压力和挑战所做出的重要立法措施。它的实施将会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从而构建公办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部法律对民办教育的性质做出了明确规定,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一样,都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各类人才。所以,民办学校应当努力提高和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承担起神圣而崇高的教书育人任务。但与此配套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又遭延期发布,公开的理由是受到2003年上半年“非典”疫情的干扰,属于不可抗力,但有关各方在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上没有取得共识,显然是更为实质性的原因,比如在合理回报、税收优惠、政策公平等问题上政府各部门意见并不一致。

但不管人们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看法如何不一致,民办高校却在一天天成长发展起来。民办教育最早以公办教育的补充出现,在职业培训及其他非学历教育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办教育在中国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背景下获得快速发展,截止2001年底,全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56724所,在校生923万人。其中:

——民办幼儿园44526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39.9%;在园儿童342万人,占总数的16.9%。

——民办小学4846所,占全国小学总数的1.0%;在校生182万人,占总数的1.4%。

——民办普通中学(含初中、高中)4571所,占全国普通中学总数的5.7%;在校生233万人,占总数的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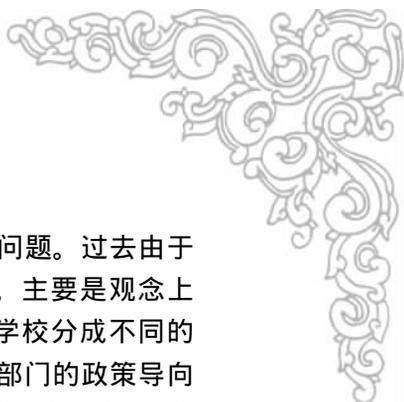
——民办职业中学1040所,占全国职业中学总数的13.3%;在校生38万人,占总数的8.1%。

——民办高等教育机构1202所,注册学生113万人。其中,进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的436所,在校学生32万余人。经教育部或教育部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89所,在校生15.11万人。<sup>[18]</sup>

从中可以看出,民办高等教育领域中,大量的是学历文凭的考试点,实际上是属于继续教育或者叫成人教育系统。真正意义上的民办高等学校只有89所,近15.11万人。而从1998年开始,一些公立大学办起了所谓的“民办二级学院”,又使得民办高校的成分更加复杂化。我觉得这些所谓的“民办二级学院”,实际上在真正意义上不能定性为“民办”,因为这些学院,绝大多数实际上只是民间资本对公办高等教育的参与,而且仅局限于对学院的教育硬件和服务设施的投入,没有真正介入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也就是说,民间资本没有彻底改变公立教育的主体性。无论从国家对民

办教育的定义还是从对学校独立法人的性质要求来说,都是如此。之所以要称之为“民办二级学院”,实际上是为了能享用国家现行的民办高校的收费政策。这种办学形式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和公立大学教学环境的改善、扩大招生规模是十分有利的。一方面它具有公立大学的学科、专业和师资的优势;另一方面,它拥有公立大学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有益的教育地位,特别是一些著名大学的教育资源能得到充分运用,从而提高高等教育现有资源的利用率。国家在政策层面上的认可,可以进一步促进它的成长。但这样的形式也有其不足,一是它带来了对民办高校概念的混淆,正因为如此,这种实际上是“公有民助”的形式遭到了“正宗”民办学校的普遍攻击;二是这种“公有民助”的形式,对其所依附的高等学校“母体”的教学质量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国家对民办高校的现行管理政策中,造成了“同样文凭不同含金量”的敏感问题。现在,教育部门要求这些“二级学院”实行转制,目的是要将其“并轨”到统一的民办高校的概念之中,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我的观点是,政府对这种形式学校的管理,不应当用简单、划一的办法寻求管理的统一性,要分析这种形式办学的实际功效实际上在于解决现有公办高等学校发展的资金“瓶颈”,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用收费杠杆来适度调节它与“纯”民办高校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在不同经济区域由地方政府来制定相关政策,既能兼顾到“纯”民办高校的利益,又能有利于“公办民助”学院的发展。或者,采取国有控股、股份合作等形式对其进行改造,有利于公办高等学校的发展。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其生存的实际意义上予以考虑,至于文凭的差异本身就是高校间的客观存在,录取分数的差异,从全国范围来看,也已经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争论,“宽进严出”也是对教育改革的探索。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它创造的就学机会和对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贡献。尤其,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处于困境的状况下,应该更多地看到它对现行办学体制的有利影响。相反,如果将这些“二级学院”从其母体中挤出去,是不是会陷入另外一种危机,需要审慎地考虑。至于对一个学校的教育评价标准,是要靠政策和制度来解决,而且,对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问题,应该可以通过教学改革来解决,如果真的会对高校“母体”的质量构成很大冲击的话,相信高等学校也会通过压缩招



生规模和调整收费政策等措施加以适度调节。

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应当首先在观念上解决问题。过去由于诸多原因,民办学校尚不能和公办学校平起平坐。主要是观念上的问题导致了决策的偏差,由于我国历来将高等学校分成不同的等级加以管理,无形中有着管理的偏向,政府管理部门的政策导向十分明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通过,相信人们的这个观念会得到转变。其次,既要扶持民办高校,也要严格对民办高校投资人的要求。民办高校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有着先天不足,对民办教育的办学质量,社会普遍不能给予认可,首要的原因在于,民办高校普遍在学科和专业上缺乏优势,特别是没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导致了民办教育在社会上没有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有人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国家没有给予应有的政策支持。我以为政府需要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是必须的,正像在前面提到的,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我主张放弃对高等学校的等级划分,代之以国家对大学优势学科和专业的重点支持。对民办高校也一样,也要鼓励民办高校建设自己的优势学科和新兴学科。同时也要严把民办高校的审批关,根据教育投资有着投资规模大、投资需求长期性和投资回报低的特点,制定政策提高对教育投资人的资产质量和投资状况的审批要求,严格控制那些既没有足够资金实力、又有急功近利思想的投资人跻身民办高校教育投资领域。事实上,在过去已有民办高校的投资人中,许多人只希望把民办高校推上“产业化道路”而从中能赚得更多的利润,这无疑会将民办高校引入歧途。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投资教育的“利”应当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而且经济利益也应着眼长远,没有这样一种投资魄力的投资人是不能任其进入教育投资领域的,一些发达国家的私立大学的成功投资经验,值得教育管理部门反思。我们不能把投资教育变成“小老板们”的“淘金”场所。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有不少民办高校投资人由于资本不足而出现了经营危机,学校也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棘手”的“烫山芋”,这些问题考验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智慧。再次,国家对民办教育应当实行投资和管理分离的基本原则,提高民办高校的校长任职资格,以及制定强有力的政策保证措施,确立校长的独立管理的地位,确保民办高校能沿着符合教育规律的正确方向发展。

当然,把民办教育放到一个与公办教育同样的政策环境中是必须的,但我以为,在一些涉及经济利益的原则和政策问题上应当慎重,原因很简单,公立学校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将逐利作为其办学的根本目的,政府不需要、也不允许它去追求办学的经济利润,即使有,也只能是属于国家公有的,也只能是对教育的再投入,而民办的利润是“私有的”,而且利润的去向是由投资者决定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更何况民办高校普遍“高收费”是其办学的基本特征。如果将民办高校的收费也放到公办高校一样的收费政策环境中,那么,我想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投资者热衷于民办高校的投资了。不仅如此,政府对于民办高校的收费政策,也应当与民办高校的税收政策相匹配,顾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以采取收费的浮动政策,但一定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更不允许毫无章法乱收费现象的出现,不然,不仅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反而会引起更多的社会责难。

#### 注 释

[1] 见《中国人事报》2004年1月6日报道。

[2] 1926年,芝加哥大学 James Mckinsey 教授创立了麦肯锡咨询公司。随后,这家以他姓氏命名的会计及管理咨询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麦肯锡已逐渐把自己的企业形象塑造成一个“精英荟萃”的“企业医生”。麦肯锡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美国国内咨询业首屈一指的领先者,并为其随后于60年代在国际市场上的拓展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到60年代末,麦肯锡公司已成为一家在欧洲和北美市场享有盛誉的大型咨询公司。

[3] 见2002年3月18日《北京青年报》的文章《聚焦人才争夺战的10种形式》。

[4] 见《出国》杂志等相关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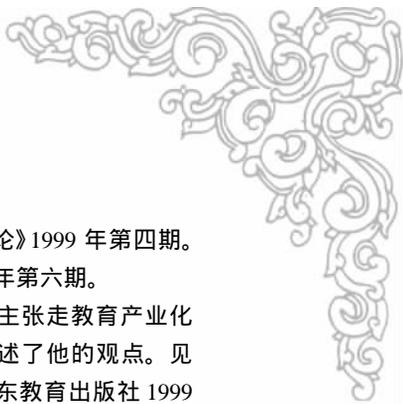
[5] 见1999年9月6日《华声报》。

[6] 相关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8》。

[7]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0—2000》,其中1990年至1993年的高等教育经费是根据各项支出数据计算所得。

[8] 詹姆斯·赫克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因他对分析选择性抽样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赫克曼在访问北京大学时发表演讲称,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低于世界平均线。见《中国青年报》2003年12月5日。

[9] 参见闵维方、陈晓宇:《中国高等教育经费需求和投资体制改革》,



《教育研究》1994 年第十二期。

[10] 参见马佳宏:《教育产业化问题评述》,《教育评论》1999 年第四期。  
申俊喜:《对教育产业化问题的再认识》,《教育评论》1999 年第六期。

[11]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他主张走教育产业化道路。他在《教育产品的性质和对教育的经营》一文中论述了他的观点。见郝克明主编:《面向 21 世纪我的教育观 综合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12] 吴敬琏: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详见《科技日报》2002 年 4 月 9 日报道。

[13] [美]安纳利·萨克森宁著:详见《国际金融报》(1999 年 10 月 19 日第五版),曹蓬、杨宇光等译。

[14] 参见肖雪慧:《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肖雪慧教育随笔》,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版。

[15] 见《中国青年报》等相关媒体 2004 年 6 月 4 日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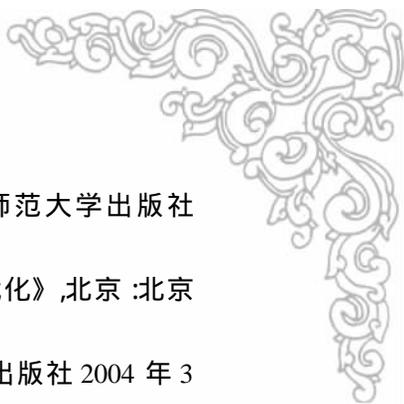
[16] 见 2003 年 7 月 29 日中国广播网转载联合国电台报道《全球大学生破一亿,中国受高等教育人数超美居世界第一》。

[17] 参见《各国高等教育政策》。

[18] 参见《民办教育的事实与立场——对 民办教育促进法 观念基础的解读》一文,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吴华、蒋新峰、杭州桐江职业教育集团、童锦波、周宵龙。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3 年 11 月 7 日。

## 主要参考文献

1. 金耀基 :《大学的理念》,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 12 月版。
2. 袁振国主编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002》,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版。
3. 金一鸣主编 :《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
4. 叶运生、姚思源编著 :《素质教育在中国》,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2 月版。
5. [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6. 高平叔编 :《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
7. [英]约翰·怀特著 :《再论教育的目的》,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
8.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比较高等教育 :知识、大学与发展》,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版。
9. [美]R.赫斯利普 :《美国人的道德教育》,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10. 杨德广、晏开利主编 :《中国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11. 贺国庆 :《外国教育专题研究文集》,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
12. 沈玉顺主编 :《现代教育评价》,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
13. 赵宝熙主编 :《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14. 侯星芳主编 :《大学生能力素质概论》,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



15. 宋春宏 :《比较德育新论》,成都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16. 顾明远主编 :《民族传统文化和教育现代化》,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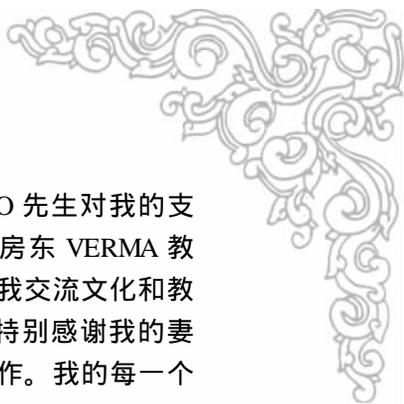
17. 张维迎 :《大学的逻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版。

## 后 记

就在本书最后完成的时候,2004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我注意到教育问题的提案又成为一个热点,应该说这充分说明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我们的教育。同样在不久前,教育部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旨在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一些政策,如推出了允许一些省自主组织高考的改革措施,四六级英语的考试改革注重了对学生的听说能力的要求,和我在本书里提出的一些基本主张十分相近。我深感鼓舞。这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在不断向前推进,也正在向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方面努力。当然更加棘手的难题还远远没有涉及,我也衷心地希望我国的高等教育能早日走出阴影,登上世界的舞台。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学者和专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许多问题上持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繁荣的标志。在理论上的争论有利于认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困难,有利于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利于政府的决策,是值得倡导的。我一直认为,学术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必须始终坚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是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处在一个变革时期,这更加需要我们在变的过程中寻找不变的规律,来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在此过程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努力,相信都能起到一些微薄的效果。限于水平,本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分析、介绍和讨论,对于高等教育改革所发表的观点难免有偏颇、失误之处,也期待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指教,对本书所引用的相关资料的拥有者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即将离开约克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在约克大学的半年中,我有机会摆脱繁忙的事务,潜心写作。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接触到英国大学高质量的管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这使我能更好地反思我们教育体制的改革。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学校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给了我学习和进修的机会,也要感谢约克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 RICHARD ANDREWS 教授、LISTER



教授和 GRAHAM VILIION 教授、CHRIS KYREACO 先生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是他们给了我许多学习的机会。我的房东 VERMA 教授,不仅为我提供了生活上的许多方便,还经常与我交流文化和教育的许多观念,探讨各自的教育经验。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是她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能安心写作。我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她的支持和鼓励。

周肖兴

2004 年 7 月